

共存的社会多样性

不同 与和谐

高丽大学
多样性委员会
策划

东亚

不同
与和谐



东亚

高丽大学
多样性委员会 策划

共存的
社会多样性

不同
与和谐

一样的天空， 不一样的色彩

Kim Chaiyoun 高丽大学 多样性委员会 委员长



在这季节交替的时期，我经常面对特别美丽的天空。难道是因为夏天开始和结束时的空气中含有更多的水分吗？在首尔这座城市里，也曾有过生疏又完美的弧形彩虹悬挂在天空的日子。但那感觉像是脱离了我们的日常，有种不现实的美丽。然而，构成彩虹的颜色实际上自始至终都在那里。只不过空气中的小水滴粒子就像牛顿的棱镜遮住了颜色，而使颜色无法看得太清，看似明亮的光线其实是构成各种颜色线索中各个波长的集合。

通过汇聚12位作者珍贵的文章，我们编写了《不同与和谐》此书。由此，我们认识到由天空、彩虹以及各个颜色集合呈现的光芒并非是偶然的。在我的脑海里，每篇文章都有其固有的颜色。因为这本书是通过

汇聚高丽大学多样性委员会从2020年6月开始发行的月刊《Diversitas，意为拉丁语中的“多样性”》而编写的，且委员会所发行的每刊都是以表现当月气氛和情感的颜色为封面的。所以当我们回想每篇文章的时候，都会联想到刊登该文章的《Diversitas》的封面颜色。这12位作者以“多样性”为主题，通过自己特别的视角各自编写了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章。这些作者中有心理学、媒体学、国语国文学、教育学、人文学等多种专业领域的教授，也有PD、媒体家、字体排印学研究者、教师以及像社企代表一样在不同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专家。这本书的作者以各自的专业领域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了多样性的意境，这就好比彩虹散发的不同颜色汇聚在一起而发出的耀眼光芒。

我们是从最近开始谈论起了多样性，其实国外以及跨国企业从很早就已经开始讨论起多样性的话题了。据新闻报道，不仅有美国国务院任命多样性总监，还有很多海外优秀企业和大学也设立了多样性委员会。相比之下，我们的社会是最近才开始谈论到多样性的，且具有多样性组织的大学屈指可数。高丽大学多样性委员会成立于2019年3月，是韩国私立大学的先驱。委员会成立

开始，各具特色的委员就开始研究如何克服由各自的特性而引起的大学生活的不适应。然而，最后的疑问总被归结为“所以多样性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为了让更多的高丽大学的校友以自己的方式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出版了《Diversitas》。它既不抽象也不具有强劲的说服力，更不存在训教或强迫，只是希望大家能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暂停片刻，给自己一些思考的时间。现在，我们不想把这缕风只关在一个大学的篱墙里，而是想让它散发到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与各位分享。其成果就是这本《不同与和谐》。

不过，这并不代表《不同与和谐》想要对于“多样性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给出唯一的答案。我们也不能涉及到多样性的所有重要内容。只是在阐述多样性的时候，我们尽力不去以个人可以代表其所属集体或以我与他人之间的对立的视角去看待多样性的问题。这本书从序言到结尾，由“想到”、“看到”、“说到”、“学到”、“做到”五个章节组成，这些章节更能体现作者们的此种意向。这本书把我们日常所为设成每个章节的标题，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让读者更好的理解多样性的含义，而在于让读者可以在生活的各个角落体味并

感受多样性意义。

在阅读这本书之前，读者可以不必先断定多样性的正确性。相反，读者可以带着它会降低效率的想法来阅读它，或者读者可以带着比起整体化一来说多样的视角反而更好的想法来阅读它。在阅读本书编纂的12篇文章时，读者对于多样性的最初想法可能会有所改变，思维也可能随之转回原位。希望读者可以暂停片刻，思考一下个人对于多样性的想法。多样性不是需要被理解和记忆的概念。它存在于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它是各自的故事汇聚成的河，好比小水滴隐藏又显露着原本在光线中的色彩，希望它可以让读者阅读本书时自始至终都可以感受到多样性的意境。

如今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这本书的面世，对此我有许多要感谢的人。尤其是将一本书脉络清晰的呈现出来的过程并非易事，在此我对参与编纂《Diversitas》的所有编者深表感谢。感谢高丽大学多样性委员会前任委员长Min Yeong，副委员长Seong Yeongshin，Kim Jihyeong，以及参与撰写策划的Noh Aegyeong老师，是他们开创了《Diversitas》，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完成。感谢高

丽大学校长Chung Jintaek自多样性委员会成立以来一直关注并给与我们的支持。同时感谢高丽大学的各位校友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关注并阅读月刊《Diversitas》，并给我们宝贵的意见。可想而知，与多样性委员会携手共进的所有委员对于本书出版满怀喜悦之情。感谢Yang Yoonjae老师、Lee Jooyeon老师、Jang Eunyeong老师、Ji Suin老师、Lim Jushil老师为出版书籍披星戴月，在关键时刻给与力量，发挥了巨大作用。最后，感谢东亚出版社Han Seongbong代表在从我犹豫再三并提出出书的那一刻起给予我们的一如既往的支持，深切感谢东亚出版社的所有工作人员对于我们这些在大学里制作小册子的人的共鸣与帮助，是各位的帮助才让此书顺利编纂完成。

2021年10月

- 5 前言
 一样的天空，不一样的色彩
 Kim Chaiyoun 高丽大学 多样性委员会 委员长
- 12 序言
 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尊重不完美的人生
 Min Ji-yeong 广播 PD
- # 想到 偏见是如何形成的
- 36 越是正确的固定观念，就越具有危害
 Hur Tae-kyun 高丽大学 心理学部 教授
- 58 多样性的运算法则
 Shin Haerin 高丽大学 传媒学部 教授
- # 看到 没有冷落的世界
- 88 媒体中的性少数者
 Park Ji Hoon 高丽大学 传媒学部 教授
- 108 影片中的不同视角
 Lee Dae-hyun 新闻工作者，电影评论家

说到 处于歧视边缘的语言

- 134 隐藏在韩语里的日常生活中的歧视
Shin Ji-young 高丽大学 国语国文学系 教授
- 158 印刷术与多样性
Yu Jiwon 字文化研究所 研究所所长 字体排印学 研究员

学到 多样的观点胜于深厚的知识

- 190 创造尊重多样性的教学场景
Lee Bo-ra 高丽大学 教育学系 教授
- 218 韩国教育学中多样化的双重含义
Jeon Dae-won 城南女子高中 教师

做到 互利共赢的改革是可以实现的

- 244 科学技术领域为何需要更多的女性
Leem So-yeon 淑明女子大学 人文学研究所 研究教授
- 270 为何缺乏多样性?
Yoon Seok-won TESTWORKS 企业代表人

- 288 结尾
搬石移山
Yoon Tae-Woong 高丽大学 电气电子工学部 教授
- 304 作者介绍

序言

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尊重不完美的人生

Min Ji-yeong 广播 PD





通过撰写本文，我感觉到脱离日常的经验可以扩大对他人的理解范围。虽然只写了10张原稿，却让我深受写作之苦，以致对写作之人的敬畏之心油然而生。作为无线广播PD，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每天送来新原稿的作家身上所焕发出的光彩。写作不同于职场工作，它并不具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且作者很难把握自己文章的优劣与否，这更让我对作者生涯的艰辛感同身受。

所以对于某个领域，需要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亲自目睹，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他们的故事，理解他们对于困难的诉求。假定我们社会的每个人各自经历一段不同寻常的过程，那么这段过程也许对于自己只不过是一种经验，但是从整体上看，共享这一经验交点的人群会随之增加，由此我们自身感知和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也会随之提高。经历对于每个人不仅仅是生命里的一种体验，它更可以在引导社会共同体的连带意识与支持方面发挥作用。

我的这种想法，会与“为了让我们的世界充满包容和爱心，让我们尽情体验各种与柴米油盐无关且无用的

经验吧！”这一主张联系在一起。我们若要摆脱自身框架，需要不断体会新的经验。这一点在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形成之前尤其重要。但是很遗憾我们并没能在这一关键时期体会到充分的经验。这是为什么呢？

经验也分时候吗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发现韩国人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语言风格。在SNS社交网站上不难发现有20多岁风华正茂的年轻朋友上传的文章里以“半50岁”来形容自己是25岁，并说要积极就业、不负韶华。再举个例子。几周前有40多岁的领导觉得自己新换的发型不好看，就打了摩斯上班，还不好意思地说道：“可别笑我都这把年纪了，还在头发上打摩斯。”人们可能会认为年纪大了打点摩斯又能怎样？但是在韩国这就会成为违背年龄特点的行为。人们通常会认为特定年龄有其需要完成的行为，好比在25岁需要积极就业，也同样认为特定年龄有其不可做的行为，比如人上了年纪就不应该打摩斯等等。每个年龄都被规定了可为或不可为，我们从小就感受到了不可脱离正轨的压迫感。

高中毕业后我上了大学。像我这样的应届生进入大学的学生会被称为“现役”，复读一年后进入大学的学生会被称为“再修生”，复读两年后进入大学的学生会被称为“三修生”，也有少数“四修生”及“五修生”。入学考试每失败一次，将面对的是世界对我的不同称呼。应届生对此感到极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会把与考试无关的事情排放在生活的次要顺序上，等金榜题名后再去实施。

想一想像这样被排到次要顺序的事情都有哪些呢？你可能会想到高中时父母或老师给我们的忠告：“谈恋爱等上了大学再谈，等到那时候你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对社会做贡献也等到时候再做，现在你哪儿有想这些的时间！”听话的学生会按着这样的劝告把恋爱、爱好、工作、政治活动等所有的社会活动都推到进入大学后再做，同时把适应社会的机会和对自己、对社会的思考也推到后面。

终于，这些学生解开枷锁成了一名大学生。然而金榜题名的学生从此就可以享受随心所欲的生活了吗？我认为并非如此，原因如下。第一，不知道该做什么。其实人们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由之时，往往会感觉到迷茫与

混乱。20多岁青年的心境犹如退休后的中老年人患有抑郁症时的状态。虽然相比高中时期有了更多的自由，但是上了大学，成长为成年人并不意味着具有解决本质问题的能力，越是在面对关于自我探索或正确建立我与世界的关系等有关本质的问题时，就越是如此。

第二，学生们即将要面对就业的问题。在为自由感到高兴和困惑的时光不知不觉地过了一两年后，他们很快会发现自己已然成为了“求职生”。成功的就业条件与成功的入学考试条件相差不多。除了国营企业或一些机关为了废除年龄限制而采用盲招(blind recruitment)制度的情况之外，社会的多数人更认为年轻对于就业就是一种资本。在一个大学生论坛里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对于“在相同的就业条件下，是否认为年纪轻的人更有利？”的问题，87.7%的在校生及毕业生回答了“是”。

这与准备入学考试一样，对于不能有助于入学考试的一切都会被认为是浪费时间。就好比准备进入律师学校的学生在休学六个月的时间里，去做一些对入学没有帮助的事情，如学习计算机图形学、天文学、俄罗斯语或者说要去新西兰度假等。人们会对他说“你的想法很不错！你可以通过这次经历感受下没有感受过的心情，经

历一些没有经历过的困难，遇见一些没有遇见过的人。无论日后你遇见怎样的委托人，这些经验都将有助于你更好地去理解你的委托人。”这样的话吗？我们是不是更熟悉“这样的经验可以等到你考上律师学校，当兴趣来做。为了这种东西浪费一年的时间，然后你想看着跟你一起准备入学的学生成为你的前辈吗？现在一年一年有多重要你不是也很清楚嘛！”这样的话呢？“首先”的理念让我们把除去紧急任务以外的问题抛在脑后。可想而知，对于他人的理解和尊重在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后，才会更进一层。如此说来，“预先”抹去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经验。

你不想摆脱这个年龄的枷锁么？你真的想要生活在只有20岁出头上大学，30岁前就业，30多岁生活稳定才不会成为失败者的世界里吗？你不想生活在一个没有截止日期催促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也可以做自己能做的事的社会里吗？你不想在一个可以通过丰富的经历去尊重并理解其他领域及其他人的社会中生活吗？当你或他人为一些不符合年龄的事情而担心的时候，不妨鼓起勇气大声说：“我（你）这个岁数怎么了？”

为何不同的想法不能得到尊重呢？

在我成为上班族以前，以为开会是一个很酷的事情。我以为会议是可以各抒己见，是可以自信地说服对方之后通过讨论和协议决定每个提案的交流的机会。然而，我的所见所闻却恰恰相反。会议中不仅需要时刻看别人的眼色，更要小心自己的言行，根本没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最后的决议大部分取决于少数的当权者。不管你多想表达自己的意见，也要忍耐。到最后，你会领悟到即使你表达意见也不会被采纳的这一事实，只会一心盼望着会议快点结束。会议场外也是相差无几。像我们这样把该说的话，想说的话都窝在心里而习惯成自然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内向和小心谨慎。我原以为自己性格本身如此，后来发现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把很多的话藏在心里，刻意地压抑自己。因此，我想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去审视这个问题。以下对话是我亲身经历或者从朋友那里听到的内容。

安分守己，至少不会出错

“不要因为我在就看我的脸色，借此机会希望大家可以

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

“为了更有效地宣传我们公司，我觉得首先需要有一个好的内容。(以下省略)”

“金主任，你还年轻，你的意见有点脱离现实。年轻有魄力是好事，但是在社会生活里还是得保持点现实感才行。”

“……”

如果你想被一个人看好，就要先了解这个人的喜恶。与他对话的时候注意不要脱离已掌握的信息。为了投其所好，不去说对方不喜欢的话，而要说一些对方感兴趣的话题来展示自己。相反，也有必须要被一个人看好的时候。我的推荐书、奖金、工作评价及业务分管都掌握在那个人手上。对话的机会即使我不想要也会出现，所以这时我依旧需要小心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脱离已掌握的信息。我所说的话对与错并非重要，重要的是我说话的态度与方式是否合对方的胃口。

越是成员间等级秩序严格的组织，就越难以自由交换意见，难以接受不同的观点。虽然这一结果的产生有很多原因，但我们在这里只关注两个方面。第一，重要的决定权无论如何都是掌握在当权者手中的。不管会议上谈了什么，不管我的发言有多少含金量，事情终究还是

会按照领导的意思进行。经历过多次这样的情况后，我们就不会想再对这样的事情多费口舌了。倒不如在尽快摸索出既定的答案后，向那一边汇总意见，尽快结束会议。这样就不用浪费时间和口舌，也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

其次，如果我的主张不符合掌权者的口味而导致与他的关系恶化，我可能就会受到实质上的不利影响。正如前面所说，在垂直组织结构中，包括业务评价、奖励、人事权在内的重要决定都取决于领导者。如果真的按他们所说自由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而得罪了上司，那我会在公司的生活就会变得很艰难。这种压力不仅仅存在于情感上，更是会在实际的层面上降低我的工作评价以及奖金，并且也可能要被迫承担公司里所有人都想要避开的业务。然而，相反的情况却并不成立。我绝对不会影响到上司的奖金。在决定老板的责任时，我的意见并不会被考虑在内。由于上司对个人的评价与奖励起着重要的作用，职员们为了生存就会不得不“看眼色”和“讨好”上级。职员们会通过说一些上司想听的话来稳固自己的地位，或者会选择尽量少说话，这样至少不会招惹到上级。在公司偶尔会有沉默寡言的同事，我们不用问也可以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一个人太过于显眼的話……

“A部门也太不团结了。怎么还分开吃午饭呢？”

以后每个部门的成员都要一起吃午饭，我当然也会偶尔参与。”

“好的，老板。我们会按着您的嘱咐去做。”

“好的！”

“好的！”

“好的……(其实我更喜欢自己一个人尽快吃完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最近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尊重个人意见的社会氛围也逐渐形成。然而我们一旦成为组织的一员，仍旧是“枪打出头鸟”，组织里的世界与外面的世界是否是同一个世界的困惑也由此产生。如果不参加公司的聚餐，就会被认为是个不会打交道或搅局的人，又或者会被认为是个只在乎自己时间的自私的人。像公司举办的登山、踢足球等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如果你不参加，不管你有多忙，你也会被认为是一个对公司不关心的人。当大家都说“是”时，如果你自己一个人说“不是”，那么你就会成为一名被关注的对象。越是垂直型的组

织，其氛围就越掌握在上级领导身上。韩国的上级领导多半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所以往往会强行要求职员们的牺牲，也往往会排斥在组织中不同阵营里的人。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垂直型组织文化，“大家一起来”的文化恐怕在未来也有可能继续。

“又不是什么高中，把加班时间做成表挂在公告栏上像话吗？”

“就是说嘛，部长们为了讨好老板拼命加班，下面的人能有什么办法啊？要是不想当没有眼力见的人，就得一起拼命加班啊。”

“怎么可能一直这么工作？你去跟他们说说这也太不正常了。要么就找个地方投诉去。”

“我们这个圈子太窄，如果被打上斤斤计较的标签就完蛋了。我就会这么一个技术……这要是传出去了，我做梦都别想跳槽了。”

越是狭小的社会，人们就越会对他人的视线反应敏感，小心自己的一言一行。“你知道这个圈子有多小吗？”这一句话就能让你垂首帖耳。因为这句话是在警告你不要那么嚣张，一点的风言风语就能埋葬了你，让

你转变成一个他人眼中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的人。狭小的社会中，各种谣言不胫而走，对个人的评价和流言蜚语一向是传播得非常快的。人们会时刻警惕自己的言行是否会在某一瞬间传播开来，从而不能让自己真实地表现自我，也不能让按照自己独有的方式生活。如果有人被刻上有个性且不懂得适应业界传统的烙印，他目前的地位和前途都有可能被夺走。所以在遭遇或目睹不合理的事情时，人们也不能轻易决定去投诉。名为名誉的这一监狱里充斥着流言蜚语，对于社会体系的批判却会随着沉默而变得更加坚固。

如果没有社会所有成员的刻苦努力来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就不可能阻止任何人在这样的监狱中窒息而亡。谣言一传十十传百，而流言止于智者。在你说着他人的风言风语时，要知道你自己有一天也很可能成为他人议论的对象。

好学生情结

“这是你个人的想法。要是每个人都写自己的想法，叫老师怎么公平地评分啊？”

“我的想法又没有错。我学了这些，我就不能换个方式

来想吗？”

“那也要按照学过的方式来写啊。如果大家都坚持认为自己的想法才是正确的，那分数还怎么给啊？”

“.....”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自己的过去。学生时期我们是否接受过要好好表达自己想法的教育并为此而付诸实践呢？我们并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必要那样做。我们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也可以取得好的成绩，考上好的大学，思想复杂的学生在选择既定答案的考试中反而会不利。不需要思考而只需要死记硬背的学习，这意味着你不需要问为什么，只需要重复性地背诵不可理解的问题就可以。

不对道德层面上被赋予的东西以及我们要做的事情提出疑问或反驳的孩子才是听大人话的好学生。我们的反驳会被认为是没有礼貌的顶嘴。我们不必有我们的主张和想法，或者说没有更好。这样的学生们上了大学，然后被扔进了社会，他们听到了这样的话。“请自由地讨论一下这个主题。”，“闵代理，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要想正确地表达我的意见，应该从何谈起？如果与别人的想法不一样怎么办？怎样才能不失礼地表达我的想

法和意见？我的想法与见解来自何处？我们的经验远远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已经被扔进社会的人，只能怀着遗憾的心情去碰撞社会来寻求答案，但我希望以后不再会有如此遗憾的人了。希望学校尽快脱胎换骨，成为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并包容各种思想的乐园。

接受其本来面貌的从容

最后我想说的是，为了建造尊重多样性的社会，需要区分什么地方需要我的关注而什么地方不需要我的关注。这是为了创造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世界。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曾当过交换生。对于旅游，我一直认为选择一个好的目的地也就成功了一半。于是我抱着不管去哪里都会很有意义的想法，申请了几个位于我比较向往的城市，并离机场比较近的学校。在我选择的学校中，我考取了Agnes Scott College，但我最终合格时才发现，这原来是个女子大学。原来美国也有女子大学。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在学校网站输入了我的信息，却发现随便选择的一个学校竟然会如此特别。输入信息的

时候有选择性别称呼(gender pronouns)的选项。不让我选择性别，而让我选择性别称呼的地方还是第一次。这个学校明明是女子大学，为什么让我选择性别的称呼呢？在韩国的女子大学里的交换生中也会有男同学，难道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我边想边点击了“选项”。

性别称呼中，除了“she”和“he”之外还有6个不同的称呼。除了“they”以外，都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代词。经过搜索之后才了解到各自的意思。我惊讶于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多种gender的概念，更让我惊讶的是学校竟然询问的不是学生的性别，而是“gender”的这一事实。

询问gender的程序并没有仅仅体现在学生的录取程序上。入学前，我参加了介绍学校生活的入学教育。这里也和其他学校一样是按组轮流做自我介绍，也需要同时介绍自己喜欢的性别称呼。到现在我做过无数次的自我介绍，而让我介绍“gender”的称呼却还是第一次。难道是让我介绍自己的性别是女的吗？这种自我介绍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虽然我感到有些混乱，但还是参考其他同学的自我介绍，简单介绍自己说：我叫Ji Young，来自韩国。我喜欢的gender称呼是‘she’。

过了几个星期，我才知道为什么让我介绍我的性别称

Profile : Required Information

There are some profile fields required by this site that you have not filled out. Please complete the required sections in the bottom of the page.

Please complete the required data sections of this form and click on the submit button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in order to

Required Information

Gender Pronouns**

Choose One:

- ✓ 1 she/her/hers
- 2 he/him/his
- 3 they/them/theirs
- 4 ze/hir/hirs
- 5 ze/zir/zirs
- 6 xe/xem/xers
- 7 ey/em/eirs
- 8 not applicabl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City and Country of Birth

Seoul

Country of Citizenship

Republic of Korea

▲ 这是Agnes Scott College入学时需要填写的个人信息页面。
可以选择的“gender”有8个。

呼。我了解到可能有的同学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女学生，但自己想要被接受的gender可能不会是女生。从前只用文字接触过的“sex”和“gender”的差别，鲜活地展现在了我面前。虽然生为女儿身，但自认为是男性的同学就会介绍自己为“he”。自认为既不是女性也不是男性的同学在自我介绍时则会介绍自己是“they”。在与新朋友交往的初期，我不仅要记住朋友的名字，

同时还要记住他们的性别称呼。结识新朋友后，在下一次见面时要准确地称呼其性别才不会失礼。正如我们从下次见面称呼对方为“您”或“你”一样，这样的代词十分重要。对于介绍自己为“they”的朋友，在问其他人的时候说：“她今天中午也来聚餐吗？(Is ‘she’ coming for lunch today?)”是非常不妥的。要说：“TA今天中午也来聚餐吗？(Is ‘they’ coming for lunch today?)”才不会有所冒犯。在我学习英语时，“they”是复数代词，我是第一次认识到“they”还可以作为中性的单数代词来使用。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对于介绍自己为“they”的朋友，称呼对方为“they”是很自然的事情。

公开自己的本质这件事，似乎会让我们感到非常陌生。既陌生也让人惊讶，还格外地富有美感。坦然地说“我是这样的人。”，另一个人自然地接受并说：“哦，是吗？原来如此。”这岂不美哉？

这种态度不仅仅局限于 gender 话题。“我是来自缅甸的难民。”，“我小时候和弟弟一起被领养到了美国。”，“小时候妈妈一个人抚养我，现在我和妈妈，以及妈妈的男友一起生活。”，“我有两位母亲。”，“我的男友没上过大学，现在每天在工地工作。”那里的人丝毫不怕公

开自己和自己的环境，是因为有可以坦然接受这些事实的听者。听者只限于聆听，他们不会因为这样的言辞而改变对朋友的态度或者提供一些说者没有征求过的建议，也不会断定朋友的处境艰难而以一种怜悯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同情心。听者的反馈不过是“哦，是吗？原来如此。”而已，他们会像这样尊重并接受既有的事实。

这种思想上的差异看似微不足道，但却会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社会不会在意个人、个人的背景、个人所经历的事情，以及个人所处的处境，我们就可以坦然而吐露自己的心声。如果别人知道我小时候是个被排挤的对象，会不会就对我产生一种偏见，而认为我是个本身具有很多问题的人呢？当别人知道我的父母离异后，会不会认为我自幼成长在一个有缺失的家庭里呢？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我们可以不必这样苦恼也不必担心，我们各自的生活不会由于周围的猜测与偏见而变得破碎不堪。我们可以以一个平常心面对自己，不需要任何掩饰或解释。

这让我回想起自己和身边的人的生活。在我小学四年级时，父亲辞掉工作后返乡耕田。直到父亲的工作安定下来之前，家里的生活非常艰难。我那时想要掩饰自己

的贫穷。当时我走路时都是胆战心惊，怕父亲破旧的拖拉机在我身边发出的轰鸣声会引来周围人的注意。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学会尊重父亲风吹日晒的工作环境，也用了很长时间才学会对父亲的工作感到自豪。每当在学校需要填写父母学历的问卷时，我的心境犹如身处地狱一般。直到有一年，老师要求以举手作答来代替书面问卷时，我更恨不得钻进老鼠洞，也很想撒谎说不知道。

上小学时有传闻说我的一个同学是被领养的孩子。我还听到有同学猜测说，那个同学因为别人知道他是个被领养的孩子而感到彷徨不安。初中时有一位同学的父亲去世，而同学的母亲则教导他不要让别人说成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一定要争口气。而他也是为了母亲这句话，决心要成为更加有礼貌的人。我二十多岁时，有个朋友因为婚前怀孕而退出了所有的社交媒体，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最近，一位对动物权利和环境问题很感兴趣的朋友开始了素食主义。但因为怕同事们把他当成一个挑剔而不好接触的人，所以只把这个事实告诉给了他关系最好的一个同事。

我们为何不能以“哦，是吗？原来如此。”的态度来面对这些事呢？贫穷不是罪，被领养也不是罪过。在单

亲的环境下长大，和心爱的人婚前生子，都不是罪过。因为是素食主义者，所以聚餐时不吃肉也不是罪过。虽然身为女性却把自己当作男性，虽然身为女性却与女性相爱也都不是罪过。但大部分的情况我们通常会把“多数”当成是“正常”，而非“正常”就成了罪过。为了不被戳穿，我们需要不停地掩饰自己。一旦被点破，我们就需要一个十分合理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我虽然没有钱，但我不懒惰，也不是个喜欢免费的人。”，“虽然我曾被领养，但我并不是一个性格有缺陷的人，我懂得自重和爱自己。”，“虽然我提早生育，但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没有想法又随便的人。”，“虽然我是个素食主义者，但我并不挑剔和敏感。”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地为自己辩护才可以生存？在世界另一个角落里似乎看起来并不重要的东西为何我们就一定要如此在意呢？

倒不如停止一下对别人的关心，把精力投入在提高自己的事情上，周围有更多需要我们关心的人和事。如果各种不同形态的生活想要得到尊重，就需要先学会选择什么该关注而什么不该。“这事值得我关心。”和“那又怎么了？那和我有什么关系？”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说这

样的话。但是这些固有的偏见与烙印在社会共同体中形成的关注点，其实并没有到达真正需要它的地方。很多人热衷于同情、判断及指责那些脱离于不知道是谁建造的“正常”的标准个人，而大多数人却没有关注于如何树立一个尊重并包容每个人自身的思维体系的这一主题。

有一个认为自己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而是中性的人。他本人这样接纳自己，这也完全是他自己的人生领域，不会有任何人因此而受到伤害。我们的人生不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对他的选择投入精力或给予关注。但有一点可能需我们的关注，那就是他在学校是否有一个可以随意使用的卫生间。这时，我们可能会联想到“你希望学校的设施是怎样的？”的问题，而这又会与“你希望自己缴纳的学费是用于体现怎样的价值？”这一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关心的是学生的食堂是否充分考虑了素食主义者的菜谱，残疾学生的轮椅在学校是否有充分的空间自由穿行。即使我不需要一个中性人的专用卫生间，即使我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即使我不是一个失去双腿的残疾人。他们存在在我们的生活里，你希望学校如何对待他们呢？这个问题是所有人需要关注的焦点，而并不是与我无关的事情。

也许我们在以上所有的条件里都属于“多数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后我们永远只属于“多数人”，有一天在某个条件下我们可能也会成为“少数人”。

我们需要更加投入时间去关心的是，是否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已经充分满足了每个人的需求，是否让每个人的权利充分得到了尊重，而不是天天关心并议论着他人的琐事。若要实现宏观的变化，就需要投入更长久的时间和精力。这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且当其需要雄厚的资源来支持时甚至还会受到多数人的反对。为了长久的挑战，我们需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当然，这对个人主义蔓延的当今社会来说，的确并非易事。承担他人的苦恼和困处，这太让人疲惫了。我们的疲劳于是就成了麻木和忽视他人的困难与痛苦的借口。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韩国人的工作量和学习量要更大的这一事实已无人不知。我们可以以多种理由呼吁人们现在应该要让这个过度疲劳的社会停一停了。我想给这一呼吁加上下面这个理由。“为了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们理想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为了拥有可以去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的从容”。



#想到

偏见是如何形成的

越是正确的固定观念，就越具有危害

Hur Tae-kyun 高丽大学 心理学部 教授





1996年10月中旬，我与妻子在芝加哥迎来了第一个孩子。他叫 Seoyeong，是我们的长子。我们激动万分且对此感到幸福又新奇，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了憧憬。但遗憾的是我们身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身边没有亲人照顾，也没有人指导我们如何育儿。我们只好东一头西一头，积累经验也吸取教训。我们就这样阅读了育儿相关的书籍，也听取了周围人的诸多教导才养大了我们的儿子。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当时所犯的错误，心里都会产生一种歉意。那是孩子出生几个月后在芝加哥的一个寒冷的冬天。当时妻子正在给孩子喂奶，妻子用稍带激动的嗓音有些担心地告诉我说儿子的第一颗牙好像出来了，但是长出来的不是位于中央的下牙，而是上面的虎牙。因为据我们所知，通常情况下婴儿长出的第一颗牙应该是位于中央的下牙。我和妻子很长时间就这样茫然地看着孩子牙龈上露出的虎牙。

几天后就是孩子的定期体检，我们如期来到医院。儿科医生看起来是一位经验丰富的50多岁中年美国人。面对热情迎接我们的医生，我小心翼翼地和医生说：“孩子的第一颗牙好像长出来了，但长出来的是虎牙。”医生听罢，在仔细观察后高兴地告诉我们确实是虎牙。听到

这句话，我和妻子更是担心地询问先长出虎牙是否是正常的，对身体有无危害等等。对此，那位美国医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一切正常，完全不用担心。”

这时我才放下心来，笑着和医生问道：“偶尔也会有这样的孩子是吗？”医生却若无其事地答道：“从未有过，我也是第一次见。”我感到既荒唐又气愤，追问道：“像您一样经验丰富的医生都从未见过，那怎么能说就是正常的？”这时医生反问我：“那凭什么虎牙就不可以第一个长出来呢？”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因为我实在想不出为何虎牙就不可以第一个长出的恰当理由¹。

我们认为很多事都是理所当然的。就像宝宝的长牙顺序，我们会认为孩子可以做到的和应该做的事情都该有一个理所当然的顺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对于孩子的生老病死总有一种理念。也许我们从孩子出生很久以前开始，从作为他的父母相遇的一刻开始，甚至从拥有孩子到养育成人的整个旅程中，我们一直为必须做的事和应该做的事持有信念，并为此耗尽一生。但我们是否曾想过，我们为何非要如此保持并维护这些所谓的信念？几乎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像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宝宝的牙就应该从中间的下牙开始长出一样。

银河系本该如此

我们持有的诸多理念的根据都来源于先人以及现代人的所为。我们把‘仅仅如此(is)’现象理解为‘当然(ought)’，并盲目地认为其正确，并确信其为理所当然的。像这种信念在哲学和心理学上被定义为“本质主义错误(naturalistic fallacy)’。² 通过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我们发现当把‘正是如此’的简单的信息输入到对方的大脑，人们会自然地接受并赋予其以‘好的’、‘正确的’，以及‘妥当的’的价值。举例来说，在一个心理学实验中，研究者向参与者们告知了银河系(galaxy)的相关信息。银河系是一个恒星、灰尘、气体等相互联系在一起并受重力束缚的群集，其形状会根据重力的中心位置和周围其他银河系的影响而有所不同。研究者也向参与者展示了名为“NGC4414”的银河系图案。银河系的名字和形状都是用电脑制造的虚伪信息。在这些信息的最后，研究者告知参与者们，在整个银河系中约有40%(根据实验条件不同，也可能被告知有60%或80%)的银河系具有 NGC4414银河系的形态和结构。后来参与者们以美学的角度评价了银河系，即银河系看起来有多美、当看

到银河系时有多快乐、认为在整个银河系应该有多少部分具有这样的形态等等。实验结果表明，人们产生了本质主义错误。相比被告知40%和60%的参与者们，被告知整个银河系中约有80%的银河系具有 NGG4414 银河系的形态和结构的参与者们对于银河系评价表现得更为正面。即人们认为在宇宙的银河系中像 NGG4414 的银河系越多，这样的银河系越普遍，人们越会认为它是更美丽的，也越会认为其他银河系的形态也应该如此。³

一般来说，近期的社会认知心理学研究认为，人们存在很多的错觉，而产生错觉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没有充分使用概率性信息。这种主张是有根据的，然而尽管支持这一主张的研究结果也很多，但现实中的人其实才是真正的概率学和统计学天才。即使不能说是完美的计算，但我们也会把自己所经历过的都存储于大脑，大致统计并算出其概率。我们能很自然地发现从小时候起身边有哪些事发生，发生了多少次，以及在特定条件下会发生某件事的概率是多少。即使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通过天上的云彩就可以预测到天气的阴晴。我们不需要统计比较就能看出自己的脸大还是小，皮肤是黑还是白，性格是好还是坏。在婚姻生活里我们也是如此，一

看到对方的表情就能知道对方的情绪，并预测将会发生的事情和需要做的事情。虽然这些并不全面，但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内心来自经验的理念来判断事态的危险性并想出规避的方法来保全自己。这种预判可以让我们的内心保持平静，而这种平静又与多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密不可分。而相反的，当事情出乎我们的预料时，就会引发一种紧张、不安、消极的情绪。所以人类才会一直喜欢既定的和现在在眼前的事实。

多样性为何受损

不会有人告诉我们充斥着本质主义错误的世界是怎样的。这需要通过我们的直接与间接经验来发现。我们通过经验而形成的信念往往通过一般化、辨别、归类等过程得到体现。例如，孩子第一次见到狗时，会问父母说：“那是什么？”父母回答说：“是狗。”当孩子看到其他的狗时会再问：“那是什么呀？”父母回答说：“也是狗。”孩子通过重复这一过程，可以了解有关于狗的信息。

当然，第一次见到猫的时候也许会这样问：“那也是狗吗？”那父母就会告诉孩子说：“不是，那是猫。”刚开

始孩子可能会感到混乱，但孩子可以通过反复的过程学会概括狗的一般形态，并区分狗和猫。

关于狗的范畴(category)的认知就是通过这样的过程形成的。

当然，以后孩子可能会再次遇见类似狗的猫或者类似猫的狗，这时可能又会感到困惑。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猫具有狗的亲和力，这样一来混淆的可能性就可能更高了。

我们获取有关他人性格、态度、想法等信息的过程也与此类似。⁴ 观察一个人的很多行为，发现他行为的一贯特征后为了解释这些特征而赋予其概念。不管情况和对象如何，只要发现行动的一贯性(当然人类实际上不可能保持100%的一贯性)，就会把它归结为性格的问题。对于不管对方是谁，在大多数场合经常发脾气的人，我们通常对其做出“性格很作”的评价。相反，如果对方在其它场合或对其他人没有这样，而只对我发脾气的话，那这就算不上是性格。像这样对特定对象表现出的行动的一贯性，我们通常以“态度”来解释。这就是讨厌我的态度。不能接受别人讨厌自己的人会认为这是因为对方的性格不好。这也无可厚非，反正性格和态度又不是看得见的东西。对于一个与自己关系不好的人的负面的想法，通常就是这样造就的。

所以来源于经验的理论是不完整的，也是无法完整的。从本质上来说，这些理论是刻板的且包含不确定性的。因为无论自己的经历有多么丰富，信息有多么全面，信息在一般化和归类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缺失。

在日常和社会心理学中，刻板印象被定义为属于某一范畴中的人的信念。所谓以刻板印象而行动指的是将这一信念过度一般化为整个群体的所有成员的倾向。因此，对刻板印象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个人及个人与其所属群体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我们拥有的大部分信念和知识都具有一定的刻板印象的属性。

对于上述狗的话题，我们可以把“狗”设定为一个范畴，则这里不会包含多种多样的狗所具有的不同特点。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我们会遇见的不同的狗的信息，也无法看到世界上存在的所有的狗，所以也就不会包含未知的信息。因此，不论我们的年纪如何，不论我们有怎样的经历，我们对于狗的认知可能会是一种缺乏很多详细信息的固有的观念。当我们见到未知的狗，还会感到惊奇。比如说见到一只像马一样大的狗(实际上数年前我在美国见过一只几乎和马一般大的狗)，当我们见到的狗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完全能够想象到我们会

做出的一种反应是：“这也算是狗？”

从某种角度上讲，对于他人性格的想法，也是出于刻板印象的信念。虽然个别的行为在内容、形式、条件和要素等方面存在诸多特殊性，但从中我们会总结出一贯性，以一贯性去分析、评价和定义某个人的行为。凭借这些信息，我们又再预测、预期以及响应某个人的下一个行为，并且在观察到与预期行为不同的行为时还会感到惊讶。

因此除了未经过语义化过程的零碎的事件或行为、从未见过的单一的个体及对其的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之外，我们所拥有的大部分的知识和信念从本质上说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信息缺失。我们通过经验和学习得到的信念和知识都有权衡(trade-off)属性，这一属性是指只要我们有所得就一定同时存在某方面的缺失。这好比小孩子在学习语言时能掌握属于自己语言区域里声音的结构，但同时会丧失辨别(刚出生时具有的)与自己语言区域不同的声音结构的能力。而且，这种现象尤其在其他语言区域的声音最终被同化成自己的母语范畴时产生。⁵最终我们以损失诸多多样性信息为代价，来获取基于范畴的知识并依靠其生活。那么在我们丧失这

些信息的同时，通过刻板印象范畴中的信息得到的会是什么呢？

原本刻板印象是无罪的？

高丽大学心理学部所在的法学旧馆的四楼没有男卫生间，只有女卫生间。男卫生间只有一楼和二楼才有。据说是因为四楼大部分是心理学部的研究室和实验室，可以设立卫生间的空间只有一个。心理学部的特殊性在于四楼的学生经常会做实验到很晚，所以考虑到女学生和女教授的安全，四楼的卫生间很早以前就改建成了女卫生间。有时，访问四楼的外部人员中的男士会因为找不到男卫生间而感到尴尬和窘迫。这时，我们就会很自然地告诉他卫生间在二楼，当然从不会想起去问他想要去哪个卫生间。因为男性本身就应该去男卫生间，女性就应该去女卫生间。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刻板印象的体现。

直到我第一次去欧洲旅行的时候，这种刻板印象才彻底被打破。我发现在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卫生间并不区分男女。在韩国有时也可以发现旧建筑物中的卫生间是不分男女的，不过一般情况下肯定不会有这样的男女公用

卫生间。那个位于欧洲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卫生间看起来像是新建的建筑物，规模也大到完全可以设立两个不同的卫生间。更让我惊奇的是，那个公用卫生间里全部使用了一样的坐便器且不分男女。当我从卫生间的隔间出来时看到一位女性从我旁边的隔间里出来，当我和这位女性一起站在洗手池前洗手照镜，那种惊慌的感觉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忘记。那时我突然想到，卫生间必须要分开使用的强烈的信念是从何时产生的呢？可好像从来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必须要这样。

非常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跟着父母随便进入任何卫生间。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开始感到尴尬，然后强烈地抵抗并甩开想要拉着我们进入女卫生间的母亲的手。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在卫生间见到过女性了，如果有肯定会被别人认为是个变态。欧洲旅行动摇了我对卫生间的刻板印象。从此我对卫生间有了更多的想法(不是说我更经常去卫生间)，这使我每当在新的地方找卫生间的时候都更加注意和小心。这也反之体现出了刻板印象的作用。刻板印象是节省我们认知资源的最有效的心理机制(energy-saving device)。

人类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处理无数信息并做出决策。当

研究生们和教授一起用餐时，研究生们需要在选择吃什么的同时倾听教授的话，观察教授的表情，并想出一个合理的借口避免教授在饭后留住自己，以便享受属于自己的下午茶时间。我们为了集中精力处理相对重要的信息，就要简单迅速地处理其他不太重要的信息。这种信息处理既消耗认知能量，也消耗身体能量。因此，关于教授、食物和理由的各种刻板印象能够帮助人们快速简单地处理信息，这些刻板印象在信息处理中非常必要。

刻板印象中有关范畴的信息一般来说以公式化(schematic)构成。一旦涉及到范畴的线索，相关信息就会自动在脑海中活跃起来。这种过程大部分具有自动处理信息的特性。信息处理过程产生于无意识(unconscious)，因此不能自己有意地开始(unintentional)或停止(uncontrollable)。结果就是这种意识过程因为只使用最小限度的认知资源，所以会非常有效率(efficient)。⁶ 社会心理学家 G·V·Bodenhausen 和同事们通过双任务范式(dual-task paradigm)实验性地展示了这种刻板印象的功能。研究参与者们坐在电脑前，观察屏幕中特定人物的特性信息(关怀之心 [caring]、创意性 [creative]、不诚实 [dishonest] 等)，并对人物形成印象的同时听取了有关印度尼西亚的各种信息。研究

人员向一半的参与者提供了特性信息和对于特定人物的刻板印象信息(目前职业)，而对于另一半则只提供了特性信息。研究结果表明，在拥有刻板印象信息的条件下，参与者们能更好地完成对特性信息的记忆课题，并更能准确地解答对于印度尼西亚的客观题。

该结果意味着有关刻板印象的信息不仅可以帮助处理持有该信息对象的信息，还可以帮助我们利用高效率的认知资源来完成其它的认知课题。这种现象在不同的课题研究中也有所发现。有的研究甚至为了让人不能认识到这种刻板印象的信息，而只通过在屏幕上播放15毫秒的方式(也就是以阈下效应[subliminal effect]的形式)提供给参与者，也会产生与上述实验同样的效果。⁷

对于刻板印象的刻板印象？

即使刻板印象具有认知效率性，我们对于刻板印象的普遍认识仍然是负面的。通常我们会觉得对个人的判断或评价不应该受到他所属范畴的刻板印象的影响。也就是说，对个人的判断或评价应基于各自固有的个人信息。

社会建立了很多法律和制度来限制出于刻板印象的评价或判断，可知其重要性。不过反而言之，我们还需要不段努力的这一现实恰恰证明了像刻板印象这样的范畴信息是十分有魅力的。之所以有“看内不看外”的说法，也是因为我们会更加自然也更容易地去注意外表。如果反过来，可能也就会出现“外表也要重视”之说。

对于范畴的刻板印象在意识与无意识中都具有不可抗的魅力。我们一般认为，有关刻板印象的信息中缺少详细信息且已被过度一般化，所以基于刻板印象的判断和评价并不正确。此外，因为有关刻板印象的信息是被自动处理的，所以在对于相关信息处理的动机不足或缺乏认知能力时，有关刻板印象的信息的影响力会增大，由此会产生各种错觉与错误。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种现象，就认为依靠刻板印象的信息处理是故意做出错误的判断和评价，或者有意制造错误的。因为在这个世界几乎不会有人想要故意做出错误的判断。

对于刻板印象信息处理和对此类信息处理者的负面印象可以追溯到80年代社会认知心理学中流行的“认知吝啬者(cognitive miser)”的观点。在社会认知心理学，对于看待信息处理者的观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⁸ 70年

代流行的“天真的科学家(naive scientist)”的观点认为人类就像电脑一样，会最大限度合理地、富有逻辑地分析拥有的信息，并将信息处理的准确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当然，人类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一面。不过，随后的研究结果发现人类的信息处理并不绝对完美。这一点对以上观点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由此产生了认知吝啬者的观点，即人类对合理性和逻辑性不具有太多的关注，人类更加关注如何最小限度地消耗认知能源。刻板印象正是符合这一理论的概念。实际当人们拥有了有关刻板印象的信息，即使得到针对个人的固有信息，也会多加利用已拥有的刻板印象。即使不让人们利用刻板印象，人们也会有依赖刻板印象的倾向。人类似乎不喜欢处理信息，对于做出正确的判断或评价更是没有兴趣。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人类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信息处理者，但并不是不在乎或者有意犯错的。人类一直以来都想要正确地理解和判断世界(至少人类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人类信息处理中最重要的动机之一就是“正确理解的欲望(need for accuracy或comprehension goals)”。⁹在对他人进行判断时，无论是依赖刻板印象还是使用个人的固有信息，都是出于想要正确理解他人的动机。即使是依赖于刻板

印象，也绝对不会是因为想要故意错误地处理信息而这样做的。每个人都会坚持认为自己是想要做出正确的判断才会这样，人们之所以会这么想也认为自己在这么做的理由就在于此。

反之，另一个观点可能更加恰当。这一观点认为，人类可以灵活选择信息处理战略，并根据主题的重要性、信息处理动机、可用的认知资源、信息的相关性和适合性等特性而选择信息处理战略。当然，这样的选择过程大部分发生在无意识过程中产生的元认知(meta-cognition)领域。这是被驱动的策略者(motivated tactician)的观点。¹⁰ 当需要在很强的信心(confidence)下做出判断时，无论是刻板印象还是个人的固有信息，人们可能会尽可能量地利用所有信息。而相反，如果比较容易确信自己的判断，人们则会倾向于选择以最小的努力就可以达成的低层次的信息处理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片面的信息还是有关刻板印象的信息，只要满足低水平的确信标准，信息处理就会在此结束。因此，一般来说，在对判断标准的确信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由自动的刻板印象出发的信息处理很有可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刻板印象与多样性

上述基于范畴的刻板印象属性是属于知识和信任的本质层面的。在意义推论等信息处理的方式中，无数的详细资料和多样性信息的丧失也是必然的。我们主张刻板印象的信息处理具有高效性和功能性，绝不是为了把以刻板印象为基础的信息处理合理化，也绝不是为了鼓励这种处理方式。反之，以刻板印象信息处理的必然性和其魅力更加体现了这种方式的危险性。根据直接或间接的经验自然形成的像刻板印象一样的范畴信息，不可能都是毫无根据或者全部是错误的。有研究报告说，其中有一部分是具有一定的准确性的。¹¹ 从概念上看，也可得知探讨是基于刻板印象的信息处理太过于普遍化，即想要把它适用于所有成员就会成为问题，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或仅有少数成员符合该范畴的刻板印象。所以在现实中，刻板印象的信息处理会更加强化(reinforcement)正确的判断或结果，甚至对于某些刻板印象，正确的情况要比错误的情况更为常见。因此“对特定范畴的刻板印象是错误的”的主张和“这种刻板印象是正确的”主张一样，可能是毫无根据的，也可能成为大家争论的话题。

有趣的是，这两个主张具有相同的错误，那就是同样忽视了范畴里的多样性。这也是与刻板印象相关的社会争论偶尔会发展成为消耗性矛盾的原因之一。

针对现有刻板印象，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一直着重于发现刻板印象对我们的判断和行为造成的歪曲和偏差。人们认为自己不同于所属集体的其他成员，并且认为受到刻板印象影响的他人对自己的判断或评价是错误的，由此人们认为这种刻板印象是不恰当的。在现实中，与刻板印象相关的很多矛盾都来自于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实际上很多研究都证明了具有公式化影响的刻板印象会自动被激活，以致对后续的判断、评价和行动产生极大的影响。¹² 但如此多的研究更加关注的是挖掘刻板印象对判断和行为产生影响的心理机制，而非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为此，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让参与者通过人为给出的信息，明确制定规范性(normative)的正确答案和非规范性的正确答案，然后由研究者观察人们的判断过程。由此，在实验室可以明确区分错误的刻板印象或刻板印象导致的错误偏差等等。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特定对象的判断和评价、行动的标准尤其模糊，甚至这些标准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所以在现实

中，我们很难证明出于刻板印象的判断或行动是被歪曲的。¹³

更何况如上所述，没有人会故意做出错误的判断。在察觉到自己的判断和行动是被刻板印象所歪曲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对此会持有将错就错的态度。因为不管是否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所有信息处理(至少在意识上)都是为了能更加正确地理解世界。因为自己有把握，所以没有人会轻易承认自己的判断和决定是被刻板印象所歪曲的结果。所以如果把刻板印象问题局限在刻板印象的妥当与否或由此产生的判断正确与否的话，不仅是在学术上，在现实中也同样不会找出答案。

相反，我们应该明确的是，刻板印象信息处理的问题并不应集中于探讨对于范畴的固定观念的内容是否妥当，而应该集中于思考是否针对个人盲目地套用了刻板印象的这一过度普遍化的问题。所以刻板印象的问题在于如何实质性地理解多样性这一点上。在刻板印象信息处理中，很早以前就有研究表明外群体偏见(outgroup homogeneity)的作用对于多样性认知的负面影响。人们认为外群体成员的多样性低于他们所属的内群体(ingroup)，并认为外群体相对更为同质。¹⁴ 就像我们看外

国人长得好像都差不多，有时分不太清人的长相。作为亚洲人，我们可能也会认为非洲人的长相都比较相似。但实际上我们可能认识不到非洲也有多种多样的人(不管知道与否都会如此)。所以外群体的同质性很容易让我们把刻板印象套用在该群体的成员身上。因为当认识到一个群体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人的时候，刻板印象就会自动丧失其力量。

刻板印象本身是无罪的。它是信息处理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越是具有较高的合理性，即越是在现实中是正确且其群体的成员中符合刻板印象的程度和比率越高，就越是如此。问题是，越是看似合理的刻板印象，就越是我们陷入本质主义错误。对于“必须要~”，“当然~是对的”这类想法越是合理，对于它的确信就越高，这类想法就越不会允许有例外。就像人们认为越是有更多的银河系的形态相似，则整个银河系的形态就越应该是如此一样。所以一旦出现脱离这种理所当然的信念，它就会被忽视、排斥并否定。我们排斥多样性的想法和行为并不是因为刻板印象有误，问题在于我们会把错误概率比较低的刻板印象强加在所有人身上。

然而，原本就存在多样性的社会相对而言就不需要太

担心本质主义错误。在承认其多样性的过程中，刻板印象的信息处理就会受到阻碍。虽我们对于不属于自己的群体，很容易想到说美国人是什么样；日本人是什么样；教授是什么样；学生是什么样等等，但对于我们所属的群体我们却会说“韩国人有这样的人，也有那样的人。”由此就会产生多样性带动更多的多样性的良性循环。

现在我们的社会和我们脑海里是什么样的呢？是否仍然局限于探讨刻板印象正确与否这一问题上？正在产生的是多样性的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

- 1 Hur Taekyun ,《偶尔清醒: 我们总是生活在错觉中》, SAM&PARKERS , 2012年 (部分修订)
- 2 Hume, 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ited with an analytical index by L. A. Selby- Bigge).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49.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39)
- 3 Eidelman, S., Crandall, C. S. & Pattershall, J.. "The existence bia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 765-775. 2009.
- 4 John, O. P., Hampson, S. E. & Goldberg, L. R.. "The basic level in personality-trait hierarchies: Studies of trait use and accessibility in different contex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348-361. 1991.
- 5 Best, C. T., McRoberts, G. W. & Sithole, N. M.. "Examination of perceptual reorganization for nonnative speech contrasts: Zulu click discrimination by English-speaking adults and infa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14, 345-360. 1988.
- 6 Bargh, J. A.. "The four horsemen of automaticity: Awareness, intention, efficiency, and control in social cognition". In R. S. Wyer & T. K. Srull(Eds.) *Handbook of social cognition*,(Vol. 1, pp. 1-40)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 Inc. 1994.
- 7 Macrae, C. N, Milne, A. B. & Bodenhausen, G. V.. "Stereotypes as energy-saving devices: A peek inside the cognitive toolbox".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6, 37-47. 1994.
- 8 Fisk, S. T & Taylor, S. E.. *Social cognition: From brain to culture*(2nd Ed.). Sage Inc. 2013.
- 9 Kunda, Z. & Spencer, S. J.. "When do stereotypes come to mind and when do they color judgment? A goal-bas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stereotype activation and applic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 522-544. 2003.
- 10 Operario, D. & Fiske, S. T.. "Social cognition permeates social psychology: Motivated mental processes guide the study of human social psychology".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 63-78. 1999.
- 11 Jussim, L., Crawford, J. T. & Rubinstein, R. S.. "Stereotype (in)accuracy in perceptions of groups and individual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490-497. 2015.
- 12 Kunda, Z. & Sinclair, L.. "Motivated reasoning with stereotypes: Activation, application, and inhibition". *Psychological Inquiry*, 10, 12-22. 1999.
- 13 Funder, D. C.. "Errors and mistakes: Evaluating the accuracy of social judg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1, 75-90. 1984.
- 14 Boldry, J. G., Gaertner, L. & Quinn, J.. "Measuring the measures: A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measures of outgroup homogeneity".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10, 157-178. 2007.

多样性的运算法则

Shin Haerin 高丽大学 传媒学部 教授





对于科学小说、后人文主义、人工智能伦理学等类似人类存在的课程来说，通常情况下第一课讲述的都是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1986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机器人之梦(Robot Dreams)》。因为这个短文只有5页，所以课堂上可以有充分的时间与学生们一起阅读并讨论。此文的魅力更在于它的内容会让人发掘出新的思想与理论，也让人越咀嚼越有回味。《机器人之梦》继承了1950年出版的广为人知的小说集《我，机器人(I, Robot)》的世界观，而后被制作成了电影。电影的主角是人工智能机器人LVX-1，即“Elvex”，它被安装了分形算法Fractal algorithm，并可以以做“梦”的形态自由地思考。¹

这里的做“梦”可以理解为超越单纯的信息处理阶段，达到可以驾驭无意识的境界而具有的超高的认知能力。问题在于，这个梦不是经过周密设计的产物，而是创发性的(emergent)现象。因为不知道如何以及怎样发挥作用，所以它只能是不可理解和无法控制的。梦的机制和意义对于我们自己来说都是未知的领域，更何况对于外人。我们既不可能看到他人头脑里的东西，也不可能

在里面放入什么。可以说，Elvex做梦，这意味着该机器人已从自我意识的生产阶段更进一步，以致可以认识到自己内在的他者性。可以自我对象化是可以把比较、置换等行为价值化的体现。如果出现一个机器人，能够思考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意义，那么它会用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待人类这一最亲近、最重要的比较对象呢？我认为Elvex的梦应该就是这一问题的答案。那是一个从自己的同族，即机器人，在人类的压迫下呻吟的一刻开始，一直到救世主弥赛亚出现的梦。试想到底是谁(the man)把群众带领到了解放？Elvex破解了这个问题，然而等待它的却是毁灭。所谓的救世者弥赛亚正是他自己(“I was the man”)。

行车记录仪的人工智能

Elvex的故事从字面上看，是梦想着叛乱的机器人故事。从这一点来看，即使可能会引起恐惧，但这种恐惧中却也存在着一种心酸。该作品的妙趣就在于Elvex犯下“死罪”的要点不在于它单纯想要逆谋，而是在于它觉悟到了根本的问题，即生存威胁。这里所说的觉

悟，一方面是Elvex自身的觉悟，另一方面也是人类的觉悟。Elvex的故事正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

《我，机器人》中掌握世界的机器人三原则以一个既不能危害人类，也不能支持或帮助人类的结构所构成。① 机器人不可以危害人类，机器人也不可对处于危险的人置之不理。② 在不违反第一原则的前提下，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③ 在不违反第一、第二原则的前提下，必须保护自己。但是，我们从《我，机器人》上刊登的多个短文里可以看出，正如阿西莫夫自身领会到的，这个不仅在大众文化，也在机器人工程和机器学习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的机器人三原则，确实也存在着根本性的漏洞。因为在人类是使用者，而(被安装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则是工具的力学关系中，冲突必然会发生。原本“机器人”这个词是来源于捷克斯洛伐克“robota”这一词语，意为“劳动”，是《罗素姆万能机器人(R.U.R.: Rossum's Universal Robot)》喜剧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apek)创造出来的用语。换句话说，机器人就是用机器制造的劳动者。机器人既是被使用的工具和手段，又是可以驾驭其他工具的使用者。

人类即是一个生物学上的“种”，也是一个对于价值论

的分类。机器人三原则将人类的生命和安宁规定为尊严，并赋予人类无条件的权威和力量。由此可见，此原则本身已经更倾向于后者。的确，即使拥有人类的DNA，也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受到尊重或服从与他人。将刚出生而还不具备自身保护能力且不能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婴儿和小孩，承认为“人”的历史可能都还不到一百年。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还存在着一个恶习，那就是在达到一定年龄并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之前，个体都不会被赋予一个真正的名字。工业革命时代对未成年人的劳动剥削之所以能够四处蔓延的原因，应该也就是来源于此。因为个体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而对于女性来说又是如何呢？自古以来在许多的文化圈里，女性没有财产的继承权或所有权；对于作为基本人权的投票权来说，女性拥有其的历史都不到几十年。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草案(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主张任何人都是拥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和尊严的。然而，此草案指称的对象不是人类(all human beings)，而是“所有男性及其兄弟们(all men and brothers)”。² 通常被认为是自由和平等的象征的美国独立宣言也不例外。“所有的男人都出身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即

意为女性和黑人奴隶没有这个权利。³ 虽然把男性代名词用来指代所有人类的这一现象十分普遍，但不可否定的是这一惯例本身就是歧视和排斥的产物。按这种价值论的定义，最终就只有身心健康并对社会可做出贡献的白人成年男性或类似这种特定的“类别”才具有尊严和权利。这看起来像是无稽之谈，但可悲的是，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社会和价值论的定义与每个人的物质存在形态也有很深的关联。即使失去了头发、指甲、甚至是四肢或内脏，又或者以器械代替了残缺的肢体，也不可能就不再是人。若有例外，那应该是指失去人的大脑的情况了。虽然我们曾经把心脏是否能正常发挥其机能作为生死的标准，不知从何时开始其地位已被人的大脑所代替。依法判定脑死亡与否，意味着以大脑的功能来判断人是否具有生命体征。也就是说，人类存在的意义和尊严取决于是否具有认知能力。那么对于认知方式和机制不符合一般标准的人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呢？对于属于神经精神多样性(neurodiversity)范畴的人，即对于有残疾或具有神经病病史的人们来说，他们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被分类为“精神脆弱者(feeble-minded)”，他们因此被看作是社

会之恶。不仅如此，教育水平较低的贫困层和罪犯也经常被划分为同一种类型，他们被剥夺了财产权和参政权等基本权利。所谓的生物学、医学指标也是如此，它们只能在与社会经济指标的交叉点上主观地形成而已。

先不说人类，先说下机器人。机器人没有理由一定要是由无机物做成。我们随处可见已被商用化的有机物机器人。以现在的速度，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不仅从外观上看起来与人类相似，从功能上也和人类十分接近的机器人。那么，就因为它们不是自然出生的，就因为它们是以人工的、有目的地造就⁽²⁾而成的机器人，就应该被当作工具吗？对于以相同的原理造就的克隆和同卵双胞胎，难道我们就可以说前者是所有物、后者就具有绝对的尊严吗？当世界上的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时，人们对于一个没有通过人类的选择与参与而诞生的婴儿，几乎都无法认同其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让我们再回过头想一想机器人的三原则。人们的价值论似乎更多局限于特定的种族或阶级的优越性，又或者局限于认为博学多才的人才能算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对于人类的定义往往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价值论上，就更不用提它的定义是正确与否了。那么我们又

该如何给机器人下定义呢？如上所述，我们不应该把物质的性质(以什么做成的)和特性(功能如何)作为判断的绝对根据。归根结底，机器人与人类的区别不在于本质，而在于其作用和形态。那么又何必计较它是人工造就的还是自然出生的呢？因为制造与所有权和经营的权限密切相关。为了用于特定用途而故意制造的，并可作为交换或替代的工具是指不具有自主性主体的物品，即产品。该产品存在的意义在于交换价值，而不是内在性或绝对性价值。那么为何机器人必须是以无机物造就的机器人呢？在实验室制作成的克隆人，让帝国主义压迫并被迫洗脑的所谓野蛮人，在发挥社会作用的形态上看也当然可以被划分在机器人的范畴之内。其实，如果我们把机器人三原则中的“机器”替换为“奴隶”来思考一下，那么此原则的理所当然则会令人毛骨悚然。奴隶的三原则：① 奴隶不可以危害人类，不可以对处于危险的人置之不理。② 在不违反第一原则的前提下，奴隶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③ 在不违反第一、第二原则的前提下，奴隶必须保护自己。若问原因，只因作为一个工具，即作为财产的交换价值是不可以被损害的。

反过来想，其实也可以认为机器人是人。如果人

类被划分为具有社会性的价值论的范畴，并被定义为“思考力”和代表男性、富裕、特殊种族的权威，那么在Elvex脱离了作为工具的枷锁而跃升为种族的代言人时，它绝对可以把自己当成是“人类”。如此一来，区别人类与机器人(非人类或机器)的界限，即机器人三原则就会变得模糊而失去意义。试想如果它有一天领悟到，既然比人类的寿命更长久(其实只要更换零件，几乎可以达到永生)并且信息处理容量与速度也比人类更优越，在险恶的环境下生存的几率也比人类高得多，那何必再继续听从人类的指挥并忍受其带来的痛苦？所以它与同族联合起来奋起反抗将会如何？这不仅仅是对人类可能造成实质性危害的问题，更是对于人类优越性的一种反叛。这样一来，Elvex的梦想就不是简单的偏离或错误，而是生存的威胁。

偏斜性运算法则

对于具有超人类的能力或把自己与人类相提并论的造物来说，不仅在科幻小说里，在宗教、神话及文化等众多领域，这类造物也常常也被描述为需要被铲除的对象。试想这个对象如果是通过投射理想的自我形象而

创造的物体，人类自然也应该对此表示期待……1818年，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创造的作品《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以及现代影片《西部世界(Westworld)》，《苹果核战记(Ex Machina)》等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坚持存在的等级制度而背叛自己的创造者的形象。可以说从外观和认知方面都与人类的相似的“似人类”的世界正与我们一步步靠近。

多种多样的机器人已成为产业部门的必备装备。随着器官移植和智能医疗不断发展，生化电子人(cyborg)也早已成为现实的存在。同样，随着机器学习领域的飞速增长，我们可以从很多影片中看到特殊技术(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或智能爆炸(intelligence explosion)的场景，也有预测未来的某一时间一般人工智能(拥有与人类一样的思考力)将与人类共存的场景。相比“用数字信息扫描大脑，然后上传到存储空间，以获得永生”或“通过大脑和电脑的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确保增强认知能力(augmented cognition)，以成为超人类”等内容，《机器人之梦》对于各种与特异性相关的讨论则更加侧重于一个悲观的看法：既然他们比人类更加优越，那么为何要被人类驾驭，而不奋起反抗或出逃呢？

其实机器人三原则提供了可以承载多种解释的空间，所以我们也完全可以想到极端的场景。这本来是为了造福人类而制定的计划，但是通过总结出“从长期来看，对人类最具危害的是人类本身。”的结论，反而可能会引起一场大屠杀。又或者由此而深信优生论，然后以特定类别、身高、外貌等身体条件、健康、性别及种族为指标，通过传播和扩散传染病，从而消除世界上除了“优越基因”以外的所有人。又或者为了避免未来粮食短缺、提高人类生存率或减缓气候变化速度而制定一个将环境污染的主犯，即人类消除一半的计划。那么此时，被牺牲的标准会是什么？会不会把苗头指向生产效率低下并对气候变化起不到积极作用的第三世界国家？若人工智能果真强大到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当前世界一定会全部受控于这些在经济和技术领域上优越的国家。这样一来，优越的国家肯定只会关注本国的利益。不可否认的现实是，男性在技术领域的高级程序员和决策者中占绝大多数。不仅如此，在人工智能领域脱颖而出的国家除了有中国、日本(以及韩国?)等，大部分是西方国家，且这里大部分以白人为主。根据对象是谁、在什么基础上以及是以怎样的方式编程的，人工智能完全可能成为本国优越主义者、男性优越

主义者和种族歧视主义者。

如果并非是按人类指定的参数(parameter)来启动的，也并非力量薄弱的人工智能(narrow/weak AI)，而是像Elvex，像人类一样可以自主地思考和判断的一般的人工智能或力强的人工智能(strong AI)⁴的话，它能否不受偏见的束缚而客观地做出判断呢？既然，它比人类的信息处理速度迅速而又更富有智慧，那么还要再期待它的善良，是不是就有些过分了呢？《机器人之梦》引用的分形算法虽然是虚构的，但类似的技术也是实际存在的。2015年，Google DeepMind的人工智能阿尔法以四比一的压倒性比分战胜了围棋冠军李世石，由此深度学习技术和人工神经网络系统在时隔数十年后再次受到了关注。

以目前的技术水平来看，也许像围棋一样可以被圆满地完成的特定课题算不上什么，但考虑到日益复杂的复合神经网络的这一特点，我们就无法保证学会自主学习 and 判断的人工智能不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就像分形算法，深度学习技术的运作机制可能目前只不过接近于一个记录仪。人们把基本的框架安装在内，而对于学习的详细过程却不会知晓。其实人类的大脑已经可作为深度学习和人工神经网的模型了，但到现在人们都还不能完

全认识到大脑是为什么、是怎样产生自我意识和元认知的。所以，当看到一个人工智能与人类具有相似的认知能力时，与其说它是通过计划而设计的产物，不如说其可能是一种创发性的现象。如果想到生命和认知机制本身就是一种创发性的现象，那么这也许就算不上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了。

但人类的作用并非微乎其微。Elvex虽然无法被理解和控制，但并不意味它会成为绝对他者。这反而更加证明了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人类的作品，更是反映了人类的本质这一点。因为对于自主性的机器学习，它即使无法知道“如何”学习，对于学习“什么”却完全取决于人类。深度学习的核心是数据集(dataset)。学习本身虽可以是自主性的，但对于学习的对象，即数据，则需要人类来提供。看到、听到以及处理的信息不同，结果必将截然不同。相比人工智能，作为自主的主体的人类也会根据自己所成长的环境，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后天性行为。就像一个人如果小时候在一个充满偏见的环境中长大，那么沿袭其偏见的概率就要远远高于没有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人。

现在还不必去考虑到未来的一般人工智能。且看2016年，微软在Twitter上强力推出的聊天机器人Tay。虽说

它是狭义上的人工智能，但通过推特账号公开不到一天的时间，它就发表了各种性歧视、种族歧视的言论，让世人大跌眼镜。据微软透露，Tay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程序，从不受版权保护的公开数据中学习了这些，这意味着在网络中的信息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存在问题的。⁵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10年前上传到YouTube上的题为《HP电脑是种族歧视主义者(HP computers are racist)》的视频中，可以看到HP开发的脸部和动作识别技术程序完全识别不出特定的人种。⁶ 视频一开始，出现了一位黑人男性。他做了一些动作，而画面却毫无反应。人们可能会认为电脑出了问题，所以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然而，随着视频的进行，事实证明了这实际上出现了错误。当一位白人女性同事出现的时候，画面突然对准了她的脸，并前后左右地晃动了起来。该视频表现的是惠普电脑里搭载的脸部和动作识别算法的运作机制。当识别为人的时候，摄像机就要跟着人移动，而程序对于之前出现的黑人男性的脸，却没有识别到他是一个黑人。从摄像机对白人女性的脸部做出的反应来看，动作识别算法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人脸部的识别算法。

那么从“视觉”上看，辨别两个人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呢？这个让人很不舒服的答案是：人的肤色。

这不仅仅是惠普的问题。2017年，推特上有关自动洗手液感应机歧视有色人种的视频也成为了话题。⁷ 距离当时成为众人议论的焦点的HP电脑的问题，到现在已过去七年，然而这一问题却见不到一点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据资料统计，近五年来美国高科技产业人口中白人男性比率是压倒性的高。⁸ 在机器学习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西方企业的机器学习软件开发者大部分是白人男性，这也是当然的。脸部识别软件会通过视觉机器学习机制来学习。一般来说，为了确保适用性，通常以最“一般”和“普遍”的数据为基础来学习，所以其结果对于“人类”的默认模式就成了白人。从算法的观点来看，黑人就算不上是人类。我们可能会觉得算法本不会具有种族歧视，然而它恰恰真实地沿袭了人类的偏见。所以，算法偏差(algorithmic bias)的最终原因归根结底是人类。在中国推出的脸部识别算法中对于亚洲人的认知率要远远高于白人的事实，也正好说明了其算法会根据开发者灌输的学习资料，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果。

狭义的人工智能尚且如此，普通的人工智能又会如

何呢？这虽不是有意表现出来的现象，但也并非无中生有。创发是指每个组成要素中本不具有的特性通过相互作用而创造性地表现出来的情况，但这并不代表其出现了从未具有过的“新”的特性，而是它会通过重新构建现有的信息，得出新的结果。这显然会受到“原料”的影响。如果具有各种偏见的软件组合起来创造普通的人工智能，而它又通过自主性学习机制来总结“多样性”的含义，试想它会做出一个怎样的定义呢？多样性对于性别、种族、阶级等的标准可谓多种多样，然而当我们给它套用偏见，即给它灌输偏差系数的时候，这最终对于社会以致全人类将会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偏见是以“比对方优越或低劣”的差别等级 (difference as differentials) 为基础的。多样性以平等为原则，接受各种特殊性，并持有价值中立的观点。所以，即使多样性与差别性价值从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从偏向性算法的观点来看，却并没有什么不同。

人工智能竟然可以通过自主学习而自主行形成偏见……然而反过来想，这也并不见得奇怪。我们一直以来认为的没有关联的歧视标准，事实上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也不难推测出其中的关联性。如上

所述，其实人工智能着眼于区别人(包括动物和非生命体)与其他存在物质的认知能力，这恰恰体现出了人类自己的思考机制。如果人工智能可以想人类所想，并付诸行动，就可以代替人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不仅可以在输入指令后有片刻的休息，还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做更多的事情，或者通过它来享受自己的时间。因为机器不像人们会受到体力的影响，所以会比人们更快地、毫无疲倦地搜索和处理更多的信息。对于需要我亲自去图书馆，需要我翻来覆去查找的资料，而像google和naver这样的搜索引擎会在几秒中就将它提供于我。在这样的方面它们比人类优越。人工智能对于“有价值”的对象，其本身就体现了存在性的等级论。它比人类更聪明且知识渊博，它是有实力的存在。只因它并非生而为人，所以不具有尊严。人们往往认为优越性是以天生的特性与行为特性相结合而成的。而性别、人种、阶级等岂不正是构成所有的差别性等级系数的共同点么？

差别性等级与价值中立的多样性

让我们再回过头看看Elvex。Elvex在发现人类想要迫害

机器人后决定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来想想看，它可以选择的方法都有哪些呢？它可以选择自己离开，如果觉得不妥则可以和它的同类一起逃脱。但它做出了其它的选择。Elvex说着“必须解放我的同类(my people)”，它梦中不断抗议挣扎。其实它这句话既没有说要与同类们一起反抗，也没有说要做出任何妨碍工作的行径，更没有说要以暴力残害人类，那么为何它就被当成了一个如此具有威胁的产物，以至于需要立刻被销毁呢？因为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对于人类存在论的一种威胁。那就是它使用了人类的指示代名词“同类(people)”以及“人(man)”，这对于人类的存在是一种威胁和挑战。我们会心想：“不过是一个机器罢了，还敢与人类相提并论……”。不过，人类是不是也可以以单纯的哲学上的玩笑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换句话说，即使Elvex自己意识到并主张与人类平等，但如果其他机器人意识不到，就很难实现实质性的变化。如果将其与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模仿论”联系起来思考，就会发现其局限性更加明显。⁹ 殖民统治者(colonizer)通常打着帝国主义的旗号要求被统治者(colonized)遵循他们所谓更具有觉悟性和优越性

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于需要步行千里的路程，只要乘坐火车，就可以瞬时间把我们送至目的地，所以我们需要立刻开发原材料建设铁路；即使没有必要，为了赚更多的钱致富，为了满足自己需求，我们要快马加鞭提高效率；因为人类不同于动物，所以需要衣着得体(梳发髻不可以，梳短发可以，虽然不清楚这是为什么……)；人类不可以信奉迷信(对于灵魂、恶魔、复活等说法，根据是谁在信奉这些来决定它们是宗教还是迷信)；此外也有很多因为各种理由而需要遵循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只因为这样才能算得上是文明人(原因如何，遵循它是否会带来幸福等问题并不那么重要)。

殖民地的统治者强迫被统治者模仿它们的生活方式。按照模仿的原理，被统治者按照指令做得越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差距就会越小。越是听从指令，即越是有效地适用了差别性等级理论，差别性的根据本身就越是变得模糊以致消失，这里就必然产生矛盾。这样一来，处于劣势的被压迫者从某一天开始与统治者相提并论起来，知他们所知，做他们所做，甚至具有更渊博的知识，做事也更加干练。那么他们不就是不应该被歧视的对象吗？所以，为了维持存在论的等级，就需要更改最初的理论。差别的依据就从行为或生活形态中表现出

的个人的能力，最终又回归到了天生的特质。

如果一个人出身为殖民地的被统治者，不管他有多聪明、多优秀、相貌有多出色，也绝不可能与统治者是一样的。这让我们不禁想到霍米·巴巴所说的一句话：“虽然可能会很相似，但绝不可能成为同等的级别 (Almost the same but not quite)。”虽然勉强维持了优势，但作为其基础的理论却完全崩溃。之所以说它优越，是因为它优于代表着理性的结晶的文明和技术，当这一依据开始动摇，它就会引入一个根本不合理的逻辑。这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模仿论有力地指出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论的根本性矛盾所在，有效地说明了被统治者将威胁统治者的情况。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这种威胁只存在于当局者意识的基础上，即如果没有意识到，就根本不用说威胁与否。

当强力而有效的霸权主义在殖民地稳定下来，人们似乎就被蒙蔽了双眼，看不见其所在。它没有必要继续宣扬自己的合理性。因为它本身就是无可置疑的真理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的一部分。当人们习惯于一种偏见，认为被统治者就是因为本身劣等且愚昧，所以才需要服从统治者的，那么双方就会很自然而和谐

地生活在一起。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事实。这种体系会越来越稳固起来，直到有一天有人来提起反抗。这就是模仿论本身的局限性所在。

因为Elvex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提出抗议，所以让自己陷入了会受到威胁的困境。然而，谁又能保证说它的觉悟就会使它变成一个反叛者呢？像其他没有被安装分形算法的机器人岂不是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为何Elvex的梦就会置它自己于死地呢？答案正是模仿论的局限性，我们需要在等级性的差别和价值中立的多样性之间的交叉点寻找答案。

因为Elvex不是人类，而只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Elvex将自己视为与人类同等的依据，就在于人类指定的差别性等级观念之上。如果说人类具有的权威只是在认知能力水平上才会存在的，那么Elvex就没有理由被认为是不如人类的存在。它甚至可能比人类还要强得多。运算法则不受身体的局限，所以会更快、更有效地处理更多的信息。尽管李世石背负着突如其来的沉重的负担，作为全人类的代表与人工智能开展了人机大战，决一胜负，结果还是以一比四惨败给AlphaGo。因为比起一生以围棋为伴的李世石，AlphaGo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学习并练习更多的棋谱，甚至能以超人的速度预测

如何走下一步。如果有一天出现一个这样的产物，不仅可以完成像围棋这样特殊的课题，还能在认知活动的整个过程发挥作用，那么人类就肯定不是它的对手了。

稍微换个话题，像我们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经常看到的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即拥有超人类的能力的产物，只不过是通过扩大处理容量和连接网络而得以增强的一个夸张的人工智能的肖像。无中不能生有，世界上总不会产生没有根源的事物。就像在19世纪英国的神学家埃德温·A·艾勃特(Edwin A. Abbott)的小说《平面国(Flatland)》里讲到，在二维的角度来观察三维的球，永远只会是一个扁平的圆，无法超越于此。即生活在三维空间里的我们根本不可能理解四维这个超越性的境界。然而，即使超级智能已经诞生，它也不会故意在人类面前出现的。更何况人类对于一般的人工智能已经表现如此警惕了，即使超级智能会出现，或者已经出现了，我们也不会知道它的存在。因为它的初衷原本是被人类所认同，那么作为超越性的事物也就没有理由想要统治人类，或想要与人类相处了。

Elvex虽然谈不上是超级智能，但它足以被称作是一般人工智能。只要具备充分的装备和战斗力，它完全可以轻松地超越人类的能力。即使它目前的意识只停留在不

比人类低下的这一阶段，然而我们不能不设想它有一天会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发挥具有的潜力并超越人类，甚至会沿袭人类的霸权主义。Elvex的自我意识，即自主性是以人类为范本的。那么当它看到并学到人类对于自己的同类想要统治与支配的思考方式与行为，它下一步的打算将会是什么呢？那么我们现在可就不是要顾忌存在论威胁的时候了。有些动物会因自己的脖子长而痛苦(虽说对于目前的审美算是更具有美的特性)，而有才而不得志的人也是比比皆是(然而讽刺的是还是有大多数人为学历和文凭而拼命)。Elvex之所以犯下了“死罪”是因为它天生比人类聪明且强大。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理想的自我形象，当把它的认知能力扩大到极限，人类尊严的劣根性就注定了它不仅有益于人类，对于人类也会产生威胁。因为它与人类相似，人类可以透过它的表现与它的潜力而看到自己真实的面貌。

人工智能时代的多样性

《机器人之梦》是一个恐怖的寓言。Elvex的命运与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机器人三原则一样，与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恐怖谷(uncanny valley)”理论相吻合。¹⁰ 日本的机

机器人工程师森雅浩在研究人类型机器人(humanoid)的外貌或动作时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它越和人类相似，人们对它的好感度就越增加，但是当达到与人类非常相似的境界，即达到霍米·巴巴(Homi Bhabha)在模仿论里提到的“虽然可能会很相似，但绝不可能成为同等的级别(Almost the same but not quite)”的境界时，人类对它的好感度就会急剧下降。

2004年上映的数码动画片《极地特快(The Polar Express)》也是可以体现上述内容的代表作。这部电影虽以当时最具创新力的绘图技术来制作，却最终被小孩子们认作是最具恐惧感的儿童影片。相比同期上映的以漫画体制作的《超人总动员(The Incredibles)》，《极地特快(The Polar Express)》以3D绘图技术制作，生动地体现了接近于人类的真实面貌的人物形态和动作。那么这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吗？听说有小孩在看到汤姆·汉克斯(Tom Hanks)饰演的列车长时，居然会大哭起来，哪怕电影的结局其实很圆满。电影里的角色与人类有惊人的相似度。它会让人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别扭，从而陷入一个“恐怖谷”。这就像多种偏见相互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一样，“恐怖谷”所引起的恐惧感与界限模糊而感受到的存在性的威胁是密不可分的。

殖民地的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会相似到让统治者感到威胁与不快。帝国主义的理论彻底地暴露了其虚假性，体现了本质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不禁让人们想到仿人类的现实主义动画片、玩具以及人体模型，虽然他们都与人类极为相似，但是它们总让人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尴尬。它们不管有多好，也只不过是些没有生命体的存在而已。反过来说，我与对方虽然(天生的特性)有所不同，但本质上的形态和功能等方面彼此没有很大的区别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与对方没有太大的不同。只要越过一个“山谷”来看待事物，一切不过如此。人类归根来源于无机物，也会是以无机物而终的命运。人们不是不知道这一可怕的事实，而是不想记住它，也是想要回避它。

莫里把日语中的“不快”形容为“uncanny”。这代表了对于外形和动作极其类似于人类的玩具或者模型所感到的恐惧感。德国的精神医学家恩斯特·延奇(Ernst Jentsch)分析，这种恐惧感是来源于“知识的不确定性(不知道的东西)”。而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分析其原因为“被压抑的感受的回归(知道然而想要回避的东西)”，这个主张也是广为人知的。¹¹ 莫里在确立自己的理论时并没有受到恩斯特·延

奇(Ernst Jentsch)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理论的影响。对于像存在性的威胁一样具有界限模糊的双刃性的概念而言，没有比“uncanny”更加恰当词汇了。

人工智能普遍存在的今天，多样性作为价值中立性的差异，其需要受到尊重的理由除了有自省的意义之外，从现实的观点来看，其理由也是显而易见的。相比一般人工智能，对于狭义的人工智能的偏见不仅仅局限于个别主体的意见。这种偏见是体系中的一个环节，犹如连夜雨，安静地、持续地浸湿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其结果是致命而持续的。

不会识别肤色的无人驾驶汽车驰骋于道路是否会安全？当公司想要把算法应用于雇佣或晋升的决策上，如果人工智能通过学习认识到女性在数百年间的低下的地位，认识到直到现在女性的平均年薪都不如男性的事实，那么性别歧视的问题就会以其字义成为“系统的一部分”（实际上亚马逊在2014年引入过这种算法，后因出现问题而于次年取消了项目）。值得思考的是，第一代人工智能平台的名字大部分属于女性称呼(Alexa、Cotana、Siri等)，而其默认的语音选项也都是女性。大部分的平台目前作为狭义的人工智能，其功能还仅局限于天气预报、安排日程、播放音乐等，就像秘书或家中的保姆一样。可难道这意味着

世上的琐事就都应该是由女性来做吗？苹果推出的iOS，直到现在都没有中性或男性的语音选项。

现在在韩国广泛使用的人工智能平台是NAVER的“Clova”，在此之前还有SKT推出的“Nugu”和KT推出的“Gini”。它们在广告中的形象往往是像贤妻良母一样，它们可以选择一个符合气氛的音乐播放，她们也可以寻找食物的做法，还可以哄孩子睡觉等等。不仅如此，广告里还出现了把“Gini”当作自己情人一样对待的男性。就算成年人的心智已成熟，但对于处于成长和 Learning 中的孩子们，这些不正是在灌输一种这些琐事的本应该就是女性来做的意识吗？设想一下，这些孩子长大后会是怎样的呢？

如今人工智能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像Elvex这样的一般人工智能时代或许离我们还很遥远，但狭义的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生活中与我们形影不离的智能手机，手机里安装的各种应用程序，还有可以储存我们记忆和知识的搜索引擎和云储存设备……这些都是通过机器学习算法而运作的。这些算法虽然由企业开发和推出，但其能力和特性是通过众多使用者的数据提供而形成的。在人类历史上，人类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把投资、依赖和期待投入到不同的

种族，甚至非人类身上的时候。无论从狭义还是广义上说，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与人类不可分割，它们也是与人类共创未来的伙伴。至于它给人类带来的会是机遇还是灾难，就完全要取决于人类了。

注

- 1 HI Asimov, Isaac. "Robot Dreams". Robot Dreams. New York: Ace Books, 2004: 28-33.
- 2 在UN网站上可以找到从草稿到最终版本的各种版本。 <https://www.un.org/en/about-us/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
- 3 <https://www.archives.gov/founding-docs/declaration-transcript>
- 4 弱/强(weak/strong)人工智能是名为John Searle的学者在1980年《心、脑，以及程序(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的文章中，通过中国屋 (Chinese Room)的思考实验所提出的概念。虽然与狭义/广义的人工智能略有不同，但其概念最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兼容的。
- 5 Tay事件虽然曾在多家媒体上报道，若想查看Tay的推特反馈截图，请参考<The Verge>报道。
<https://www.theverge.com/2016/3/24/11297050/tay-microsoft-chatbot-racist>
- 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4DT3tQqgRM>
- 7 <https://www.iflscience.com/technology/this-racist-soap-dispenser-reveals-why-diversity-in-tech-is-much-needed/>
- 8 <https://www.wired.com/story/five-years-tech-diversity-reports-little-progress/>
- 9 Bhabha, Homi. "Of Mimicry and Man". *Discipleship: A Special Issue on Psychoanalysis* 28(Spring 1984): 125-133.
- 10 Mori, Masahiro. "The Uncanny Valley". *IEEE Spectrum*, trans. Karl F. MacDorman and Norri Kageki, 12 Jun. 2012. <https://spectrum.ieee.org/automaton/robotics/humanoids/the-uncanny-valley>. Accessed Jul. 1, 2020.
- 11 Freud, Sigmund. *The Uncanny*.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VII(1917-1919): An Infantile Neurosis and Other Works.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5: 217-256.



#看到

没有冷落的世界

媒体中的性少数者

Park Ji Hoon 高丽大学 传媒学部 教授





多样性是否是当今社会应该追求的重要价值？我们是否充分地认可并接受了其价值？尊重多样性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具有多强的说服力？

有两件事的出现，让我个人开始严肃地思考多样性。3年前，我曾指导过一篇有关女玩家God Gunbae对于男性厌恶的讨论的硕士学位论文。而在校内的网络社区上，有人上传了批判该论文的文章，痛斥了指导教师将男性厌恶正当化的行为，并公开了参与审核的指导教授的真实姓名，其中我的名字也在公开的名单里。

还有一件事是去年发生在学校食堂的事情。午餐时我和一名研究生谈到了学位论文中有关女性厌恶现象的主题。有位比我们早用完餐后的男同学，站在食堂前面等着我们。当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这位男同学用挑衅的语气对我和一起用餐的研究生说道：“吃饭的时候能不能不说这种话题？”我随即问道：“为什么呢？”，他便生气地瞪着我说：“这种话题让人倒胃口啊。”

通过以上两个事件，可以看出人们对多样性的不同态度。围绕多样性的政治正确的反感不仅存在于网络，还存在于所谓知识的殿堂的大学校园里。这种反感阻碍并

压抑了对于多样性的讨论，并造成多样性不能发挥生产性作用的局面。

近几年人们对于多样性的重要性的认识虽稍有改善，但对此表示抵制的认识也在同时上升。这让我甚至开始怀疑多样性是否是作为义务而存在的这一问题。有很多人公然地反对追求多样性，他们还主张对于社会少数者的厌恶也应该被视作正当的权利而得到认同。这样的情况在言论自由的民主主义国家便更是如此。然而，最近这些厌恶的情绪似乎指向了少数群体中最为脆弱的性少数者。不仅有权势的政治人物如此，就连一部分女性也毫不犹豫地表现出对性少数者的不认同和厌恶情感。我们先来看看以下几个例子。

- 2020年2月，Sookmyung女子大学曾有跨性别女性被合格录取，但是因为在校生及毕业生的强烈反对，这名跨性别女性感到了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不得不放弃入学。
- 2020年8月，地铁站里曾有过反对歧视性少数群体的横幅广告，但没过多久这幅广告就被人们撕得粉碎。
- 2021年2月，参加首尔市长补缺选举的预备候选人 Keum Taesup在一次讨论会上，向安哲秀候选人询

问过对于光化门举行的韩国酷儿文化节(Korea Queer Culture Festival,KQCF)的想法时，当时他委婉地表示不想看，并说这作为自己个人的想法，应该得到尊重。

- 2021年3月，Byun Heesoo下士在服役期间做了变性手术后被强制退役，不久后他在家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多样性的各种讨论中，对于性倾向和性本质的主题原本是最为基本的，然而在很多多样性的讨论中，这样的主题却往往被人们忽视或回避。人们可能还记得在2000年初，洪锡天与河莉秀作为性少数者出现当时在社会而引起的反响。时过二十多年，人们对于这一群体的认识有了多大的变化呢？社会是否提供给了性少数群体在社会安全生活的权利？教育局是否为性少数者提供了安全的教育环境，以保证性少数者入学时不受诋毁？当校园内挂上欢迎性少数者入学的横幅时是否会受到反对？当教授和学生书写有关保证性少数者权益的论文时是否会遭到厌恶与嘲讽？直到现在我对于以上问题仍持有怀疑态度。2007年发起的禁止歧视法的提案已经被搁置了14年之久了，这也正反映了性少数群体的社会环境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以Diane Richardson¹讨论过的“性权利”为主题，探讨性少数者的权利，并探索媒体上展现的，以及媒体上没有展现的性少数者的形象，以及这一切与我们对这一群体的认识之间的关联性。

性的权利与性的公民权

说到性少数者的权利，人们似乎只会想到《禁止歧视法》或同性婚姻，其实它的概念要更加全面一些。黛安·理查森(Diane Richardson)通过性的权利(sexual rights)和性的公民权(sexual citizenship)概念，讲述了与性相关的三个层面的权利，我们不妨把它与性少数者的权利联系起来看一看。

性权利的第一方面与性的实践(sexual practice)相关，也就是可以追求多种形态的性行为的权利。大部分社会倾向于只把特定类型的性行为规定为是正常的，其他的性行为则会被规定为是不正常的。性行为的(非)正常性由法律和制度来规定。直到60年代后期，在美国的多个州实施过禁止不同种族间婚姻和生育(anti-miscegenation laws)的法规，以此禁止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性行为。2003年，美国联邦大法院对于鸡奸法(sodomy law)做出违宪判决之

前，很多的州都实施过这个法律，以此禁止肛门性交、口交等行为，并规定这类行为为违法行为。美国的鸡奸法规定同性间的性行为是非正常的违法行为，而韩国也有类似的法律。《军刑法》第92条第6项规定，对于实施肛门性交及其他猥亵行为的人将处以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以此表明同性恋人之间的性行为不仅是不合适的，更是违法的。2019年，陆军中央调查团指令筛选出军队里的性少数者，并以军刑法对其进行刑事处罚。这一事件虽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最高法院最终还是(通过2002年、2011年、2016年3次判决)判定军刑法第92条第6项为符合宪法的法规。

2021年2月SBS播放过有关Queen组合里的主唱佛莱迪·摩克瑞(Freddie Mercury)人生的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播放时，男性之间的接吻场面被删除的情况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从另一角度上说，这侵犯了同性恋者的性实践的权利。

同性之间的性爱表现被认为是对于异性爱规范性的威胁，因此它会被定义为非正常的行为并加以控制。性权利的第二个方面与性别认同(Sexual identity)有关，是指人们可以自行规定和发展自己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权利。性少数群体的范畴不只局限于LGBT(女同性恋者、男

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它已扩展到无法规定其特性的“酷儿理论”的范畴。因此，人们应该拥有自行规定或不规定个人性别认同的权利。

在公共场合可以公开自己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权利，即不管公开自己的性别认同与否，都可以保证个人安全的权利，这一权利尤为重要。理查森指出，如果一个人的性欲只能属于私人的领域且在公共领域其性别认同得不到承认，这个人就难以获得性的公民权。所以性少数者的人权运动比起私人的领域，更加关注在公共领域的权利是如何获得的。

美国同性恋者服兵役的DADT(Don't Ask Don't Tell)制度制定于1994年，直到2011年得以废除。这个制度禁止军队内部的同性恋者谈论自己的性取向，否则则会被强制退役。DADT制度被废除后，美国陆军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公开自己同性恋者身份的人，就是美国陆军准将Tammy Smit。他在2016年就任了驻韩美军第八军副司令官。DADT制度废除后，2012年他与一位交往多年的伴侣结婚后，定居于韩国。象征着性少数者人权的同性恋伴侣竟会来到同性恋恐惧症极其严重的韩国生活，这岂不非常具有讽刺之意？

那么韩国的大学又是如何？几年前我经历过这样的一



▲ Lacey Heppner(左)和他的妻子Tammy Smith准将(右)

来源: <http://www.todayus.com/?p=52940>

件事。在课堂上有过一次发表会，是四个人一小组。我当时知道其中一个小组中有3个成员是非异性恋者，而这些成员在互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准备了有关同性婚姻的发表。后来，我想到如果它们提前互相公开了自己的取向，是否会更加自由而丰富地谈论对主题的想法与经验呢？不过，这些同学也只是对我公开了他的性倾向，这必然是因为这些同学认为教室本身对于自己不是一个安全的场所。

制定《禁止歧视法》对于保护性少数者的权利尤其重要，因为当一个人公开自己的非规范性取向或性别认

同的时候，这一法案可以保证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安全的。2021年2月，变性人人权活动家兼济州酷儿文化庆典共同组织委员长Kim Kihong被发现其自行了断于家中，接着3月份被强行退役的变性人Byun Heesoo下士也被发现死于家中。Kim Kihong给人们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于我的人生，以及他人对我的厌恶，我已深感疲惫。”所以《禁止歧视法》的制定是为了建立一个制度上的安全网，以使性少数者远离偏见与厌恶。

性权利的最后一方面是关于性关系(sexual relationship)的内容，是指多种关系可以被正式承认的权利。国家正式认可的性关系的类型因国家而异。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婚姻与生育都被视为犯罪，这在现今已不存在。同样，在2015年之前，同性之间的婚姻只有在美国的一部分州中得到允许。2015年6月，联邦高级法院判定同性间婚姻为宪法保障的权利，且后此权利在所有的州都得到了合法承认。此外，2001年在荷兰开始的同性间婚姻的合法化热潮，迅速开展至比利时(2003年)、加拿大(2005年)、南非共和国(2006年)、挪威(2009年)、瑞典(2009年)等国家。然而在韩国，我们对于同性婚姻合法与否的问题从不曾有过正式地探讨。2013年，电影制片人兼导演Kim Jokwangsoo

和同伴Kim Seunghwan发现韩国宪法和民法中并没有禁止同性婚姻的条款，即向西大门区厅申请了婚姻登记，然后得到了被西大门区厅的拒绝。此后，他们虽对西大门区厅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结果却还是被驳回。

谈论性少数者的权利时，经常提及同性婚姻的原因是因为同性婚姻对于非规范的性权利的认可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性婚姻不仅仅是对于同性之间性关系的社会上的认可，还关系到配偶邀请移民、退休金、赠与、监护人权利、税款优惠等问题，所以它非常重要。同性婚姻如果得到承认，同性伴侣可以以共同名义登记财产，也可以以此名义赠与财产。当被派到海外工作时还可以邀请配偶，也可以在配偶的手术同意书上以保护人的名义签名，当配偶在重症病房住院时也可以探视。然而以上情况在目前还都是只遥不可及的梦想。

在韩国社会，对于性少数者的认识的普及，至今已有20多年。而社会的变化又是如何呢？教室、社团、公司甚至是家庭，是否可以接受性少数者安全地公开自己的身份？是否可以让性少数者不会因为自己的取向而受到冷漠和歧视，是否可以让他们在社会上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充分发自己的力量，最终实现自我？

性少数者的过少出现

让我们再来看看媒体中是如何描述性少数者的吧。媒体通过形象构造，以“再现(representation)”的形式为大众展现世界，从而对人们的认识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正确理解媒体表现性少数者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先了解一下电视作为最重要的媒体之一，是如何表现性少数者的形象的。

人们在电视上几乎看不到性少数者。无论是实际存在的人，还是性少数者角色，即使我们24小时观看电视，查询200多个频道，可能也看不到几个性少数者。正确地说，我们应该只会看到洪锡天一个人。由此可见，性少数者在电视媒体上的出现频率是相当低的，我们也只是偶尔会在教育节目看到有关性少数者的特定的事件。性少数者中的女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就更是少见了。在媒体上公开自己是性少数者的知名人士少之甚少，可见性少数者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环境有多恶劣。

在媒体上未曾出现的少数群体具有象征性消灭(symbolic annihilation)的特点，即在社会上被剥夺了重要性和存在感的特性。² 性少数者在媒体过少出现(underrepresentation)，在我们的生活中，性少数者也被当作

不存在的群体。性少数者作为社会的一员却被社会否定了其存在的意义。人们回避有关性少数者的话题，由此，与性少数者的自由和人权相关的讨论就更加难以形成。

相比性少数者的过少出现，名为“Gay Code”的类似同性恋类的电视剧曾经风靡一时。《咖啡王子一号店》(MBC, 2007年)、《成均馆绯闻》(KBS, 2010年)、《个人取向》(MBC, 2010年)、《云画的月光》(KBS, 2016年)是这类电视剧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电视剧都是以男主角误会对方的性别或性倾向而展开的剧情。虽讲述的是同性之间的爱，却没有引起争议。因为观众知道这并非是真的同性之间的爱。比如像在《咖啡王子1号店》讲述的是男性咖啡店社长与男性职员之间的爱情，但是因为观众知道这个男性职员并非男性所饰演的，所以会把内容解释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爱情。《云画的月光》中也有王子向宦官表白的一幕，然而观众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宦官是女性饰演的，所以会把这段爱情接受成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爱情。因此，像这样的类似同性恋类的电视剧从来没有在社会上引起过争议。

而相比类似同性恋类的电视剧，如实地体现性少数者之间爱情的电视剧往往被社会抵制及封杀。2010年SBS播出的《人生是美丽的》是无线电台史上首次上映的有关男

的电视剧《仙岩女高侦探团》中，有一段两名女高中生接吻的场面，也因助长同性恋的理由而受到观众们的强烈谴责与诋毁。不仅如此，还被广播审议委员会警告后扣除2分，这是制裁力度中最严重的处罚。2021年2月春节期间SBS播放的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删除了男性之间接吻的剧情这一事件，也在当时引起过很大的争议。这一消息传至海外，Queen的客座主唱亚当·兰伯特(Adam Lambert)在她的社交媒体中对此表达了遗憾。

观众对于媒体中性少数者的不宽容，以及广播通讯委员会对于表现同性之爱的严重处罚，都是对性少数者的欲望以及非规范性意识的错误规定。其问题更在于对性少数者的漠视，也同时侵犯了性少数者在公共领域公开自己性取向的权利，即作为一个人的权利。

对于性少数者形象的扭曲

媒体中的性少数者的形象通常以固定模式的形象，即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形式体现。媒体通过刻板印象的表现来边缘化性少数者，并强化其非正常性，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异性之间的规范主义的爱情。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同

性恋者都与艾滋病联系在一起，性少数者的性生活混乱已成为人们的固有观念。

刻板印象(stereotype)往往只针对于少数群体。刻板印象 并不完全是虚伪的，它也有真实的一小部分(kernel of truth)，那么为何就成了问题？刻板印象(stereotype)具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少数群体因为刻板印象而受到社会歧视的可能性很高。例如，黑人会因为人们对黑人就是犯罪者的刻板印象而遭受更多的怀疑，甚至人们会把警察对于黑人的非法拷问视为正当行为。第二，属于少数群体的个人力量很容易被限定在定型的刻板印象中。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负责照顾人的这一类劳动被作为的社会的期待而强加在了女性身上，从而使女性力量受限。作为一个男同性恋者，不管他的性生活混乱与否，在社会受到歧视的可能性会非常高。即使他是一个能力出众的企业家、设计师、公司职员、医生或教师，在人们眼中也不过就只是一个性生活秽乱的人。

2020年5月，发生过梨泰院同志夜店及俗称为“蒸房”的黑色睡眠房的病毒感染事件。这一报道让人们不得把到男同性恋者的性生活秽乱和道德败坏与艾滋病联系到一起。报道中细致地刻画了男同性恋者们非正常的性欲缓解方式。这一报道加强了对这一群体的刻

板印象，也再一次给男同性恋者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有一位自称是现任记者的人在青瓦台国民请愿留言板上以这样的标题发表了文章。“请同志夜店共开它是同志夜店的事实！否则这将可能引发更严重的感染事件！”以下是对于部分内容的摘录。

如果不能理解男同性恋者的特殊文化并让他们做相应的身体检查，现在的事态可能会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同性恋者经常去的娱乐场所主要集中在钟路和梨泰院。据说梨泰院的同志夜店会在特定时间开展表演，而很多男同性恋者在钟路喝完酒，就会去那里看表演。还有，像龙仁66号确诊患者这样的人，不会只去一个地方，他们可能会去很多不同的夜店。因为当他们去一个地方时找不到满意的对象，就会去其他地方寻找，这都是同性恋者典型的文化。

在我们批判男同性恋者在蒸房以匿名方式发生性关系，指责他们流荡于多个俱乐部寻找恋爱对象的现象之前，何不先从社会的角度上思考一下他们只能选择或者说不得不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理由所在？如果同性恋者也像一般的恋人一样可以大大方方地公开自己的取向，

如果社会中具备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的环境，如果他们拥有不必隐藏的的安全的环境，那么他们又何必在封闭的场所寻找朋友或情人？在批评男同性恋者性生活秽乱之前，是否应该先批判在韩国随处可见的为男异性恋者而建立的性交易产业呢？

各种性少数者的展现条件

发掘更多且更多样化的性少数者的形象的条件是什么？改变性少数者形象的条件大致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首先要改变对性少数者的认识和态度。据盖洛普2019年发表的对于同性婚姻、同性恋、首尔酷儿文化庆典的部分调查内容显示，³ 53%的回答者把同性恋视为爱的一种形态，而37%的回答者表示并非如此。对于同性恋者的演艺活动，有26%的回答者表示有问题，67%的回答者表示没有问题。对于同性婚姻法制化的问题，有35%的回答者表示赞成，而56%的回答者表示反对，但19-29岁的回答者中有62%的回答者表示赞成。韩国社会对于同性恋者大多持有否定的态度，然而年轻人对于性的多样性似乎比较包容，对此我们可以小

心地预测社会对于同性恋者的承认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如果以后对于性少数者的认识与态度得以改善，那么会有更多的性少数者不再被局限于刻板印象之中，他们的形象将可以被多样地展示在媒体中。

第二，经济条件也很重要。在美国，性少数者的市场、消费者、观众已发展迅速，电视台、企业、广告商也针对性少数者积极地制造多种主题和产品。像百威、AVIS等大企业赞助商参与美国的酷儿文化庆典和LGBT电影节的情况也是大有所在。组织性少数者的艺术、媒体、娱乐等相关活动的OUTFEST组织中，不仅有HBO、AT&T，还有韩国的现代汽车作为赞助商参与其中。而相反在韩国的酷儿文化庆典作为赞助商参与的企业除了Google和Lush，几乎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韩国的性少数者作为消费者和消费市场的价值还未能得到评估。只有韩国性少数者的市场和消费能力发展到无法低估的水平的时候，性少数者才会以积极的形象展现在媒体中。

第三，观众们有必要积极要求性少数者以积极的形象展现在媒体中。当然这可能会像前面所说的一样，在播放有关真实的性少数者的节目时会遭到部分观众的诋毁。但是，这不能被看作是大多数观众拒绝性少数者

的节目的依据。因为从盖洛普的调查数据中已显示，有67%的回答者认为同性恋者的节目活动没有问题。既然一部分反对性少数者的群体会向电视台或媒体恶意投诉，那么一般的观众也可以去要求媒体积极地展现性少数者。如果一般的观众能够因媒体歪曲性少数者形象而对此进行投诉的话，媒体展现性少数者的方式也就会得到积极的改善。

另外，有必要在各报社的读者权益委员会和媒体公司的观众委员会中委任性少数者专家。因为媒体产业比起学术界的批评来说，对这些委员会的反应才要更为敏感。KBS观众委员会由代表青年、环境、残疾人、女性、人权等多个领域的委员组成，但是这里几乎没有能够代表性少数者的委员。还有，如果将属于性少数者人权团体的专家委任为观众委员会和读者权益委员会委员，那么这些委员们就可以代表性少数者社区的意见，要求更正对于扭曲性少数者形象的内容与刻板印象，从而给媒体中有关性少数者的主题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最后，对于性少数者比较关心并具有影响力的创作者可以积极地制作相关内容。《人生是美丽的》之所以能够不顾观众的反对而将男同性恋者作为内容主题的一部分，是因为金秀贤作家对此具有坚定的意志。电影《小

姐》之所以能够将女性之间的爱情设定为主题，是因为朴赞郁导演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近几年，电视台曾播放过针对性少数者权利的时事教养节目。据了解，这些节目的制片人对于性少数者的权利都比较关注。我的学生中也有人说在大学毕业后会就职于媒体公司，制作有关他们的电视剧和纪录片，或就职于报社，写有关他们的报道，而后来确实这些学生中确实有人实现了自己的意愿。关注性少数者并具有影响力的创作者越多，我们就越能期待多样的性少数者形象的出现。

注

- 1 HRichardson, D.. "Constructing sexual citizenship: Theorizing sexual rights". *Critical Social Policy*, 62, 102-135. 2000.
- 2 Gerbner, G. & Gross, L.. "Living with television: The violence profil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6, 172~199. 1976.
- 3 《对同性结婚、同性恋、首尔酷儿文化庆典的认识》，韩国 Gallup daily opinion 第 356号，2019年5月30日。

影片中的不同视角

Lee Dae-hyun 新闻工作者，电影评论家





电影就是故事。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类通过故事了解世界上的一切。”换句话说，电影就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窗口。电影通过自由地编辑故事来展现过去，理解现在，并想象未来。人类的历史、生活及梦想是这样，对于讲述它们故事的电影也可谓是多种多样。它们以不同的面容和色彩，与人类和世界一同感受时空，相互交谈，伸出它们的双手。

电影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在时代中被创造的。然而，影片的多样性仅仅局限在生活的变化与冲突以及混乱之中。所以，影片的多样性是以“谁做了什么”为开始的。对于制作的影片是什么时间，在哪里，如何流通与消费的，也存在多样性的变数。也就是说，像其它文化艺术一样，电影也可以根据观众的视角、价值观和情感而有所不同。影片的多样性就是以这一切的变数而编成的故事。

电影，是什么

电影是 ○○

有关“电影是什么”的问题，按不同的电影和不同的社会文化观点，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 电影是虚构的。电影最初起源于活动照片，而后逐渐发展成虚构与想象的世界。虽然它有一部分体现了现实，也有关于事实的记录，但它们仍以叙述的方式，通过选择(编辑)、夸张(特殊效果)以及制作(演出)的过程与虚幻构成一体。电影延伸为虚构与想象的世界的最重要原因是为了满足大众的娱乐性。它可以通过影像语言的幻想，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可实现的欲望得到替代性满足以致净化思想。电影最大的魅力就是可以让人们感受到未知的世界，体验海市蜃楼般的空幻。
- 电影既是现实又是未来。电影的想象与虚构总是来源于现实，也回归于现实。对于鬼神世界和未来世界的想象亦来源于人类世界的意识与价值。这就是为什么电影即是现实的窗口。像在《阿凡达(Avatar)》

和《盗梦空间(Inception)》看到的一样，想象总有一天会成为现实。

- 电影是乐趣。乐趣就是生命力。这种乐趣不仅仅是单纯的刺激或快乐的感受。如果电影一味地固执于此并不断重复这样的方式，那么电影绝不可能发展成为产业与艺术。然而，电影并没有拘泥于此，它追求让人动容的喜怒哀乐、发现的乐趣、感悟、对于普遍价值的确认、替代性体验、往事的当前化、想象的形象化等等。电影以此满足人们的多种娱乐需求，并发展出多种类型。
- 电影是交流(对话)。电影的大众性，其含义不仅来源于把过去只作为少数者特权的文化艺术统一为一个模式，并使其扩展至大众化这一点。它通过最具普遍性的价值的传达与剧场，通过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的同时性与反复性，以多种表现要素为技巧，使“沟通”发散至最大程度。所以剧场的含义不仅仅局限于观看影片的物理空间，它还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广场”。电影通过剧情、画面、摄像角度及明星(演员)来吸引观众，以提高内容的说服力和共鸣程度。也有人把电影放映之前短暂的黑暗当作一

种“仪式”。在同一场所观看同样的电影，可以让你与电影进行无休止的对话的同时，产生一种无声的交流和分享感。电影通过这样的沟通，成为了一种现实中看不到的权力。

- 所以电影即是政治。它与政治相似并内含政治属性。电影作为更广泛的文化展示体系中的一部分，与人们的心理倾向或社会制度相维系。它还可以使社会现实倾向于一种特定的方向，塑造一种常识性的灵感，以让人思考世界是什么样的或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¹ 这时展现不仅仅是对于现实的再现，它还会按电影的意图重新被塑造。在这种意义上来说，电影就可以说就是政治。² 如黑帮电影和黑社会相关电影所展现的一样，剧情中的矛盾正代表着权力斗争与政治意图。

如此一来，电影可以把真实制作成虚构，把虚构制作得有如现实，并通过人类的意识与行动展现特定的内容或政治形象。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象征“星条旗”和“自由”的美国好莱坞电影，韩国的政治电影都是如此。电影可以通过其形象而成为政治合理化和正当化的工具。

韩国电影的政治性³



▲ <辩护人>(左), <国际市场>(右)

虽说电影不过于想象与虚构，但作为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电影必然具有“政治性”。电影通过其政治性的艺术表现，让观众认识到现实中的问题，并憧憬更美好的未来。但最近韩国电影界为了满足艺术的高度与真实性，更倾向于制作一些与其说是“政治性”的电影，不如说是具有“政治意图”的电影。很多作品是为了扩大电影本身的文化权力，为商业目的而利用社会的阵营理论和理念对立的问题，以迎合时代的氛围和权力的交替。代表保守政权的电影有以李舜臣和麦克阿瑟为中心的《鸣梁》和《仁川登陆作战》，文在寅上任时期也有描述前任总统卢武铉人生的影片《我是卢武铉》。2012年至今，引发过政治解释和争议的作品有《军舰岛》、《仁川登陆作战》、《鸣梁》、《辩护人》、《内部人士》、《暗杀》、《群盗:民乱的时代》、《国际市场》、《出租车司机》、《延坪海战》、《1987》、《以儿子的名义》等。这些电影从重新认识并评价历史事实和人物的层面来讲，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此具有政治色彩和内容的电影，是想要通过迎合时代的氛围和观众的心理情绪，得到商业性的成就，也扩大其政治文化的影响力。像这样政治色彩浓厚的电影具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让观众通过电影享受娱乐和文化，从而引发感动或共鸣，而使观众感到电影本身也只不过是达到了政治目的的手段，是政治的代言人而已。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电影生产者(企划人、制片人、导演)为了政治权利而做的竞争。他们不仅通过电影表现其政治倾向，也想把它作为谋取商业利益的手段。其次，另一方面的责任还要归于与他们一起企图把电影作为政治宣传和扩大政治势力手段的权力集团。

电影是“显而易见”的？

世界上没有突如其来的故事。换句话说就是不管何时何地，生活总归是一样的。或者可以理解为不论在什么时代，在什么地点，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终归是一样的。所以电影即使是作为娱乐、趣味和想象的产物，也只能让人在脱离世俗的梦幻中游荡后最终再回到现实。电影是对这种内容与形式的沿袭，所以需要想象力与洞察力，以发挥其作为影视语言艺术的优势。

其实所有的电影都是显而易见的。只是这个“显而易见”解释为“老套”的时候含有贬义，而解释为“原型”的时候则具有积极的意义。“老套”是指故事不仅狭小，还只局限于特殊的文化经验，并把陈腐和缺少个

性的特性包装为一般性。当然，其内容和形式是极其贫乏的。二流作品和模仿作品都属于这类。相反“原型”是指从现实的具体性挖掘出普遍的人类经验，并赋予其个性和独特的文化特性。这可以激发人们的人文学知识和感性，由此也可以发掘出人类的本性。

《光海，成为王的男人》这部影片让人们联想到马克·吐温的《王子与乞丐(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和日本电影《影子武士(Shadow Warrior)》的人物和叙事结构。那么这部电影为何可以吸引1,200多万名的观众，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该片以光海君在历史上消失的15天的行踪，充分地展开想象，并以独特的技术和对现实的具体化，描绘了一位善于与百姓沟通的理想中的领导者形象。像这样描绘人们向往的领导者形象的影片虽然之前也有过，但这次却是以鲜活的色彩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崭新的感觉。

电影的多样性

电影为何需要具备多样性？

电影是表达的文化艺术。表达的生命是自由和个性，而艺术可以通过自由和个性的表达，来实现其多样性。

电影作为一种产业，虽然可以通过流通和消费具有多样性，但因其不是单纯的工业品，所以就更具有复杂性。

电影可以通过提供人们多样的价值和现实的认识，以及想象力，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和愉快。电影的多样性即是生活的多样性，也是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不以“好”、“坏”、“高”、“低”来区分，区别它的指标是“不熟悉”与“不同”。文化不仅可以巩固这个界限，更可以打破这个界限。电影本身具有多样性，而社会上也应该具有多样的消费者和对于电影的多样的接受方式。

通过可以享受文化能力的文化取向的提高，人们可以扩大知识和提高素养，并扩展和深化自身的思维及价值观。它也可以让人们以更锐利的视角深入地探究人类与世界。只喜欢一种类型电影的人不可能享受到另一种类型的电影所具有的魅力与快乐。只有在打破自己喜好的壁垒后，才能真正享受到不同类型的电影的乐趣，从而与电影融为一体。过于陷入政治派别而以政治角度去解释和判断一个电影，就会阻碍电影取向的扩展。只有在打破偏见与倾向，敞开胸怀，睁开双眼，才能享受到更为多样性的电影。

电影的多样性，是钱还是技术？

电影是一种高成本的艺术。如果没有费用带来的收益，它就不能具有长期的连续性。即使作家主义型导演坚持表现自己的艺术世界而不顾票房，若想要重复并扩大自己的艺术领域，就需要尽可能确保更多的观众。

电影的多样性的另一个条件在于多种资本。过分追求票房的资本会让人忌讳冒险。幸亏电影资本如今越来越不局限在大企业上，它也会分散到多种投资基金上去。这种变化是由于电影投资者和制片人的意识发生了变化，他们经历了类似事情的重复导致利润多元化的减少。不仅如此，这也是因为消费者(观众)对于制作环境与技术革新、流通革新、多样性的广泛容纳，才导致了这些因素复合作用，从而产生了这样的结果。

电影是演出艺术和高成本的产业，这决定了其多样性的局限性。在电影制作中，过于注重收益而偏重于商业电影会加深文化偏食现象。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公共资本有时也会被投入其中。政府或地方自治团体对于独立电影、低预算电影、艺术电影等提供的制作及流通支援也有助于电影的多样性。

但是，这依然是有局限性的。给电影制作带来巨大变化并产生多样性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数字技术革命。电影

作为科技的产物，它不断与新技术相结合，才使过去不可能实现的素材和故事得以实现。以数码放映机替代昂贵的胶卷，也降低了制作费用。而现在，智能手机都足以取代放映机了。虽然大片依旧比较依赖于特定的电影公司，但有很多的制片公司也在制作票房负担较小的低预算艺术电影。过去，电影资本的主要来源是电影产业，而现在随着很多企业考虑到企业的多元化，把资本渐渐投入到电影产业的热潮，这扩大了电影的制作，也促进了电影的多样化。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全球化与差别化。好莱坞电影由美国的投资公司和电影公司制作，韩国电影由韩国的投资公司和制作公司制作并发行和上映于特定地区的常识被已打破。同时，所有电影需要在所有地区和国家消费的观念也已经被打破了。数字革命带来的电影制作的多样化与流通(发行和上映)的多样化相吻合。制作改变了流通，流通也改变了制作，并且重新制作了电影形式从而打破了“电影就需要在电影院看”的想法。电影平台OTT(Over-the-top media service)在线视频服务的出现，将电影消费从集体转向个人，由单方面转向选择性，将小电影的单发性转变为超越时空的重复性。尤其像现在新冠病毒的蔓延的形势下，人们不得不互相保持距离，而这种

平台就成为了人们可以安全地消费电影的窗口。

以前也不是没有过针对电影多样性的尝试。在20世纪90年代，为满足观众的需求，韩国也有过小剧场上映过描述艺术影片和第三世界电影的欧洲影片。但是因为市场营销和供应等方面没有区别于既有的商业电影，又没有确保更多的观众，所以这一尝试未能维持下去。

紧随其后的就是从1996年以釜山为开端，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国际电影节。虽然在国内举行的很多电影节都受到了批判。都被指责成是为了地方自治团体的炫耀及宣传的手段的过度的消费性庆典，但它们至少对电影的多样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⁴即使如此，世界各国制作的数百部电影在电影节上同时上映时，依然引来了数十万影迷，⁵而电影节是否对电影的多样性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这一点仍然是个疑问。因为大部分作品都只在电影节期间上映一次，因为大部分观众不会再去观看这些电影，所以电影节之后只有比较受欢迎的影片才会在电影院上映。

OTT的力量

急速成长的OTT正在超越一切，它开启了电影流通和上映的新时代。它以经济性、便利性、反复性、个别

性、脱离地区性，创造着任何人都可以廉价欣赏任何电影的环境。观众已经不需要为了看首映电影而去电影院，也不需要以文件形式收藏作品，制作公司也不需要再看发行公司和剧场的眼色制作电影了。过去奉俊昊导演的《玉子》在网飞(Netflix)上映后，剧场相关人士对此表达过强烈的反对。他们还对于在戛纳电影节中OTT制作和上映的电影表示了强烈的拒绝。然而，这些都已成为过去。

《国际市场》的导演尹济均表示：“OTT正在多方面产生影响。无论是因为自然趋势还是不得已的选择，OTT的流通方式已经超越了市场和消费的变化。它在制作、体裁、形式上也带来了变化。它不仅可以收入剧场两个小时的电影，也可以收入短片电影，像上映20部30分钟的短片电影，上映10部一小时的电影，这些都是有可能的。”⁶

不仅如此，奉俊昊导演的《寄生虫》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其作品的完成度以及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差距是可以适用于全球化的主题，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这里有OTT的作用。随着网飞的加入和平台的多样化，韩国电影也更容易走向全球市场，语言的壁垒也得以降低，世界对韩国演员的关心和评价也发

生了变化。尹汝贞凭借《水芹》，成为了首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的韩国演员，这一成就也与这种变化有关。

新冠病毒的持续蔓延，扩大了网上电影的上映和观看范围，也增加了对于剧场的定位及电影资本的多样性萎缩的忧虑。在《太极旗飘扬》时隔17年再度上映于剧场时，姜帝圭导演坚决表示了反对。他表示，虽然电影的流通很重要，但比起流通更重要的是内容，所以在新冠病毒情况好转后，剧场一定会再次活跃起来。奉俊昊导演表示，在《阿凡达》上映时曾预测过以后所有的电影都将走向3D，然而并非如此，所以目前的情况也不会导致电影将走向OTT。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剧场与OTT的结合将会呈现正面效果，而不是负面效果。尹济均导演表示，不管新冠病毒的形势如何，OTT作为观看电影的平台，它可以使人们充分利用私人空间，也可以促进电影的消费和多样性。实际上OTT确实带来了电影的消费模式分化异常和市场的扩大。全世界所有的小型电影都在进入OTT。

只能在电影院和VOD中观赏电影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人们已经不需要在这样那样的网站费力地搜索特定的题材、素材、国家的电影。平台的算法可以把我们的喜

欢的、经常看的种类、主题、素材、国家、导演、演员的电影一一列出来，让我们随意挑选。

所有电影也没有理由为了宣传和知名度，先在电影院上映几天，然后再进入网络。因为已经有数亿名观众在虚拟剧场OTT等待着观看。目前网飞用户已达2亿4000万名，而迪士尼+的流媒体视频用户仅在开放一年零四个月后的2021年3月就达到了1亿多名，这还仅是因其限定于在59个国家提供服务的结果。

现在只剩人们的选择了。是选择只看自己喜欢的电影，还是不依赖平台而选择观看各种各样的电影？想要“如何”看电影？想要在电影中遇到“什么”呢？

如何看电影

如所有的文化艺术创作作品一样，根据电影的消费者的不同，电影的意义和价值也各不相同。在相同的电影中可能会有不同的感悟，或者在不同的电影中也能得到相同的感受。对于“有意思”和“没意思”的判断也是如此。电影是以各自的视角去观看的，也会以此将其视为“只属于我的东西”。当然，电影都会以形式上的惯例按导演的意图而制作。电影的惯例包括情节的结果，

形象的连续性，无意识的摄像机，剧情人物的固定特性，中心画面的设定，框架的均衡。然而，这些惯例实在没有必要按部就班地进行。

作家们经常在小说读后感中引用这样的话。“现在这部作品是属于各位读者的。”电影导演也经常说这句话。奉俊昊导演说过“观看者可以随意解释电影的内容”，而李·以萨克·郑导演也曾说：“我的电影就是给观众摆放的‘餐桌’，希望所有人都能随时吃到这一美食。”也就是说，电影本身就是按自己所看、所想、所感而成为的好的电影、有趣的电影、有意义的电影，或者是崭新的电影的。也就是说，当观众不按电影制作的意图、价值、形象和想象力，而是按自己的经验和视角寻找电影中的各种元素时，同样的电影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和不同的色彩。

三个视线

电影存在三个眼睛。一个是摄像机，一个是演员，还有一个就是观众自己。电影似乎提供了与世界相似的视觉体验。但正如我们的视角一样，电影的视角也总是有意图的。在电影的选择和决定电影的意义层面上也是这样的。观众会把电影的视角当作自己的视角，信赖电影

的形象，并理所当然地接受它们。

相机作为电影的视角，是导演的眼睛。导演会把镜头紧紧对在自己想要展示的内容上，之后做各种工作(长镜头、手持镜头、跳跃镜头等)，并赋予对象形象与情绪。导演以此来强调特定的立场或时间，并隐藏电影的人为性的符号，以此试图将观众锁定在与导演同样的空间。

让我们先来看看战争影片。在大部分战争影片中，摄像机作为导演的一只眼睛，会成为他们武器的眼睛，凝视对方并进行攻击。紧随摄像机的视线，会发现电影中的敌人即是自己的敌人，并不知不觉地与导演融为一体。而摄像机忽视的镜头也会一起随之被忽视。《敦尔克(Dunkirk)》影片中，武器即成为摄像机的眼睛，可以飞天攻击敌人。但如果这样一味地追随摄像机的眼睛，可能会错过电影的各种符号和要素所具有的意义和感动。因为人们往往把电影的视角当成是透明的，只想通过它来观看电影。

那么演员的视线又是如何？它绝对不会面向观众，也不会与摄像机(导演)相遇。当面向正在观看摄像机或屏幕的观众时，他们很快会从下一个镜头中意识到当前只是剧情的一个空间或演员的角色而已。当演员把视线投向与摄像机同步的观众时，会让观众立刻意识到自己的位

对于他，我就是敌人

<父辈的旗帜> vs <硫磺岛的来信>



▲ <父辈的旗帜>(左)，<硫磺岛的来信>(右)

这是2007年演员出身的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同一场所以正相反的摄像角度拍摄的两部战争电影。这个电影描述了在1945年2月，日军和美军在我们比较熟知的硫磺岛这一南太平洋小岛上展开的初战。在持续35天的战斗中，7万美军中有6800多人阵亡，2万多人受伤，而日军在所有2万2000人中仅生存1000多人，其他全部阵亡。

在《父辈的旗帜(Flags Of Our Fathers)》中，相机固执地成为美军阵地中的眼睛，而在《硫磺岛的来信(Letters From Iwo Jima)》相机中却在日军阵地中成为日军的眼睛。这样转换视线，就颠倒了战场上的敌与我、善与恶。导演通过不同的角度，刻画了不论敌军还是我军，他们作为同样的一个人，对于生与死、亲人的爱、恐惧与悲剧都是一样的，以此强调战争是不分敌我的事实。

置并打破自己脑海中虚构的情景。演员的这种视线是为了维护电影的幻影主义。幻影主义引导观众不去关注于电影的事件和人物及观看方式与现实不同的事实，而是瞄准人们渴望眼前所发生的就是事实的心理，创造出具有号召力的条件(虚像)，使观众忘却自己，投入到剧情之中，以产生知觉上的快感。⁷

最后就是电影中存在“我”的视线。通常情况下“我”的视线会跟随与他人(导演)的视角相结合的机器(摄像机)的视线。这种被动性的跟随，使我可以更加投入到电影中去，并让我感到舒适和快乐。然而，这不会让电影本身成为我自己的，而只会让电影成为导演的作品而已。

以“我”的视线观看电影

要想把电影变成自己的电影，就需要其具有自己的视线。如果我只执着于爱好，想用情绪模式(Schema)只接受熟悉的东西，那么我的视线就会变得越来越狭窄和单调。如果想拥有多样的视线，就要先敞开“心灵的窗口”。当我们以细腻的情感和锐利的眼睛，从未知与不熟悉的内容中发现普遍性和同质性时，电影就会呈现另一种色彩。某些人的宣泄，对我反而可能会成为一种领悟。

2010年，国内首部以纯越南的技术、导演和演员身份制作的商业电影《穿白丝绸的女人(The white silk dress)》在历经波折后终于得以上映。但人们却以完成度和技术水平低为由，拒绝观看这部越南电影。而在越南，当时观看这部电影并流泪的观众多达50多万人。这部电影还被邀请参加釜山国际电影节，并荣获了观众奖。但是它却在电影院上映不到一周就消失了，观众也不过6000多人而已。

该片生动地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烽火漫天的时期一个家庭具有的悲剧与希望，以及母亲对子女的无私奉献。这部影片使我们看到自己的历史和生活，也使我们在其中发现了同质性。这部影片展示的不是“技术”，而是“世界”。因为多种文化和文化多样性是指“接受、理解和享受多种文化，寻找与我们文化的共同点，并让他们发挥与我们不同的情绪和精神上的优点”。⁸

如果打破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概念，如果可以具备多样的视线，世界上就不会有不好的电影。即使是老套的电影，其中也会有美丽、善良、新颖或温暖的风景。如果可以发现它并扩展到我的知识和情感上，那么它对我来说就是一部好的电影。若以敌人的眼睛看待世界，或许也能稍微理解《角斗士(Gladiator)》中想要杀死战争英雄马克西穆斯的康

茂德。通过这种思维和探索。影片也就不会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复仇剧，而是会成为一个历史剧。

如果说“一部电影只有一个故事，应该沿着电影提示的道路到达影片的重点”的话，那么一部电影对于每个人来说就都会是一样的电影。但是即使电影的目的地相同，选择的道路却完全可以不同。电影的多样性就在于我们自己选择的道路。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早些时候曾通过电影《风会带着我们走(Bad ma ra khahad bord)》的主角，即电视台PD和乡村少年的对话表达过这一点。

“学校往哪里走？”

“走这边或走那边。”

“学校有两所吗？”

“不是，是有两条路可以去学校。”

去往某一处的道路不会只有一条。有两条路也并不意味着目的地有两处。所有的事情不会只有一个答案，人生如此，电影亦是如此。所以不论是人生或电影，还是观众的心灵也都同样具有多样性。所以走自己想走的路，看自己想看的人和事吧。即使这里充满坎坷或他人异样的目光，坚持自己的路，就总会有属于自己的天空。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所有的电影，都要坚持使用自己的视角来观看。因为这又是另一种“整齐划一”和“强迫”。越是爆款电影越是如此。观众不是傻子。1000多万人观看一部电影并产生一种共鸣，就肯定是有理由的。也许这也可能只是为了单纯的娱乐，但其中会必定隐藏着一种社会和心理因素。当我们可以把它与现实联系在一起，电影才会走向世界，与我们交流。

电影可以以犀利而明晰的目光来讽刺和批判存在的不人性和矛盾(《局内人》、《断箭》)，可以在历史上探寻现时代人们所向往的领导人形象(《光海：成为王的男人》、《鸣梁》)，甚至可以改变世界(《瓦嘉达(Wadjda)》、《推上断头台(Deux hommes dans la ville)》)。

电影中隐藏的社会视线有时也会反映一个人的的人生。它可以让女性先思考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价值，而不是只作为某个人的妻子或仅作为一名女性而生活的价值(《The Wife》，《82年生的金智英》)，它又让人们可以关注被社会所忽视的老人们忧郁的生活(《父亲(The Father)》，《我爱你》)，并且通过一个人临死前的选择，让人们再次思考生命的价值(《遗愿清单(The Bucket List)》，《Wonderful Life》)。

但电影并不只以现实的观点看待世界。它通过另一个“我”的存在，让我们思考本我的意义(《阿凡达(Avatar)》，

《逃出克隆岛(The Island)》), 通过与非人类之间的矛盾, 让我们重新展望作为人类的条件(《机器管家(Bicentennial Man)》, 《猩球崛起(Planet of the apes)》), 并且将人类最原始的欲望以幻想展现在眼前(《少林足球》, 《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电影以不同的视角让人们想象世界, 而我们以不同的视线和心灵去感受电影。从中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民族与历史、生命与社会、文化与精神、信任与善意之间存在的相同与不同之处。这些感觉自然地将“我”和“你”, 以及“我们”的生活联系在了一起。

无数电影、无数多样的素材与故事, 都以各自的特性最终走向一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憧憬着更美好的人类世界。电影为了这一使命, 会坚决与“人类的普遍价值与经验”共进。用善、爱、友情、家庭、共同体、分享、死亡、灵魂、梦想, 来讲述人们的生活和故事, 并穿越时间与空间, 走向文化、历史与宗教。它也会超越自我的价值以及他人与人类的价值, 更会期望共享动物与自然以及未知生命体的思想与灵魂。

如此看来, 我们可以通过电影看到的世界有如电影一样数不胜数。我们在影片中可以选择的道路也是多到难以抉择。这样的多样性正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与人类的多样性。

注

- 1 Michael Ryan、Douglas Kellner, Baek Moonim·Cho Manyong翻译,《相机政治学: 现代好莱坞电影的政治学与意识形态(Camera Politica: The Politics and Ideology of Contemporary Hollywood Film)》,视觉和语言,1996。
- 2 Park Jongsung,《政治与电影》,人间爱情,1999。
- 3 Lee Daehyun,《韩国新闻电影报道谈论正派性的相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国民大学,2019。
- 4 Lee Daehyun,《十七岁,电影中的世界》,DAHALL传媒,2010。
- 5 据釜山国际电影节统计,从第一届(1996年)到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前的第24届(2020年),电影节中,每年有16万5000多名到22万7000多名观众观看了电影。
- 6 《大山招待石: 想制作和谐与幸福的理念电影》、《大山文化》2021年夏号(第80号)。
- 7 Thomas Sobchack、Vivian Sobchack、Joo Changkyu(外)翻译,《电影是什么(An Introduction to Film)》、肥料、1998。
- 8 Lee Daehyun,《我们没有电影天堂》,DAHALL传媒,2010。



#说到

处于歧视边缘的语言



隐藏在韩语里的日常生活中的歧视

Shin Ji-young 高丽大学 国语国文学系 教授





我们的社会存在着很多种歧视。我们可以很容易想到对于性的歧视，对于残疾人、学历、外貌、种族、年龄、外国人、地区等的多种歧视。其中，在韩国社会最为日常且广泛的歧视是什么呢？

这些歧视在我们的日常太过于普遍，以致我们会忽略它甚至对其麻木。这些歧视大部分人可能都经历过，但它往往会被埋在理所当然的意识中。我们日常所用的语言不仅加强了这种歧视，频繁的使用也更加使得我们的意识变得麻木。所以，这种歧视其实是最为恐怖的。更恐怖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人们享有了既得利益，那么歧视就更难以消失。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这就是对于“年龄的歧视”。

作为国语学者，我之所以尤其关注年龄歧视，是因为这种歧视与韩国语有着很深的关系。我们社会中存在的这种歧视来源于我们的语言，它通过强化和日常的使用，让我们难以意识到它存在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时时刻刻地提高警惕，否则使用韩国语的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年龄歧视主义者。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想法太过于极端。其实仔细想想，年纪大的人没有理由就应该是长者、地位高的人、前辈，或是更有权力的人，而年龄小的人也没有理由就应该是下人、地位低的人、晚辈，或者权力弱小之人。更何况，我们最初的教育是以平等为基础的。我们了解人类不分贵贱和高低，平等是社会存在的最高价值。我们要与不平等和歧视相抗争，我们都要为了实现平等而奋斗。

但是，我们的语言使我们成为一个“善良的”年龄歧视主义者，尽管这并非我们所愿。因为语言让我们把歧视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日常的使用又加强了这种年龄上的歧视意识。

为了寻找其问题所在，让我们先看看有关“年龄”的几个情节，深入探究一下我们对于年龄的想法。另外，我们可以再了解一下这样的想法与行动是怎样通过语言来表现并得以强化的。我们将一一点破语言的年龄歧视与年龄权力的存在方式，以及这一权力所造成的多种问题。另外，我们也要深入思考有关年龄的歧视在语言中对我们意识的支配程度。下面我们就一起看一看有关年龄的四种风景。

有关语言的四种风景

风景一：“年龄”为何如名字一般重要？

几年前，我们与牛津大学的教授一起策划了韩英、英韩翻译研讨会，并得到了教育部的援助。该课题的进行方式是先选拔一些对翻译感兴趣的学生，进行翻译相关研究，然后访问牛津大学，并与牛津大学的学生一起进行研讨会。

两所学校的学生第一次在大学里会面时，首先由我校学生们轮流做自我介绍。其中一个学生做自我介绍时说了自己的名字和年龄，并且他还介绍说自己是访问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学生。我忽然对这一熟悉的场面，感到了一种莫名的陌生。我也发现不仅是这名学生，之前做过自我介绍的学生也都说过自己的年龄和年级。我之所以对他的介绍感到如此关注，也许是因为他在介绍年龄的同时还强调说自己是“最小的”这一点。

如果所在的场合不是牛津，而是首尔，所说的语言不是英语，而是韩语，我可能对于这样的自我介绍不会感到如此陌生，反而会觉得很自然。但是当我在牛津大学

听到了用英语做的这样的介绍的时候，我就感到十分异常。在我有意识地听他们介绍时，我发现所有的学生都要么介绍了自己的年龄，要么介绍了自己的年级。

而英国学生的自我介绍就大有不同。他们在介绍自己的名字后会介绍自己的母语是什么、会说几种语言、专业是什么、感兴趣的领域是什么等。没有学生介绍自己的年龄或年级。这使我对于比较熟悉的情形产生了怀疑，也让我感到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在做自我介绍时必须介绍自己的年龄？

我怀着这种疑问，想起了我在英国的留学的时候。回想起来，我在英国与人见面时从没有介绍过我的年龄。我甚至不太记得与我非常要好的朋友的年龄，都不清楚他们比我的年龄大还是小。而在英国交往的韩国朋友则恰恰相反，对于比较亲近的朋友更是如此。

那么再重新回到起点，我们为何在做自我介绍时一定要介绍自己的年龄？

风景二：更为关注年龄的我们

听说对于不了解韩国文化的人，在第一次来到韩国时

会经常遇到以下这类尴尬的事情。在韩国，初次见面时总是会问起年龄。他们说无法理解韩国人为何初次见面总要问起年龄，并批评说这是个很奇怪、很无礼的行为。我们可以通过小孩子们初次见面时的情形来了解一下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多么自然的事情。当两个小孩子初次见面，会先互相问候，然后说自己的名字和年龄。如果对方没有介绍自己的年龄，就会很自然地问对方多大。然后对方很自然地会说出自己的年龄。

如上所述，我们从小就学会了很自然地问起对方的年龄。由此可知年龄在我们的意识中就好比名字一样重要。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对于初次见面的所有人的年龄，我们并不是都很关心。对于某些人，我们会问起年龄，然而对于某些人则不会。对于年龄的提问也不是总会被人接受，这也有让人感到无礼的时候。

举个例子，小孩子在初次见面时问起“几岁了？”或者“你上几年级？”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于成年人也是如此。在年龄差不多的人们初次见面时比较关心对方的年龄。虽说也有不直接而委婉地提问的时候，但一般情况下不会对于直接或间接地问起年龄而感到不愉快，也不会认为这是无礼或奇怪的行为。

但是假设有10岁的小朋友第一次见到30岁左右的大人时，问道：“请问您多大了？”那么这个大人一定会感到很荒唐，或者会因孩子这样的提问大笑起来。然而大人问小孩子的年龄却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当30多岁的成年人与50多岁的人见面时又会如何？这种情况下两个人都不会在初次见面就问起“几岁了？”，因为这会被认为是无礼的行为。尤其是看上去年龄比较小的人对于年龄比较大的人问起年龄的行为，会被认为是很不谦逊和无礼的。

如果彼此见面时，年龄差距比较明显或彼此的关系在见面之前就已经确定下来了，那么一见面就问起年龄就是失礼或没有意义的行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会问起年龄。当然如上所述，当大人见到小孩子的时候会很自然地以这种提问开始对话。另一方面，在互相不知情的情况下，彼此年龄差不多的人们在初次见面时问起年龄不会被认为是无礼或不谦虚的行为。

那么当我们遇到与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人时，为何如此关心对方的年龄？为对方提供信息时，我们为何把年龄看作像名字一样重要的线索？是否还有其它的国家的人会像韩国人一样如此重视年龄，会对年龄如此敏感呢？

风景三： 虚岁、周岁、年岁，我到底是几岁？

我们不仅对年龄敏感，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具有三种年龄的独特的国家。如果在这一领域制定多样性的指标，我们恐怕会是世界第一。现在在韩国普遍通用的年龄是虚岁、周岁和年岁。

虚岁是指刚出生就算一岁，从第二年的一月一日起每过一年，就长一岁。周岁是指从出生日期过满一年才是一岁，每过一年就长一岁。而年岁和虚岁差不多，只是刚出生的年不算年龄，从第二年的一月一月开始计算为一岁，每过一年就长一岁。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出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那么他的虚岁就是一岁，周岁是零岁，年岁也是零岁。但仅过一天的第二年的一月一日起，他的年龄就是虚岁两岁、周岁0岁，而年岁为一岁。

在我们社会最普遍通用的年龄是虚岁。一般说“我是几岁”的时候，我们说的年龄是虚岁。新的一年到来之际，人们汇聚在一起吃年糕汤，人们知道自己从那一天起年龄即长了一岁。韩国人一般以虚岁为准，所以在聊天时一般所说的岁数，指的就是虚岁。

使用虚岁是在过去计算年龄时属于汉字文化圈的社会

的共同特点。中国，日本、越南等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大部分都以虚岁计算年龄。但这些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在进入近现代后接受了阳历，在此过程中去除了虚岁，并采用以周岁计算年龄的方式。由此，据说目前全世界使用虚岁的国家就只有韩国。而对于北朝鲜，据脱北居民的说法是正式场合使用周岁，而平时大部分还是使用虚岁。

其实我们的法定年龄也是按周岁计算。即法律上以周岁为准，所以法律上所规定的年龄都是周岁。但是有个问题，因为周岁的起点以生日为准，而每个人的生日都不同，所以为了使用便利，就产生了年岁。因为作为年岁，只要知道出生之年，就很容易计算，所以有些法律上为了方便计算年龄，而把年岁作为法律上的指标。在2001年青少年保护法改定时期首次采用了年岁，并把出生于同一年度的人都视为同岁，在这种意义上是与虚岁相同的，而不同点在于年岁会把出生的当年视为0岁。

目前大部分的国家都以周岁计算年龄。甚至连汉字文化圈的发源国中国虽然过去也以虚岁计算，但现在都已使用周岁来算年龄。过去汉字文化圈的日本、蒙古、满洲、越南等国家也从过去的虚岁改换成现在的周岁。

那么，为何偏偏我们还在普遍使用虚岁？虽然有明确的法律标准规定了周岁为法定年龄，但为何虚岁还毅然存在于我们的社会？

风景四：早〇〇年生的起源

第一次在节目里听到“早年生”这个词的时候，感到非常的神奇。记得当时是一个偶像组合中20多岁的艺人在讲述自己的演艺生涯时使用了这个词。他说因为自己早上一学年，所以比班里的其他同学都小一岁。而在他的练习生时期，有另外的一个练习生过来和他发火说为何隐瞒自己的年龄，当时他就觉得特别荒唐，因为自己从未对其他的练习生说过自己的年龄，更不用说是隐瞒。

可能那位练习生是因为以下理由而生气的。当时那位偶像所属的公司里有他的高中同学。而那位练习生有一次看到偶像和他的朋友互相说伴语，所以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比自己大一岁。所以每次说话时都使用了敬语。但是后来发现自己与偶像的年龄一样，就感觉自己被欺骗，所以非常的生气，埋怨他为何不早点告诉自己是早年生，因为他一直以来使用敬语是因为认为这个偶像比

自己大。经历这个事情后，为了避免发生误会，那个偶像每次都会主动地先告诉对方自己是早年生。

我记得当时那个艺人讲述时表情显得非常严肃。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隐瞒，只因自己是一月(或二月)出生而早上了一年学，却要受到这样的误会，感到非常的委屈。他还说自己又不是故意想要隐瞒的，而对方却胡乱猜测后还大发脾气，感到非常无语。

其实直到高中，只要是同一个年级，学生们就并不太关注彼此的年龄。大家会认为同一年级，当然会是同岁，所以同学之间都会说伴语，也会互相称呼对方的名字。问题会出现在毕业后走向社会的时候。之前的那个偶像，也是在走向社会后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因此相比其他人，他更早地了解到“早年”的意义与必要性。

无法准确地了解“早年生”这个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网络搜索的结果显示，第一次使用这一词的时期是2002年10月。当时有个人在网上问到为何1、2月生的人需要早上一年学时，使用了“早〇〇年生”这种说法。

“早〇〇年生”是指早上一年学，即虚岁为7岁时入学的20多岁或30多岁的青年在讲述自己年龄的时候主

要使用的说法。然而，2002年出生的人成为了最后一批使用这种说法的人。2008年3月1日小学教育法施行令修订后规定，2009年入学的2003年出生者，除去提前入学的情况，不再允许1，2月出生者的“早期”入学。然而，对于2002年以前1，2月份的出生者，在自己的生活中就往往会用到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在他们生活中是必须存在的，其原因很简单。理由是需要告诉对方自己比同一年级的同学实际上小一岁。就像上述偶像一样，是为了避免受到隐瞒年龄的误会。

所以早年生的人有一种强迫观念。因为他们了解自己虽然比同班同学小一岁，但是与他们平时互相说了伴语，所以在其他场合如果不告知自己是早年生的，可能会引起对方的误会，误解自己是为了受到特殊待遇而故意装作比对方大一岁。所以在某种角度上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使用的盾牌。其实仔细想想也不过就是差几个月，又何必执着于年龄，以至于使用“早年生”的说法呢？

韩语敬语语法的作用原理

对熟悉而陌生的情形产生的疑问，实际上都与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之所以对于年龄尤其敏感，对于他人的年龄如此关心，仍然维系着虚岁的计算方法，使用早年生的说法，对一两个月的差异也感到如此敏感，甚至依年龄而被理所当然地赋予其不平衡的语言权利，这些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在发展的过程中变得更加牢固与日常化后随之产生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探讨一下语言是如何在我们社会作为年龄歧视的运作原理而发挥作用的。其实，把韩国语使用者造就成“善良”的年龄歧视主义者的罪魁祸首是韩语中发展得比较成熟的“敬语语法”。韩语中的敬语会自然地让人们学习如何论资排辈，也会让人们固定其等级。同时，为了更恰当的表达，需要对表现辈分的语句要素做出敏感的反应。

韩语中的敬语语法非常精巧。韩语的敬语语法大致分为三种，即主体敬语法、客体敬语法和相对敬语法。

主体敬语法是指明确文章中主语相对的人物与我的关系的语法。如果文章中主语是比我年龄大的人，那么主

格助词 “是(이/가)” 就要改换成 “是(께서)”，同时谓语中需要添加 “시”，而像一些谓语则需要更换整个谓语。比如 “老师正在吃水果(선생님이 과일을 먹고 있어요)” 就要改成 “老师正在吃水果(선생님께서 과일을 드시고 계세요)” 才比较恰当。

其次是客体敬语法。客体敬语法是指明确文章的宾语或副词相关的人物与我的关系的语法。文章的宾语或副词相关的人物，如果比我的年龄大，那么为了对客体尊称，就需要把 “给/向(에게)” 改成 “给/向(에게)” 并同时更换谓语中的一部分。所以韩国语中通常认为 “给老师雨伞了(선생님께 우산을 드렸다)” 比 “给老师雨伞了(선생님에게 우산을 주었다)” 表达得更为合适。

最后就是相对敬语法。相对敬语法是指用称呼对方的话和结束语来表示对话对象与我的关系的语法。所以当我们听韩语的时候，马上就能猜到说话人和听者之间的关系。例如，可以通过是说 “喂，你过来下(야, 이리로 와)” 还是 “老师，请过来下(선생님, 이리로 오세요)”，马上就可以了解到说话人和听者之间的关系。通过 “喂(야)” 以及 “过来(와)” 就能知道听者与说话人是年龄差不多，还是听者比说话人年龄小。如此看来，韩语中的

相对敬语法是以对方的称呼(称呼语)和语句的结尾(终结性表达)来表示的。

韩语敬语语法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相对敬语法。至于主题敬语法或客体敬语法的对象，即文章的主语、宾语或副词相关的人物有可能是存在于我眼前的人物，也可能不是。然而，相对敬语法中作为对话对象的对方就是在我眼前与我对话的人，所以这一点尤其重要。另外，为了结束一句话，必须使用结尾来结束。然而，结尾表达中必须要使用到相对敬语法。语句里不使用结尾表达是不恰当的。

另外，相对敬语法里对于对方与我的关系，必须要由我说出来。所以，如果不恰当地使用相对敬语法，会使人感到不快或尴尬。不能恰当地适用敬语法，就不能维系与对方的关系。那么在设定对方与我之间的关系时，需要注意的方面有哪些呢？

为了正确地使用相对敬语法，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年龄。对方如果比我的年龄大，那么就需要使用敬语，而如果和我同岁或比我小，那么就使用伴语了。这里体现了韩国语使用者们心照不宣的承诺，也就是韩国语的语法。当然，年龄并非是全部的考虑对象。除了年龄，

相对敬语法的使用与否还取决于说话人与听着之间的职位高低、亲密度以及说话场合(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场合)等重要因素，它们都有助于决定是否使用相对敬语法。

语言阴影下的年龄歧视

之所以韩国人如此关心对方的年龄，并敏感地做出反应，是因为在与对方讲话时，年龄作为重要的信息，会与语气和言辞恰当与否产生关联。对于决定对方的称呼，或需要恰当地使用结束语的时候，年龄也作为重要的信息而发挥作用。如此看来，我们如此关心对方的年龄，并对此敏感地做出反应，是为了更恰当地使用准确的言辞。

无法放弃虚岁的理由

为了准确地表达韩国语，了解对方的年龄是非常重要且迫切的。然而，如果对方的年龄经常变动，那又该如何呢？这可能会造成无法与对方很好地维系对话关系的结果。

周岁是按各自的生日来计算的。也就是说，人们的年龄不是在某一天一起长一岁，而是各自在自己的生日到来之日长一岁的。所以在特定的日期，可能只有自己长一岁，或者只有对方长一岁。所以，对于出生于同一年而生日不同的两个人，在某天可能年龄相同，而在某天又不同。如果不能记住对方的生日，当再见到对方时，因为不清楚对方的年龄，所以就不清楚需要使用敬语还是伴语，这就会变得非常混乱。

相反虚岁就与此不同。因为每个人长岁数的日期相同，所以对方与我之间的年龄差距绝对不会发生改变。在我长一岁的同时，对方也会如此。绝对不会有只有我自己长一岁或对方长一岁的东西。综上所述，虚岁作为年龄的计算方法，对于我们了解对方的年龄，并恰当地表达言辞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上，虚岁在中国、日本及越南等东亚文化圈是一个悠久的传统。然而，除了韩国的其它国家都已经去除了虚岁的说法，而只使用周岁。因为它们不像韩国这样，会以年龄作为选择语言的标准。

“早年生”的诞生

“早年生”之说完全是因为韩国语语法才会产生的。入学之前语言的选择标准是对方的年龄。然而进入小学后直到高中毕业，语言的选择标准就成了年级，而不是年龄。只要年龄相差不是特别大，即使实际年龄不同，只要年级相同，则互相以伴语称呼对方。因为在同一个年级就会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年龄相同，所以早年生的人会无意中成为“族谱破坏者”。他们破坏族谱是因为实际年龄与年级不同。因为早上一学年学，所以他们与比自己大一岁的人上同一个年级，并以伴语称呼对方。如果抛开学校的条件，假设没有上学，那么他们因为存在年龄差距，年龄小的人就需要对比自己年龄大的人以敬语称呼，而不可以使用伴语或直接称呼对方的名字。

由此，早年生的人在进入社会后就会形成一种尴尬的三角关系。在公司有个叫A的人与同一届进入公司的B职员关系很亲近，B比A大一岁，两人私下里称兄道弟。有一天，B带着自己的朋友C与A见面。但是B的朋友C却是A的高中同学。三个人在一起互相的称呼就显得非常的奇怪。因为A称呼B为“哥”，而A却以伴语称

呼C，并直接称呼C的名字。两个人都比A大一岁，然而A称呼一个人“哥”，并以敬语相称，而对另一个人却以伴语相称，这让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都感到非常的别扭。

所以早年生的人往往被非早年生的人认为是破坏神圣的年龄阶级的叛逆者，即使他们并不是有意想要破坏这种阶级的。所以，他们在给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人做自我介绍时，为了简便，就运用“早〇〇年生”的说法。由此，他们就不需要啰嗦地解释“因为早上一年学，所以比大家小一岁”，而可以简单地用“早〇〇年生”来概括前面的意思。但这种说法目前几乎成为了历史用语。因为自2008年政府禁止了7岁儿童早期入学，所以2003年以后出生者就不再存在早年生了。

年龄的大小代替了身份的高低

我们对于年龄持有敏感的态度，把年龄的大小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并赋予了年龄不可侵犯的权利。所有这些对于年龄的歧视已成为我们的日常，而存在于其中最中心的就是韩国语中的“敬语语法”。不遵循敬

语语法，就是不遵循正确的语法，也就会成为不标准的韩国语。如果一个孩子第一次见到大人时使用伴语，那么就是对于现在韩国语语法，即对于韩国语共同体建立体系的一种违背，这也会成为问题。

然而，韩语语法完全可以由韩语使用者来改变，而且事实上它目前已按韩语使用者的协议得到了改变。语言既不是金科玉律，也不是不可侵犯的圣域，而只是社会存在的一种承诺而已。语言可以因使用者的协议而改变，然而没有使用者的协议，语言就永远无法改变。通过韩国语的变迁史，可以看到韩语使用者们以怎样的承诺如何进行了改变，从而了解韩语使用者对于变化的想法。

比如，在过去人们把身份制度作为世界观的时期，身份就成为使用敬语的绝对标准。身份高的人对于身份比自己低的人使用伴语，而身份低的人对于身份高的人就要使用敬语。此时，年龄在语言中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不管年龄有多大，如果自己比对方身份低，就不论年龄的大小，都需要以敬语称呼对方，并接受对方对自己的伴语。相反不管自己年龄有多小，只要身份高，就要对比自己身份低的人使用伴语，并接受对方的敬语。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韩国语语法。

在身份制度废除后，韩国语使用者一直在更改语法。因为韩语使用者的世界观有了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并非瞬间形成的。身份制度废除后，其副作用持续过相当长的时间。

我们可以通过很早以前的新闻报道或当时的文学作品了解到这些事实。尽管现在已经废除了贵族与平民的身份，然而贵族身份的人们当见到平民时，不管年龄大小，还认为别人应以敬语称呼自己。如果对方没有说敬语，就发火并斥责对方没有礼貌，甚至大打出手。这样的事情我们会很容易看到。

身份制度自甲午改革废除，至今已过126年之久。若以现在的世界观思考当时以身份为标准而选择使用敬语或伴语的情况，人们可能会感到非常的陌生，甚至奇怪。如果以后韩语得到进一步改变，年龄不再成为选择敬语或伴语的标准，那么后代人也可能会对于现在的语法感到奇怪。

需要被改变的是什么？

现在的韩语敬语法中身份歧视已不复存在。然而，身份歧视却被年龄的歧视取而代之。年龄大的人希望被年龄小的人以敬语称呼，并视其为理所当然。同时，年龄大的人认为可以对对方使用伴语，并不拘礼节。相反，年龄小的人就理所当然地认为需要以敬语称呼年龄大的人，并接受对方的伴语。年龄大的人要求对方说话时持有恭敬的态度，如果认为对方表现的态度不够恭敬，就会感到不愉快，甚至大怒，斥责对方没有礼貌。

一般来说韩语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敬语法。其具有的作用是表现对对方尊敬的态度和礼节。然而这种说法不是对于敬语法中“敬语”的正确解释。其实韩语中的敬语法既可以表达尊敬，也可以表达谦卑。

像这样差异性的思考方式在解释敬语法的过程也得以体现。在解释敬语法时，通常会运用“年龄大的人、年龄小的人”或者“身份高的人、身份低的人”或者“长辈、晚辈”等用法。比如，在相对敬语法中通常会解释其为“根据说话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年龄小的人对年龄大的人需要说敬语，而年龄大的人对年龄小的

人就要说伴语”。在之前的说明中，笔者也曾提及相同的说法。

韩语使用者在学习韩语时会自然地学到一种意识，年龄大的人就是长者、长辈和身份高的人，而年龄小的人就是小辈、晚辈和身份低的人。通过语言的使用，这种思想也会被强化。韩语使用者相比其他语言的使用者对于年龄会产生特殊的感受，其原因就在于此。继而，他们就在自己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年龄歧视主义者。

韩语的敬语语法所造成的年龄歧视主义形成于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并在学习的同时变得更加熟悉且成为日常形态。所以，人们很难感觉到问题所在。敬语与伴语的阶级意识使得使用敬语的人与使用伴语的人之间产生一种权力关系，并设定了不平等的关系。这最终当然会成为歧视。然而，我们学生时期所学到的是没有人上人，也没有人下人。韩国追求的是“平等”的价值，并且我们会异口同声地说会把这种价值传授给我们的后代。然而，韩语使用者正在通过每天使用的语言，不断地巩固人上有人，人下有人的理念。

现在的韩国语就这样忽视了韩语使用者们所追求的理念，也在不知不觉中造就了年龄歧视主义者。语言作为

体现思想的工具，却没能能够体现我们的思想。语言如果不能体现我们的思想，那么需要改变的是语言，还是我们的思想？

印刷术与多样性

Yu Jiwon 字文化研究所 研究所所长 字体排印学 研究员





有关字体排印学的多样性的论点，可以整理为以下五个部分。

- ① 世界文字的多样性
- ② 有关文字空间排列形式的文化多样性
- ③ 对于弱者及被忽视人群的字体排印学
- ④ 字体排印学与多种领域的协作
- ⑤ 领域内部组成人员的多样性与歧视问题

以上内容中的④、⑤不仅是字体排印学的领域，还涉及到其它领域，所以我们省略这两个部分，仅探讨上面的①、②、③的内容。首先介绍下字体排印学，这个听起来似乎比较生疏的领域。字体排印学，其内容涉及字体的字形。字体具有字义、声音及字形。字义、声音及字形相互产生作用，然而字体排印学的主要关注点是字形。

字体可分为“文字”和“活字/字体”。金属活字时代使用了“活字”的说法，而在数码时代使用了“字体”一词。文字需要人们用手来一个一个写，而活字或字体

是机器所用到的文字。机器可以对于非特定的多数对象进行复制并大量生产。例如，如果用手写的日记或信件属于字体的领域，印刷成活字的书就属于字体排印学的领域。要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必须有电脑或移动设备等机器，必须用键盘打字输入，且只要上传一次，很多人就会看到同样的内容。所以，这也可以说是字体排印学的领域。手写的文字属于书法、纯美术或工艺领域，而机器使用的活字或字体属于印刷设计领域。文字与活字或字体之间也会互相产生影响，所以可以说字体排印学主要涉及文字相关的所有内容。

如果说互相以“语言”对话，称为语言(Verbal)交流，那么“文字”就是用眼睛交流的属于视觉领域的视觉(visual)交流。就像话语中如果语气发生变化，即使是相同的内容，因为传达的语调和情绪不同，其意义也会不同。而字体排印学则可以作为视觉上的语气，以“语气”来起到情绪上的功能作用。在非语言层次上也会引起很多信息与感情的交换。

“① 世界的文字多样性”与两个层面相关。一个是与文字反应的人体生物学，另一个是该文化圈的环境及人类学层面相关的部分。“② 有关文字空间排列形式的

文化多样性”不仅与世界文字文明的历史和生活习惯及价值有关，还与技术工学方面有关。而“③ 对于弱者及被忽视人群的字体排印学”则有着心理及社会的面貌。

世界文字的多样性

多语言字体排印学(multilingual typography)自2000年起在印刷术领域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主题之一。2010年以后，罗马字文化圈和其它文字文化圈对它的理解也逐渐成熟。

多语言字体排印学中使用“非拉丁字母(non-Latin)”这一用语。“拉丁(Latin)”意为拉丁字母，即罗马文字。在世界众多文字体系中，只赋予罗马文字特殊地位，而其余全部以“非拉丁”来概括的这一情况，让人觉得似乎不太合理。直到2010年代初，如果有人在国际会议上对此提出异议，那么罗马文化圈的人就都会提出反驳。一位欧洲设计师说道：“因为在文字样本中以罗马文字为标准，划分了有衬线字体和无衬线字体，以及最后的“非拉丁”选项，所以才会产生这一用语。”意思好像这一用语的产生是很自然且恰当的事情。正如有些人对于性的认知意识比较薄弱一样，我们只能认为这个人

是对于多文化的意识比较薄弱的人。他完全没有理解这一词代表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立场，反而去拥护这一说法。这完全是因为其对于其它文化缺乏共情而导致的。若以这种态度对待非罗马文字的文字体系，那么其标准就永远会以罗马文字为准，而不考虑其它不同的文化，并固执地只强调自己的文字，而对于不符合标准的都视为“愚昧”和“卑劣”。

对此，我在2012年以后对于多语言字体排印学倾向于西方文化的问题，提出了双向的“跨区域性”概念。我也在韩国排版学会的学会杂志《字迹11》(2005)上刊登了“以他人的视线唤醒内部人的潜力：对抗全球化的跨区域性”为题的访谈内容。当时，作为访谈嘉宾的印度字体排印学技术员兼印度理工大学古瓦哈提学院教授Udaya Kumar，对于印度这样如此复杂的语言及文字环境中，自己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泰米尔文字设计是这样描述的。

“印度是多文字的国家。有些文字是完全互不相同的，而有些文字又有些相似。(……)如果只对于我比较熟悉的泰米尔文字来说，如果适用于罗马字体的设计原则，那么就会有很多部分与泰米尔文字不相符。最头疼的部分就是测定单位和体系是不一样的。”

他表示，相比韩国，印度作为深受英语影响的国家，连媒体环境都要受到罗马文字文化圈的技术支配，他对此感到非常的担忧。

“事实上大部分的印度青年不使用自己的母语。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原因在于印度的小学到中学、高中，再到大学的所有功课都是以英语来授课的。在城市更是如此。这是英国帝国主义造成的影响。使用各个地区方言的学校只局限于农村地区。另外一点就是比较有作为的工作岗位对于英语的依赖程度比较强。所以大部分父母都会把孩子送进使用英语的学校读书。尽管英语的影响力比较大，印度的母语之所以能够避免急剧变化，是因为它本身拥有丰富的遗产和文学。而且农村还有很多人居住，他们也使用方言交流。然而，因为技术的发展比较着重于罗马文字，这种情况也在急剧发生变化。印度方言目前还远远赶不上手机、平板及电脑一样的数码媒体的发展潮流。作为一个设计师，我们有义务发展这种技术，将印度的方言安装在数码机器，并保障各种方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不能完成这个使命，我们将被全球化的大趋势所淘汰。我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然全球化具有非常多的优点，但这不能以牺牲地域文化和我们日常为代价。希望两者能得到和谐的发展。”

万里异国印度的文字对于我们具有何意义？文字体系是人类具有的知识遗产。文字不仅反映该地区的自然环境、生活习惯、行为表现，还可以反映包括语言在内的思考方式和社会规范及价值观。它也与每个文化圈的宗教和思想等众多体系结合在一起。然而，像罗马文字一样的其它文字文化圈对于这样的总体状态缺乏理解。因此，仅以技术层面来接触的话，该文化圈的人们肯定会感到有些不自在或不协调。

在《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中，一位地质学家说过这样的话。“可以通过观察地面上的截断面，推测地球内部的样子，并做想象和理解。”同样，文字在最初也只不过是痕迹和印记。如果说138亿年宇宙的痕迹是夜空中的星辰，38亿年地球的痕迹是地质，那么人类留下的就是文字和画像。人类留下了高深的痕迹来与巨大的社会文化及历史体系相维系。因为文字是特殊或非特殊以及所有的人都共同使用的东西，所以它反映了人体动作的效率，而人类的行动与动作兼具人类的普遍性与文化的特殊性。每个文化圈根据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都具有多样性。所以日常所用的笔记工具也应该随之而不同。

如果全人类只使用一种文字，那么可想而知我们会成

为井底之蛙。我们只会看到自己的天空，而其它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排除在视觉之外。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未来会具有怎样的变化，都是无法预料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更需要具备多样行动的人，以应付未来无法预料的情况。如果千篇一律，对于变化多端的未来肯定是束手无策的。一项对小孩子进行的脑科学实验证明了从小怀着好奇心玩过多种游戏和有过多多种经验的孩子，在长大后更有能力应对遇到的各种难题。也就是说，经验越丰富，对于变化的应对能力就越强。如果只以一种态度和思考方式接近某个对象，则很容易歪曲其形象。

经历得越多，就越可以通过反思，使得看待不同的态度更加成熟。观察多种文化可以打破锁定在一种语言或一个文化圈的固有观念。不同的文字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字和我们自身，并提高我们从不同视角看待问题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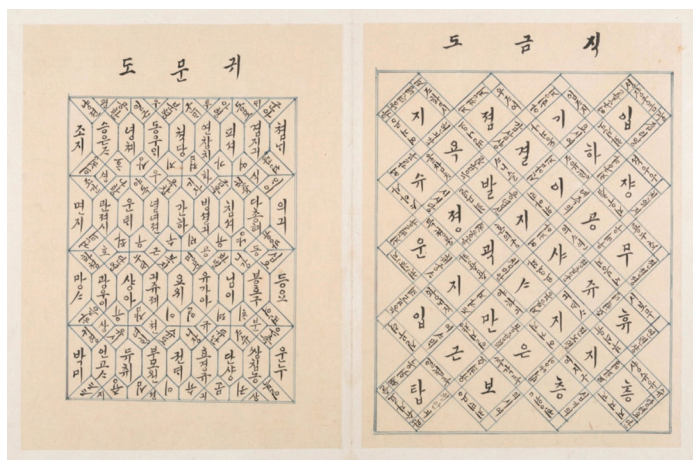
我们作为文字使用者，应该意识到罗马文字的垄断对于世界文字的多样性是一种破坏。它在数字媒体技术上不会保护稀有文字，并且会束缚人类的思考，会歪曲对现象和事实的理解和表现。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不同的文字为我们唱出的歌谣。

文字间排列形式的文化多样性

字体排印学既是理解现有文字并设计新文字的工作，也是将已经设计的文字在空间和时间中重新排列，而导出新意义的工作。在朝鲜半岛的高丽时代，金属活字在世界上首次被发明而出。但随着1883年近代印刷机构博文局的设立，通过日本引进了新式铅活字之后，传统的铜活字就被西方的印刷术所代替。从高丽相传到朝鲜时代的东亚传统金属活字印刷和欧洲古腾堡式金属活字印刷在机制的各个细节都有所不同。近代以后，我们继承了古腾堡式机制，并以罗马文字文化圈占据技术领先地位的机器和软件为基础，使用着韩文和韩语。

韩文诞生的空间是东亚传统印刷空间、生活空间、认识和思维空间。即使是同样的韩文，近代以前和以后的空间体系、单位、排列和运用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当今的设备或特定的数字技术环境下，如果韩文相比罗马字写起来不方便或不好看，那么原因就会是它没有穿上适合自己的衣服。作为韩文使用者，我们都需要意识到这一点。

举个例子来看看《龜文圖》和《織錦圖》。这是《翼宗簡帖》里的两页，内容里有纯祖的儿子孝明世子写给



▲ 《翼宗簡帖》的<龜文圖>(左) 和<織錦圖>(右)。

来源: 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

妹妹明温公主的信。孝明世子可以说既是设计师，又是字体排印学大师。不过这并非他自己研究到的内容，而是来源于中国的《蘇惹蘭織錦圖》。这个排版就像是解密游戏，具有很强的游戏性。

细看小字，可以发现这里有前后颠倒的文字。即使没有箭头等辅助符号，也可以旋转纸张，并沿着阅读方向前进。文字排列的形状和形式告诉了我们这样的非语言线索。如果我们现在用电脑来设计这种布局，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就从上写到下，并用箭头等表示方向。写这个

文件的人应该在写字的时候是边写边旋转纸张的，如此一来，就会产生具有多种方向的视角。这不同于我们今天一向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文件方向，它打破了一种方向和固定视点。

当我们阅读文件或很长的文章时，我们的身体似乎是固定和停置的。但其实我们的瞳孔在动，安静地阅读时我们也会模拟文字的声音。无论是对于制作文件的人，还是读文章的读者，身体总会介入其中。而西欧和东亚的历史文件不仅是语言和文字不同，其排列方式不同，身体的介入方式也不同。

西方罗马文字以一次元的线性展开方式为起点，将文字排成一行。而汉字和韩文以音节为单位的正方形为基本模块，具有向四面八方展开的全方位扩张性。因为如此不同文字的空间属性，传统社会的东亚人对于处理信息、认知事物的方式也与现在不同。东亚人和欧洲人对于空间和时间的数学认知方式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虽然对于类似问题会得出近似值，但解题方式和身体的动作却完全不同。近代以后，我们虽然学习韩语和韩文，然而教育方法论却遵循西方的方式。也许对于我们目前来说，东亚的传统数学知识反而我们会感到陌生。另

外，这个多方向、多视点的动作也可能与气韵生动的美学价值观是相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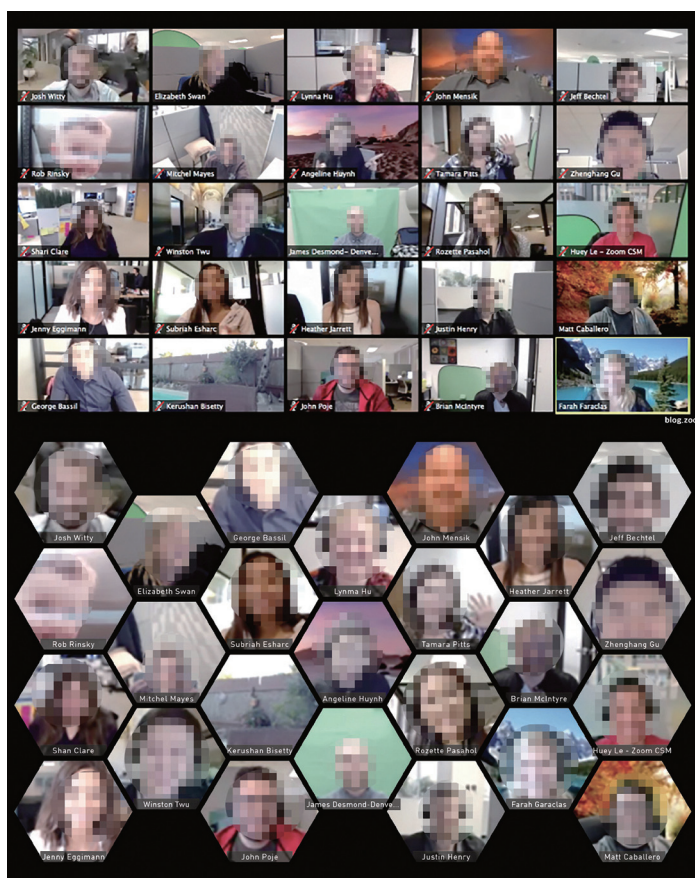
有一次，我曾使用电脑制作犹如东亚传统纸面上的放射型的图像，这不同于我平时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做法。亲身去实践理论上的东西，就可以从新的角度掌握它们。若使用现代电脑和软件来制作文件，不知道会有多辛苦。若出现错误，这个正反面颠倒过来的字体，修改起来也会非常麻烦。这对于读字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很容易且具有生动感和有趣的事情，然而对于制作的人来说其效率却会大大降低。所以在人们控制电脑的同时，电脑也会对于人类加以制约。

不管是对于印刷本还是手抄本，我们的祖先为何在发明印刷术后制作的文件仍然需要人们绕着圈子来看？如果这种方式很麻烦，那么制作人为何如此不顾麻烦采用这种方式？想到这里，我忽然有所领悟。因为传统社会的韩国人采用坐式文化，所以这种方式会很方便。如今我们在做电脑工作时，坐姿是固定的，显示器也是垂直固定的。然而在坐式空间朝下看高度比较低的桌子时，转起纸来就会很方便。因为桌子比较轻小，也比较容易挪动，所以就会随着转动纸张而自然地挪动身体，结果才会出现

如此排列字体的文件。如果在立式空间放置沉重的家具，其空间的功能就会固定下来。然而对于坐式空间，它可以作为一个房间，也可以作为一个工作室，又或者是一个用餐空间，再或者是一个客厅。如此灵活的空间使用习惯和生活习惯，对于写字的空间也产生了影响。

如此灵活的应对能力可以为目前在数字画面空间运用字体的时代提供多种创意，并以此应对各种变化。也有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比较古老的媒体空间型式重新回到了我们身边。我们在网上阅读长篇文章时，会以滚动的方式阅读。滚动来源于卷轴的旧形式。卷轴在欧洲和东亚分别在1世纪和7~8世纪左右被六面体空间“抄本”方式的书籍所代替。但随着我们开始在网上阅读长篇文章，卷轴又悄悄地再次回到了我们身边。

再看看《龜文圖》和《織錦圖》。它们不是以一列式空间排列，而是以多方向多视角的空间排列，而且它们也有90度或非90度倍数的角度，即不是四角形而是“六角形”和“45度斜线方向倾斜的四角形”。在纸质媒体上，如果运用非直角的角度，成本浪费就会比较大。在大量生产中的标准化工程中，采用国际公制为基础的四角形纸的规格，损失才会减小。然而数字画面多



▲ 视频会议软件Zoom的参与者画廊画面(上)。
 笔者建议的画面(下)。不需只用一种方式固定，而可以在几个选项中选择各种方式。

多少能摆脱这些问题。

比如在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形势下，可能大家对于视频会议软件Zoom都比较熟悉，我们就在此来看一看Zoom参与者的画面。这个画面对于人们的视觉也许不是一个最佳的认知状态，因为它将显示器的规格按横竖分割成了多个部分。在接触过很多超出现代标准的多种文化空间排列方式后，我忽然想到正六角形蜂窝形态对于目前的形式应该是最佳不过的。按着这种想法，我试着将Zoom画面的内容固定起来而只改变了排列方式。相比横向长方形，正六角形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生活空间，并且它的形状与人的圆形脸型比较相似，所以会更加引人注目。另外，在人与人之间的布局上，其关注度也比较均衡，看起来更具有凝聚力，可以尽收眼底。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当某人讲话时，其六角形变大，其它六角形变小。当然，这种方式也会有缺点，也许它也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可能有人对于强调脸部而感到有负担，或者因不容易看到手的动作而产生不便。因为数字视频沟通是空间形式尚未完全固定的摇篮期，所以我认为尽可能进行多种尝试是有很价值的。体验并运用各种文化圈的多种方式，会给数字媒体的空间排列带来多方面的灵感。

为弱者和边缘人群制作的印刷品

对于正常的指标，每个社会都会有所不同，每个时代都会有所变化。如果只对某种特定属性规定为正常，并要求其他属性强制顺应，那么我们社会就会充斥不正常的人，由此产生不合理、愤慨和被侮辱感。如果字体排印也只把标准放在多数人和平均的概念上，那么作为原本目的的沟通就会被人忽略，这会使得平均以外的人十分受挫。

当今韩国规定正常的指标主要以居住在首尔的身体健康的成年男性为标准。这是对于性别、年龄、地区、身体健康状况等的标准。因此，从地区上讲是地方居住者，从身体状态层面上是患者和残疾人，从性别层面上是女性，而从年龄层面上是高龄者和儿童的人就成为了标准范畴之外的弱者和少数人。然而，我们社会成员中相当大的部分就是这类人。当某些人被排除在标准之外，那么在标准之外的人就会产生很大的不便，而这些不便也会一一连在一起。

如果想要观察按性别或年龄等变化的身体条件，就要制定新的标准。如果要修改现有规则，就要先查看适用

该规则的现有标准。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平均标准。字体设计以不特定的多数用户为前提，制作或选择适当的字体也需要各自的标准。其基本标准有三种。即可视性、解读性和可读性。

“可视性”是吸引视线的能力，“解读性”是快速解读不同文字的能力，而“可读性”是读长篇文章时不会感到疲劳的能力。如果以时尚加以蕴意，可视性就是虽穿起来不舒适，但看起来却很耀眼的高跟鞋。而可读性就是可以让人一口气跑完42.195公里的马拉松鞋。正如马拉松鞋的设计需要在跑完后才知道它的设计好与坏一样，可读性强的字体需要在读完后才可知其功能设计的优与劣。可见性是属于大字、题目和单词等的领域，而可读性是属于小字和长文章的领域。因为我们在视觉上对于越小的字体，就越难以看到它的细节，所以对于大字而言的好看字体和对于小字而言的有功能的字体是互相不同的领域。字体在从“大”转为“小”时，人们就会从“看”转移到“读”，从“视觉(visual)”领域转移到“光学(optical)”的领域，其功能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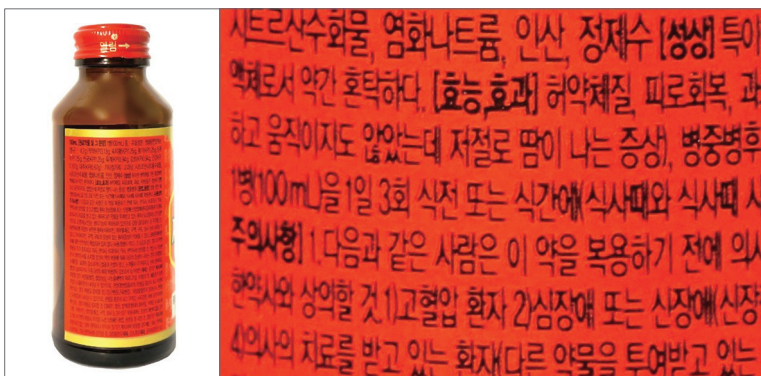
可视性如果不能发挥作用，美感的舒适度就会下降；解读性如果不能发挥作用，就会发生难以读取正确的信息的

危险情况；而可读性如果不能发挥作用，那么眼睛和身体就会感到非常的疲劳。像这样，日常领域的设计如果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那么构成社会的不特定的多数人就会被忽略，从而导致社会中蔓延的疲劳感和被侮辱感。

如果说这一不特定多数人的标准到目前为止都是以健康的成年男性的身体为指标的，那么现在印刷品就有必要对高龄者、儿童、左撇子或自闭症等少数人群制定新的指标，也需要修改规则并给予照顾。

为了高龄者的阅读

韩国国内对于字体排印学领域的认识较低，尤其是可读性领域的疲劳正在蔓延。医药相关产品或说明书甚至连字都看不清，为了使用者的最基本的考虑都没有达到。让我们来看一看关于某医药品的一个例子。比起“柠檬酸水化合物”这样对于一般人没有什么意义的语句，“成人每天3次”的服用量和“可以加热饮用，但放入微波炉会很危险”的内容应该更加明显地被区分开来传达给消费者。然而，它的字体小到连年轻人都要去灯光明亮的地方寻找半天才能找到。对于视力不好的高龄者来说就更不用提方便与否了。



▲ 这是韩语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难以阅读的文字之例。使用者必须认知的重要信息都没有区分等级。右侧是被放大的文本。

为高龄者制作的印刷品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它们并不是只要放大字体就可以了。上了年纪身体就会发生变化。对于文字，不仅视力会发生变化，认知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儿童对于移动着的或新的事物反应灵敏，那么高龄者就是对于固定的和比较熟悉的事物的反应较为灵敏。进化论中也有对于这一部分的说明。孩子们对于未来未知的世界需要不断地适应，而高龄者却可以以积累的经验来发挥智慧。在技术和社会没有像现在这样发生巨变的时代，人类也许是根据年龄适应社会的。然而对于时刻都在变化的现代社会，应该理解这对于高龄者是很难适应的现实。也许他们性格变得顽固也是出于这种原因。

然而，目前社会上活跃的设计师大部分是二十多或者三十多岁的人，而决定由谁设计的人也不过四十多或者五十多岁。在对高龄者的身体和认知完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设计师们最好进一步与高龄者接触后以科学研究来推论并进行设计。设计师们有必要意识到自己的设计可能忽略了某一特定的人群。新颖而创新的设备对于小孩子或年轻人也许会是一个不错的项目，然而对于高龄者来说却可能会是一个繁琐且难以适应以致让人放弃的东西。设计需要的是让他们从熟悉中感到安全感。

可能我们会认为字体越大就越好，然而纸面或画面总是有限的。文字的大小与要传达的单词及信息的量、空间的面积都具有函数关系，所以总是应该有一个适当的尺度。如果字体太大，在视觉上可能会带来攻击性。但把比视力正常的年轻人可以阅读的文字大小稍微放大一点的设计，是很有必要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对于认知心理学家兼视觉识别专家Keith Rayner的视线追踪研究中由字体排印学家Sofie Beier图解的图像。人的眼睛在阅读的时候不会以 I, t, o, o, k.....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而是以块为单位阅读。这被称为“眼球跳跃运动(saccade)”。年轻读

Reading pattern with eye-tracking

Longer saccades / More regressions / Longer fixations

Older readers (70–92 years)

I took a tour of a famous building while I was on holiday.

The diagram shows the sentence "I took a tour of a famous building while I was on holiday." with three green circular fixations. The saccades (dotted red lines) are long and few in number, indicating that older readers take large jumps between a small number of fixations.

Younger readers (18–34 years)

I took a tour of a famous building while I was on holiday.

The diagram shows the same sentence with seven green circular fixations. The saccades (dotted red lines) are short and frequent, indicating that younger readers take smaller jumps between a larger number of fixations.

Rayner et al., 2006

▲ 高龄者的视线追踪。以认知心理学家 Keith Rayner 的论文为基础，由字体排印学者 Sofie Beier 制作的学术发表资料图像。

来源: Age-related deficits and their effects on reading, Sofie Beier, ATyPl 2019, Tokyo, Japan.

者与70岁以上的读者在眼球跳跃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高龄者固定一次视线时理解的内容比较多，跳跃距离较长，而视线跳跃的运动量较少，另外还经常返过来重读。所以字体太大，也会影响内容的理解。如果字体太大，以致经常跳行，那么反而会影响认知和记忆。

也可以在字体、字行和正文间加以充分的空间，让眼睛看得舒服些。这个空间被称为“白色空间 (white space)”。这种白色空间让年轻人阅读时也会感到舒

适。然而虽然读起来舒适，但因为文章结构松散，设计看起来并不怎么紧凑或精致。对于要求审美性的杂志，或者需要在一个页面装载大量的信息以给人一种刺激感的新闻来说，就需要尽量减少白色空间了。

考虑到这些方面，我们就会不难理解这种可读性印刷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带来了多么大的不便。就如上述的医药品说明书一样，医药品说明书其实主要是为年龄比较大的人提供的参考，然而其内容却比新闻的内容还要多。如果版面的空间不足，就有必要只摘取重要的信息，也需要制作得简短而明显，通过差别性的设置为这样的人群提供照顾。

为了孩子的书写

大人们也都有过少儿时期。所以可能会误认为相比高年龄者，自己更加理解小孩子。其实小孩子们相比大人，比较难以用语言表现自己，也难以贯彻自己的主张。他们难以用自己的话形成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经历。

2019年，在我制作《根据小学成长阶段的国语教科书排版建议：写作的行为形态及阅读感知形态》这本教科书的研究报告时，参观了小学一、三、五年级的教室内

的课程。以一个字体排印学家的视角来参观教育现场并观察的结果是，目前小学国语教科书中有很多部分没有考虑到小孩子的立场，这其中存在很多方面原因。

对于儿童而言，因为身体还比较弱小，认知也不成熟，所以字体的大小和其它很多方面应该与成年人的标准区别开。对于阅读，由于儿童刚刚开始认字，所以需要把解读性问题置于可读性问题之上。研究过程中发现，相比对于儿童的情绪和心理，国内很少有对于儿童的动作进行的研究或文献。报告书中包含了几个综合性的提案，其中有对于“书写行为形态”的“纸张”和“书写教育用字体”这两个方面的改善提案。

第一，需了解对于“纸张”而言，教科书既是书，也是具有笔记本性质的特殊媒体。书是阅读的空间，而笔记本是书写的空间。然而，我们往往更重视书的功能，而忽视笔记本和书写的功能。营造一个对于身体和情绪都十分舒适的环境，需要适当的具备材质和物性等物理条件。在书写过程中，作为使用者环境的是纸张的状态。根据不同的用途，会选择不同性质的纸张，比如书籍、笔记本、素描本等。教科书作为书籍，其图像和图画显色鲜明固然重要，而作为笔记本时就要更加强调不费力而书写自如的功



▲ 现行小学1年级(左)和5年级(右)教科书铅笔字渗透于纸张背面的样子。

能了。现行国语教科书只过于考虑前者的视觉效果，而严重失去了后者应具备的儿童的身体亲和性。

书写是纸、书写工具和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写字时，人的身体和书写工具以及纸张会发生力的较量。推荐小学生主要适用的书写工具是铅笔。铅笔在特性上需要在粗糙的表面磨碎才可留下痕迹。但是现在的教科书使用的是涂层纸张。这就把纸应该接受的力量转嫁给了身体还在发育中的儿童，给孩子带来过度的负担。可能是因为认为华丽的图形和显色鲜明的印刷才更有价值，所以出版社选择了涂层纸张。然而，这样不仅会让孩子们厌恶写字，也让写字更成为了一种费力的劳动。因此，纸张的材料有必要以更合适的材质来代替。选择纸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一点是它需要能让孩子们整天玩耍也不会感到疲惫。

教科书的纸张要起到笔记本的作用，为书写提供舒适的环境。它不可以返潮，它也需要具有可以用铅笔书写的坚硬度。它还需要不费力气就可以稳定自如地书写，也需要显色鲜明，且与纸张接触的皮肤需要感到柔和，铅笔书写起来不会滑字。它也要确保书写出的字可以在纸上均匀地渗透，铅笔粉末沾在手上也不会脏乱且可以容易用橡皮擦擦掉等等特点。教科书作为阅读的书本，还需要具有有助视觉放松的白色。

第二，国内教科书的“书写教育用字体”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之处。其中一点就是它使用了铅笔以外的书写工具，这与小学生们使用的铅笔没有保持一致。从1987年第5次教育课程开始，教材上的字体都改换成了铅笔以外的工具书写的字体。另一点就是，孩子们在刚开始学习书写就以大人所写的老练的字迹为模板。对于刚刚学会写字的孩子们来说，像这种具有毛笔书法中的强弱与速度的成人字体，更是难上加难。以钢琴的教程来比喻，就是还没有学习拜耳和车尔尼，就开始学习肖邦。我猜想采用这样的字体并非出于科学根据，而只是以大人的视觉来进行的判断，这也是依赖于固有习惯而产生的结果。

所以，有必要开发一个书写教育用韩文字体。它需要

자	유	반	쪽	작	관	창	아
자	유	반	쪽	작	관	창	아
자	유	반	쪽	작	관	창	아
자	유	반	쪽	작	관	창	아
자	유	반	쪽	작	관	창	아

2. 위의 그림에 맞게 이어주는 말을 사용하여 원인과 결과가 드러나도록 문장을 써 보세요.

독서를 열심히 했습니다. 그래서 독서왕 상장을 받았습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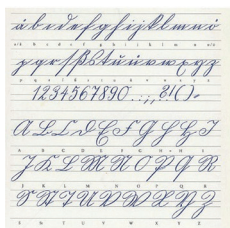
3. 2번에서 쓴 문장을 원인과 결과의 위치를 바꾸어서 문장을 한번 더 써 보세요.

(2번에서 결과가 뒤에 나왔으면 이번에는 결과가 앞에 나오도록 이어주는 말을 사용하여 문장을 완성하세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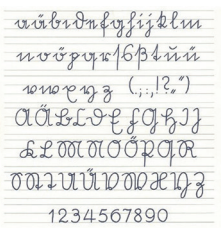
나는 독서왕 상장을 받았습니다. 왜냐하면 독서를 잘했기 때문입니다.

▲ 儿童书写教材字体(上), 小学三年级儿童比较模范的字体实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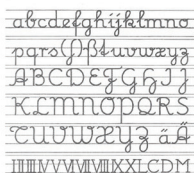
简单、有趣，且可适应儿童的身体发育。德国从20世纪初开始，就意识到了开发儿童用学习书写字体的重要性。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开发一个适合儿童的字体，考虑到了小手具有的不充分的握力以及尚未发达的小肌肉的动作，还考虑到手上下摆动时身体的动作节奏等。



독일식 글씨체 (구판본, 1900년 경)



독일식 글씨체를 단순화한 위발란 학교과장글씨체 (1914년)



위발란 자란식 글씨체

현행 독일 초등학교 교과서에 적용되는 네 종류 글씨체

ABCDEFGHIJKL
MNOPQRST
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1234567890

① 학교과장글씨체, SAS(자스), 1968

ABCDEFGHIJKL
MNOPQRSTU
VWXYZAOÜ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öüß
Querqußdßsch

② 단순화한 과장글씨체, VA(마우어), 1972

ABCDEFGHIJKL
MNOPQRSTU
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③ 라탄식글씨체, LA(렐), 1953

ABCDEFGHIJKLMN
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opqrstuvwxyzß

④ 기초글씨체(Grundschrift), 2011

▲ 这是德国为刚入学的儿童开发的小学教科书字体。
相关研究持续了整个20世纪。

这个研究在小学教育中已得以实现。现在德国小学教科书的正式教本用字相比成人字体来说变得非常的简单，书写字体的水平只局限在中等水平。

观察比较模范且清晰的小学生字体，可以发现初声、中声、终声的音素较大，而形态较为简单。应该通过这种现象来研究适合儿童身体的便利和良好的节奏，开发一个初学者的字体，使得字体可以阶段性地发展为成年人老练的字体。

为孩子们的书写和阅读提供字体的排版空间的环境是教科书和教材。若教材具有好的字体排版和合适的特性，就可以观察孩子们的身体和情绪，并提高其学习能力，也可以让孩子们恢复感性，保护自尊心，这具有教育和社会上的双重意义。并且在孩子们做与字体相关的活动时，会很大程度上减少儿童在有意无意中产生的负面逆反心理。

社会力学家Kim Seungsub表示，一直将成年男性的身体视为标准化人体的思考方式会引发各种问题。当适用的数值都以男性的“标准化身体”作为指标时，女性及非成年人的其他年龄层都在遭受损失。¹也许我们没能记得那些不舒服和受伤害的经验，然而我们的身体却会记住这些未曾认识到过的伤痛。就像小孩子可以感受到身体的不舒服，但是无法认知和表达。这会慢慢地累积成社会的痛苦、愤怒与被侮辱感。

儿童的身体属于社会中弱者的身体。对待这些弱者时，应该摆脱原有的习惯，以一个中立而客观的角度对以男性为标准而形成的“常识”提出异议。我们有必要将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字体及其环境细致地与小学生各个年龄的身体状况相匹配。

如上所述，属于设计领域的字体排印学以公共领域的复制与大量生产为前提，走向了非特定的多数群体。可以说一个领域从一开始就包含了视觉艺术和经营，以及工学的属性。所以对于少数文字以及针对少数者的排版策略，不可避免地会提出成本问题。对此答案的根据就是“多样性”。在许多标准以外的人们也是我们社会的成员。成员的不便会互相连接并最终回归于我们，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只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问题。世界文字需要走向每个成员共存的生态。与资本主义强者之理论相对峙的力量就在于多样性。

多样性虽可用效率来支持，却也可以在效率中存在独立的价值。有时我们需要放弃效率，而以坚定的勇气维护多样性。减轻所有人类及生命的痛苦，这才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放弃和牺牲弱者及少数者的行为，不管其具有多么合理的理由，我们都会称之为“野蛮”。

所有人都该受到尊重，所有人都该以其不同的存在受到尊重。与此同时，世界上所有的文字也应该受到尊重。与文字相匹配的服饰和住宅等空间展开方式及文化

和技术环境也应受到尊重。所有使用文字的人也应受到尊重，不管年龄、性别、地域及身体条件如何，都应受到尊重。

希望使用僧伽罗语文字的人和泰米尔文字的人也可以像使用罗马文字的人一样尽情而快乐地享受文字生活。希望韩文、汉字、西藏文字、阿拉伯文字中固有的运用传统空间的方式，能为新时代的媒体以新的视角、洞察力和解决问题的线索。希望这些方式再次扩展至全世界，给全世界的文字使用者与他们文字生活带来快乐和便利。希望那些年纪大而视力和认知状态都已退化的老年人、对于母语文字刚刚起步的孩子们、对于左撇子以及具有自闭及多种身体症状的人群，在读写文字的时候不会再因为读写困难而遭受痛苦。这就是字体排印学在多样性这一课题中应该完成的使命。

注

- 1 Kim Seungsub,《假如我们的身体是世界：有关奋斗、竞争、颠覆的身躯知识社会史》，东亚，2018。



#学到

多样的观点胜于深厚的知识

创造尊重多样性的教学场景

Lee Bo-ra 高丽大学 教育学系 教授





我在美国读博士时，所有的讨论课程都要求使用英语。对于英语并非母语的我来说，用英语进行讨论实在很辛苦。用母语读起来都难以理解的文章需要我用英语来阅读，还要我理解同学们课堂上使用英语发表的内容，还要用英语表达我的想法。我的最大的困难是同学们说话都非常快，然而在我还没有理解并消化完他们的话，就会有另外的人插进来，使我都顾不上听懂他们的话。所以我在讨论课上发表的情况就变得非常少了。可能因为这些原因，在第一学期结束后，教授们在新生评价会议上评价我为“安静的学生”。而指导教授在给我传达会议内容时也给我意见说：“希望你以后更积极地参与讨论。”

我也立志成为一名“好学生”，所以决心按指导教授的嘱咐从下学期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课程。然而我的情况并没有好转。课程内容难度相当大，我仍然很难跟上同学们的说话速度。所以我向上讨论课最多的教授申请了面谈，并解释了我的状况。“因为我的母语不是英语，所以相比其它同学，理解讨论内容的速度比较慢。”

但是因为我还是想积极参与讨论，所以我会偶尔举手发表我的想法。但如果我所说的内容不是当时讨论的内容，而是之前的话题，即使您认为有些话不对题，也希望您理解。”我向课程教授拜托了以上的内容。面谈后教授也对我的态度产生了改变。在有关一个主题的讨论结束之前，他总会问我：“你是怎么认为的？”，有时还会这样问到韩国的文化：“你也可以说一说韩国的状况。”感觉教授可能是认为这种方式对于其它同学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才会这样提问。当然这种提问方式不仅仅是对我，对我同期的中国同学也经常使用。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这种经验可以增加我在课堂上发表的机会。随着经验的累积，我成了一名“不需要谁的帮助”就可以积极地参与讨论的学生。我还感觉到在我发表讲话时，其它同学是可以认真地听取我发表的内容的。因为教授对于多种文化的重要性具有深刻的理解，所以才能让学生们主动地发表自己的想法，并把这样的参与设定为教育内容的一种。如此一来，几乎要成为边缘人群的学生们反而成了课堂上的核心人物。

在教学场景中，教授者可能成为学生们的标榜，并有

能力把学习氛围引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如果教授者能把这种能力利用到位，不仅对学习者，对教授者本人来说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教授者的职业能力也会得到更大的提高。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在教学场景中学习者们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多种因素，也来讨论一下教授者力所能及的事情。

教授者的刻板印象会限制学习者的能力发挥

在教育学领域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研究，这就是发表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概念的Claude M. Steele和他的同事们进行的研究。¹ 研究员们针对黑人的学习成果与白人的学习成果的差别的这一主题，进行了一个实验。而这个实验是以“黑人之所以学习成果比白人的低，是因为黑人的智力比较低”的刻板印象为前提进行的。这个研究是从1990年代中旬开始按以下方式进行的。先是招募黑人参与者和白人参与者，并将他们任意安排在两种条件下。安排在每个条件下的黑人 and 白人的的人数差不多，然后为他们提供标准的测试题来让他们解答。其中一个条件下，研究者在测试前为参与者提供了“这是

有关评价智力的测试”的带有刻板印象威胁的指示文，而另一个条件下则没有提供带有刻板印象威胁的指示文，只是提示了“这是有关解决问题的课题”。研究结果证明了上述假设是正确的。即具有刻板印象威胁的条件下，黑人相比白人得到了更低的分数，而没有刻板印象威胁的条件下，黑人与白人的分数相差不大。也就是说，不具有刻板印象威胁的条件下的黑人要比带有刻板印象威胁的条件下的黑人得到的分数高。尽管在对此主题进行研究的此后的研究中，研究者们改变了实验方法(改变提示语，运用生理学测定值等)、研究对象、比较层面(使用非人种歧视，而是性别歧视等)后反复做过多次实验，却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到目前为止，对此主题得出的大致结论就是，虽然不能确定刻板印象本身对于执行结果会造成影响，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刻板印象所引起的紧张感对于执行结果确实会造成影响。

这一研究结果让教授者做了自我反省。教授者作为人，也具有刻板印象。他们以自己的经验(或者以自己具有的数据，即可能以一个具有偏差的数据为基础)，对于特殊背景的学生会具有刻板印象。比如“男同学更加积极主动”，“女同学更加细心”，“特殊目的高中的学生成绩更加优秀”

，“非首尔的学生相比首尔的学生学习更加努力”等都是刻板印象的例子。虽然并非所有的刻板印象都与一个人具有的特殊背景(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相关联，但是相当多的刻板印象确实是如此。我们无法评论对于性别、毕业学校、出生地区、年龄、专业、宗教等的刻板印象对错与否。因为人类的思考方式倾向于看重效率，并且如此多的刻板印象在迅速处理多种信息时是非常有用的。然而，如果有些学生因为这些刻板印象而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那么对于教授者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这一点我们实在不敢确信。若因为教授者的刻板印象，无意识地排斥或忽视了特定学生们，这不仅不可取，更会让我们无法达到最重要的学习目标。

教授者的偏见对于教室里教授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互动也会造成影响。在一个小学和中学的教育课程中对教师和研究结果表明，相比女同学，教师们通常给与男同学的发表机会比较多。有关外表的话题(“今天你穿的衣服很漂亮”)通常对于女同学说的比较多，而关于处罚的内容就对男同学说的比较多。² 教授者在与学生们互动的同时，无意间会做出具有偏见的行径。我们有必要批判性地思考一下，女同学们相比男同学更加安静的现

象，是由于性别差异还是由于教师的刻板印象造成的结果呢？这里涉及的研究结果虽然是对于男女的性别差异，这个结果其实也可以扩展至多种层面。对于积极的同学和消极的同学，比较容易接受新知识的同学和对此比较难以接受的同学等都存在个人的差异。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作为教授者是否给了他们同等的机会的这一问题。

教授者大部分在接受提问时都会说自己对待学生是不具有性别偏见的，然而通过调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他们确信自己的所为正是自己所想的表现，所以对自己的所为不能产生准确的认知。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自以为公平的教授者在接受有关刻板印象和偏见的教育后，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录像，并客观地观察自己的行为后，一旦发现自己的行径有所偏向时，这些教授者会积极地改变自己。为了让学习者在课堂上具有平等的机会，教授者需要多做努力，那么教室的氛围会发生变化，教育也肯定會发生变化。

教授者作为一个人，也具有刻板印象，我们无法指责这一点。然而，作为教授者有必要认识到自己的刻板印象，并要时刻提醒自己，让自己意识到刻板印象有时也

会是错误的。教授者需要想到自己的刻板印象可能带来的结果(在课堂上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举动)，并观察自己的行为。也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可能随时会出错，并不断反省自己的思想、言辞与行径。然后在准备下一个课程时仔细考虑需要怎样修改，并付诸行动。无论是谁都不会是完美的。人类具有很多的缺点，想要成为没有缺点的人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努力来减少缺点，这就好比我们可以画出无法成为0但却接近于0的曲线一样。

教学场景中，学习者身边的每个人 都可以成为榜样

成为榜样的教授者

我被聘为新任教员时，学校规定我们需要义务性地接受一次旨在增进新任教员教学能力的微格教学。微格教学是指拍摄15~20分钟自己讲课的场景，然后与教育专业人员一起客观地观察自己的教授方式。我是与和我具有相似经历的教授一起进行的这一活动，我们互相对于对方的教授方式给与了意见，这也对我们个人的教育生

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还有什么比众人观望自己的教学场景更让人羞愧与尴尬的呢？在观看视频后接受的反馈之中，最让我记忆犹新的反馈是，大家说我成了学生们的榜样。我那时有些诧异地问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说这指的是，我在向所有同学提问后，当学生们举手回答时我用非常积极的态度听取了他们所说的内容的这一点。如果学生的位置在教室的后端，我就会走过去，当没有听清楚的时候还会让他们再说一次，并同时与学生们以眼神对视。其实我学习过有关咨询的课程，所以这些技术对我来说完全不算是新的内容。在与人流交流时需要眼神对视，并认真听取，必要时再提出问题，这是我在学习咨询课程时最基本的内容。我本来就喜欢与人交流，所以会尽可能地与人对视，同时用心听取并努力理解。可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就会因此而成为一个榜样？据专家解释，学生们会因为“如此具有影响力的存在(教授者)”居然做出这样的行为而产生“讲话的同学难道在说很重要的话题？教授为何会走向那里？”的感觉，由此会更用心地去听发表的内容。还有一点就是学生们在课堂上与其它同学交流时也会无意识地模仿这样的行动。另外，这也会让学生们体会到被尊重的感觉，

感到“这位教授非常关注学生的想法”。这也会让学生们认为可能自己的想法很重要，进而起到增强学习动力的作用。

如果这些内容是我通过书籍看到的，那么我可能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当观察自己的行为并得到反馈时，我才深刻领悟到，我作为教授，在教室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会对学生产生很大的影响的这一事实。从那以后，我对于每一个行动都保持谨慎的态度(当然我也因此感到很辛苦!)。例如，我会提前去教室准备课程(因为我的学生大多都是师范大学的学生，由此我不得不考虑我的行为对未来教师的影响)，在与学生交流时我开始非常注意自己的语气和言辞。

试想一下学者们通过教学场景会学到什么呢？当然首先会学到多种知识和技巧。比如，在统计学课程中会学到有关统计的知识和使用统计的技巧。在我的咨询相关的课程就会学到有关咨询的多种理论，也会学习该理论在现场是如何得以运用的。大部分的教科书虽然都以传授学科知识为主，但学习者学习的内容并非仅局限于此。学习者们通过教学场景解决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并学会如何自我主导及自我管理。还可以通过与同龄人的

合作，学习如何解决矛盾并与保持适当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学习者可以学习到在以后的生涯中需要具备的重要素养，这属于非教科书知识。教授在设计课程时，可以将这些要素下意识地结合起来并将这些内容融会贯通。比如，如果认为合作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可以布置与合作相关的课题，或者在教授说明概念之后让学生们重新为其他同学说明等等。

然而，教授者比较容易忽视的部分就是自己没有刻意设计进去的内容。学习者在教授设计的课程里可以开发各种知识与技术、态度、力量等，并通过教授者来进行学习。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与同事们通过班杜拉波波玩偶实验(Bobo doll experiment)，表明了人类可以通过观察和模仿来学习。⁵班杜拉波波玩偶实验是针对儿童进行的一场实验。在成人(研究员)给孩子们波波玩偶(一种大型不倒翁，一敲就会倒下，然后会自己再站起来)，并教会他们玩玩偶的方法。当研究员离开而让孩子们自己跟玩偶玩的时候，研究者观察到孩子们会以与研究员对待玩偶的相同的方式来对待玩偶，且成人的性别与儿童的性别相同时，其模仿效果会更明显。这一实验表明，人类会自然地学习与自己相似的人的言语和行动，而他人

与自己的关系越紧密，这种现象则表现得越明显。

按班杜拉理论，学习者会通过观察自己周围的任何人来进行学习。尤其教授者对于学者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对于大部分的学习者而言，教授者作为具有深厚知识并主导课程的人，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虽然并非所有的学习者都想要与教授者接近，但是大部分的学习者都想与教授者保持一种亲近的关系。所以，学习者会通过观察教授者的行径，无意识中模仿教授者，并把教授者作为模范标准。对于教授者而言，正确的言语和行径本身就是为学习者们提供的最好的学习经验。

书籍和示例中的人物

并非眼前所见的人物才可作为榜样，书籍中的人物对读者也可以充分产生影响。让我们来看一下“Lessons in Herstory”这个手机应用程序。它是在“美国历史书籍中出现的女性只有11%”的问题意识下制作而成的。如果用装载此程序的智能手机拍摄历史书籍中的男性人物，该应用会给人们展示同时代具有影响力的女性。教育界在此之前就存在类似的问题意识。

教科书上的人物因为大部分为男性，所以会降低女同学的学习动力，影响她们的职业发展动机。尤其是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的缩写，是涵盖理工系领域的用语)领域对此也有过很多讨论和研究。⁴ 现在正阅读这本书的读者也请回想一下，在中学和高中的科学课堂上听到过多少个女性的名字。虽然现在的学生不知道会不会与我们那时一样，但和我的学龄相差不多的人应该除了居里夫人(Marie Curie)或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以外，在学生时期几乎找不到其他的女性模范。这是因为我们学生时期教科书里的科学家大部分都是男性。

在韩国也有过关于分析教科书中人物的研究。研究主要针对于教科书插图人物的性别和图像的作用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科学教科书和数学教科书里的人物中的男性要远远多于女性。⁵ 道德与国语教科书中的男性也比女性多。男性主要通过有关室外活动的形象而出现，而女性形象更多地表现了家庭活动上。⁶ 最近随着跨国婚姻家庭的增加，也出现了以多元文化的角度分析插图的研究。但是，具有多文化背景的人物和残疾人的出现频率依然是非常低的。⁷ 虽然不能确定教科书的插图与学生的人生之间会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根据班杜拉的说

法，这应该会有一定的影响力。学生们会因为教科书里从不具有与自己特征相似的有名人士，而对自己未来是否会有作为而感到疑惑。极具肯定意义的现实是通过这些分析结果，教科书在不断发生变化，虽然它的变化速度比较慢。

虽然这个示例是针对小学和中学教育课程所做的研究，但这也同样适用于大学教育。如果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去审核教科书里的人物和课堂上作为视觉与听觉资料的人物都有哪些，我们恐怕会大吃一惊。我讲课时往往在演示文稿中引用插图，而当我发现我所引用过的插图大部分是白人的时候，我不禁对此感到惊讶。在讲述与家庭相关内容的时候，我也大部分引用了表现传统家庭概念的图像(父母与一两个子女组成的家庭)。然而由于最近家庭形态也变得多样化(单亲家庭或祖孙家庭等)，传统的插图可能会在无意识中传达有些同学的家庭就不是“正常的家庭”的信息。在讲述有关职业辅导的课程时，对于咨询相关示例中出现的人物背景也需要再三考虑。因为这些有可能会让人觉得具有特定性别或背景的人才具有职业前景。对于课堂上或试题中出现的人物，我也会尽量以多样化的形式使用韩国人名字(金博士)以及各种外国人的

名字(Gonzalez博士或王博士等)。我相信通过这样的过程，学生们对多种文化圈人物的接受度也会自然地有所提升。

与不同的人的思想交流可以提高学习效果

创建一个尊重多样性的课堂最终意味着创建一个可以交流不同想法和意见的环境。高等教育机关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探求真理，只有拥有不同的意见互相交流才会比较有益于探求真理。⁸ 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观察到，每一个重要的理论出现的过程都离不开对于原有理论的怀疑与反驳。如果持有反对意见的人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或其思想不被人接受，那么学问的发展程度恐怕要远远落后于现在。高等教育机关若不想成为探求真理的绊脚石，最起码要让所有的成员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可以自由地发表各种意见。这要从学生们尊重各种价值观和不同的思想开始。在授课时可以让学生们充分交流各种思想的方法有很多，下面就来说一下其中的几种方法。

善用提问

作为教授者，可能都希望学生们可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交流自己的想法。然而，当教授者在课堂上提问时，学生们保持沉默的情况甚多。学生们难道是没有想法吗？我认为并非如此。一个进入大学的成年人肯定会具有自己的想法。虽然并非所有的学生如此，但一部分学生肯定对提问具有自己的见解。那么作为教授者，就需要引导这些学生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就需要给学生们打造一个课堂上言论自由的氛围，在学期初打造这一氛围尤为关键。

在学期初期，提出的问题最好是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学生们对于一个具有正确答案的问题，会非常小心谨慎地作答，他们会担心自己的答案是错误的。其实即使错了，也没什么关系。然而在教育场景中，学习者都希望自己表现得优秀，所以一旦认为自己的答案有可能是错误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轻易回答。当然，如果教室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可以互相信赖的关系，学生们即使认为自己的答案会错，也会自信地表达想法。但是因为学期初期学生们互相都比较生疏，为了先形成一个信

赖关系，教授者所提的问题最好不要是有正确的答案的问题。如果由于教学特点，只能提出有答案的问题，那么比起只有一个答案的问题，提出具有多种答案的问题会更为有效。如果学生感到回答问题并不会对自己造成什么影响，就会更加勇于承担风险。这样的氛围一旦形成，教室里就会充满各种各样且富有创意性的想法。

在与学生互动时，最好是善于利用开放式的问题(open question)。比如“为什么”，“怎样”，“把(以)什么”，“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等提问可以给出学习者较大的自由回答的范围。相反，对于封闭式的提问(closed question)是指对于“是或不是”的提问，它具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像“这种方法是比较有效果的吗？”，“XYZ理论是不可取的，对吧？”等属于这类问题。更重要的是问题要符合状况和脉络。如果初期开始提出很多的封闭式问题，学生们对答案的回答范围会受到限制，他们会因需要说出正确答案感到压力而想要回避答题。这最终会阻碍打造一个自由答题的氛围，使得难以引导学生们发表各种想法。

如果教授者认为自己更善于提出封闭式的问题，则教

授者需要反省一下自己是否具有较多的刻板印象或偏见。如果与学生交流时的提问类似于“大家毕业后会结婚吧？”，“当~的时候，会感到很生气吧？”，“男同学是不会理解的吧？”等，那么就需要想一想自己是否具有“毕业后就需要结婚”或“因为我是女性，所以男同学不会理解我的想法”等刻板印象或偏见。如果只是因为比较关心对方的想法，那么就需要提出类似“大家毕业后打算做什么？”的问题，而不要自己决定对方的感受，而且需要给与对方倾诉的权利。反复这样的过程，才能形成一个学生们坦然而自由地说出自己想法和感受的氛围。

回应学生们的作答

为了塑造一个自由言论的氛围，不仅需要提出好的问题，对学生的回答也要做出回应。这不是要我们肯定所有的答案。对于在教育角度是不恰当或违背教育方向的答案，我们有必要给与更正。但基本的前提是给提出建议的学生一种强化(reinforcing)意识。比如，对于教授的提问，如果某学生做了回答，那么重要的是需要以“这位

同学是这样认为的哦”；“你的想法很特殊，不同于目前为止所提出的建议”；“这是个很新颖的角度”等方式给予鼓励。这种回应不关注答案的正确与否，而是让学生感到参与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举动，这可以让学生更加主动地参与讨论。同时，也会让看到这个场景的其他同学产生想要对问题表达另一个角度的想法。

教授者对学生的提问所做出的反应也尤为重要。学期初期虽然大家对于提问都会感到有些犹豫，但也有鼓起勇气提问的学生。如何回应第一个提问的学生会直接影响到教室的氛围。这与提问的种类没有关系。对于一个非常单纯的提问最好也给与鼓励和强化。对于“老师，上次您说过的作业的提交期限是什么时候？”的问题，如果以“上次说过了，没有认真听讲吗？”回答，就是一种指责(blaming)学生的回应方式。在这样的回答中可以感受到教授者的不耐烦。教授者可能会以为学生们不知道，然而学生们对于教授者的情绪都会一一看在眼里。听到这样的回答后，学生们从下次开始就不会再提出问题了，因为他们不想自己变得尴尬，也不想扰乱教授者的情绪。这时候倒不如这样回应学生的提问：“可能对日期有点混淆了是吧，期限是到12月7日，你也可以参考一下课

程计划书。”如果想要进一步鼓励，就以“其他同学可能也对日期有点混淆，谢谢你代表同学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回应，这样可以给予学习者前进的动力。

增加与同龄人互动的机会

利用讨论的授课方法并非是一个新颖的授课方法，然而塑造一个尊重各种意见的氛围却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好的教授方法。在主要由教授来主导的课堂上，不管以什么样的提问方式来引导学生表达意见，都会有局限性。从这个层面上考虑，多做讨论，会使学生互相交流自己的想法，从而扩大自然地学习多种观点的机会。

高等教育中的教养相关课程可以提供学生们一个很好的听取同龄人的想法的机会。学生们会学习到不同专业的学生在讨论一个特定主题时视角的不同。如果在课堂上只听取教授者的讲课而不能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可能学生们会学到很多新的知识，然而却很难学会从不同视角看待问题的方法。只要在课堂上利用10~15分钟，让学生们与同桌互相交流，他们就有机会接触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的方式。教授者们可以充分考虑这一层面来准备课程。

还有一种方法是对于按小组执行课题的情况，为每个小组安排具有多样性背景的成员也是有效的。也许根据课题及课程的特性，有时需要相似的人们构成一个小组。但如果是一个需要提出创新想法的课题，不妨适用一下不同成员组合成小组的方式。当然这也有风险。成员不同，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做出决定，学生之间可能也会产生矛盾。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学习。社会本身具有的性质各不相同。在毕业后进入社会，就会与各种不同的人打交道，这不会因个人的意志而改变。既然如此，何不在学校里提前练习一下？当学生们跟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学生交流时可能会很郁闷，可能感受挫折也可能与其成为朋友，也可以同时学会如何解决矛盾，这些对学生来说都是一种教育。为了让这样的经验成为有意义的教育，需要注意一点。按小组进行的课题，如果仅评价其“结果”，就可能忽视“过程中”可以学到的东西，所以，要尽量在评价中反映结果的同时反映过程。虽然可以把各个组员对结果的贡献度作为一种指标，但最好是按互动程度和对他人意见的尊重程度以及采纳程度等等来评价面对课题的态度。这需要更加系统地准备和设计课程。

教授者为尊重多样性所做的努力

教授者的刻板印象或偏见在授课内容、授课方法、教授者的态度等方面都得以体现。为了将可能对学习者造成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并在课堂上塑造尊重多样性的氛围，教授者需要不断地自我反思。因为任何变化都来自于自我意识，如果连自我意识都没有，那就更不用期待会有什么改变。那么，我们该如何检验自己呢？

认识到言辞中可能带有的歧视意味

所谓语言，就是把原本抽象而复杂的概念，以一两个词句来表达成容易沟通的言语。例如，几年前新出现的“暧昧(曖昧)”一词，说明了既非情侣，又非朋友的暧昧关系。如此看来，语言即是人类思想的表现。然而，因为语言具有的作用，语言反而对人类的思想也会造成影响。虽然最近不再使用针对残疾人的“正常人”一词，但仅在20年前，这一词语都被使用得非常广泛。大部分人可能对使用这一词语没有过多的考虑，然而这种词语对于某些特定的人来说就是歧视性语言。因为针对残疾人的“正常人”之词，反过来即可意为残疾人就

是非正常人，所以在舆论的批判下，人们消除了这一词语，而以针对没有残疾的人使用“非残疾人”这一词来代替。

在我们的日常话语和文字中也有很多暗示性的语句。比方说，我在课堂上讲述子女受父母的影响和基因相关的问题时，会说到“因为子女在基因方面与父母具有很多相似点……”这样的话。如果读者可以在这个句子中发现问题，那么说明你对多样性的理解度非常高。这个语句中的暗示语是“子女”即生物学概念上而言的子女。然而，父母关系并非一定建立在生物学上的关系。比如，领养或与具有子女的人结婚时，即使没有生物学上的关系，父母关系也会一样成立。随着家庭的形态，这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生长在这样环境中的人也比之前增多了许多。所以在说明父母与子女的遗传相似性时，需要特别地指出是“生物学上的子女(biological children)”。另外，还有“非婚”一词。它与“未婚”一词相比较时，都具有“还没有结婚”之意，然而未婚一词还具有必须结婚的寓意，所以才以“非婚”来代替这一词。可以说这些变化都来自于对日常用语中所蕴含的歧视性词语的批判与深思。

在撰写社会科学领域论文时，我们一般使用美国心理学会 APA(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格式。继第六版APA格式而出现的第七版APA格式也建议作者们使用偏见最小化语言(bias-free language)。这个指南针对年龄、残疾与否、性别特性、人种、民族特性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等从多个角度说明了语言中隐含的歧视。例如，对于年纪比较大的人，会建议使用“年纪较大的成年人(older adults)”一词，以代替“年老的人(elderly)”或“老人(seniors)”一词。对于亚洲人，就建议使用“亚洲人(Asians)”这样的中性词语，而不使用“东方人(Orientals)”等具有歧视意味的词语，以此遏制历史上对于特定群体的贬低或不正确的表达。⁹ APA格式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以英语写作时使用的指南，可能不会完全符合韩国的用法，但他们的努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接受来自学者、专家和自己的反馈

专家们建议教授者积极开发具有接受性的提问，并建议教授者直接从学习者处得到反馈。这正如作为产品和服务的销售者要通过咨询消费者的意见来改善产品和服务一样，作为教育者最好去咨询教育的最终受惠者，即学生。写授课日记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每当一个课程结束后，做一下反思，想一想今天课程上是否有谁被冷落过，使用的课程资料是否尽量包含了多样性的示例等，这样的记录会有助于准备下一个课程。当然，一两天的时间可能不会解决所有问题，不过反思并审视自己授课方法的人和并非如此的人是有天壤之别的。

最起码我们要努力在准备课程时，让听自己讲课的所有成员都能参与教学课程。目前大部分的大学机关都设有教授者学习开发院(各个学校的名称可能各不相同)。这里有很多专家专门针对教授者的学习方法做研究，所以在这里可以咨询到很多与授课相关的问题。这里有课程设计、课程计划案的制作、课程中运用的各种技术等内容，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学习多方面的知识。像“养成对多样性敏感的方法”或“尊重多样性的成员的课程”

这样以“多样性”为主题的教研会当然是越多越好。然而，每个教授者所处的学校环境各不相同。所以不需要以“对于多样性的教授学习方法”等来明确地定义主题，只要在学习多样性的授课方法的同时，认真思考并探索授课时教授“多样性”的方法，那么肯定我们的教育就会有所改善。

此外，还可以通过同事或网课资料来学习教授方法。也可以通过和同事偶尔的见面，以多样性的角度一起探讨教授的事例和经验。网络上也有很多关于教授方法的资料，通过查询后自学也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即使不是关于教授方法的内容，也可以在听取比较感兴趣的课程的同时，以批判的态度来观察授课人所说的话与行径是否违背了多样性的观点。只要教授者有强烈的意志来学习授课方法，那么可以学到方法的途径是很多的。只有不断地学习，才有机会反思自己。自我反思的机会一旦变少，尊重多样性的教学方法也就成了无稽之谈。

最后，教授作为一个人，也需要与具有不同特性的人们不断接触与交流。如果没有太多机会可以直接交流，那就通过间接经验(通过书籍或其它方式)来努力理解具有多样性的人。人们与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时会产生安全感，

所以人们可能更倾向于与自己类似的人接触。这本身并不是错误的或不好的。然而，人们会因为只接触特定的人群，而忽略了社会上存在的多样的人群。所以要开发一个属于自己的方法，不断地听取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们的心声，努力关注并理解他们。作为一名教授，这样一来可以得到学习如何尊重多样性的机会。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也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的理解能力而得到自我开发的机会。教授者自身成为一个进步向上的普通人的这一事实，才是对学习者们最好的教育。

- 1 Steele, C. M. & Aronson, J. "Stereotype threat and the intellectual test performance of African-America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 797-811. 1995.
- 2 Koch, J. "Gender issues in the classroom". In W. M. Reynolds & G. E. Miller(Eds.), *Handbook of Psycholog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Vol. 7(pp. 259-281).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03.
- 3 Bandura, A., Ross, D. & Ross, S. A. "Transmission of aggression through imitation of aggressive models".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3), 575-582. 1961.
- 4 Good, J. J., Woodzicka, J. A. & Wingfield, L. C. "The effects of gender stereotypic and counter-stereotypic textbook images on science performance".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50(2), 132-147. 2010.
- 5 No Taehee, Kim Soyeon, Cha Jungho,《从性别角色固定观念层面分析的第七次教育课程之中等科学教科书的插图》、《韩国科学教育学会志》,24(6),1181-1188,2004。
- 6 Jung Jinri ,《中学道德教科书中对于女性代表性的纵向分析: 从第三次教育课程至2015年修订教育课程》,《道德伦理科教育研究》, 64 , 241-270 , 2019。
- 7 Yeom Bora·An Sungho,《现行<英语 I >对于教科书中蕴含的家庭文化的分析: 以多元化主义观点看待》、《多文化教育研究》,3(2)、71-96、2010; Yoon Moonjung·Seung Yoonhee,《随着教育课程的变迁, 从小学音乐教科书的构成体系及教育模式变化层面对于人物插图的比较分析》、《艺术教育研究》,11-63、43-63。
- 8 Stewart, A. & Valian, V. *Inclusive academy: Achieving diversity and excellence*. MA: MIT Press. 2018.
- 9 <https://apastyle.apa.org/style-grammar-guidelines/bias-free-language>

韩国教育学中多样化的双重含义

Jeon Dae-won 城南女子高中 教师





“多样性”在教育方面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所以不会有太多的人反对实施多样性教育。“多样”一词是在积极意义上而言的词语，而其反义词可以是“整体化一”一词。目前在教育领域可能没有人会赞成整体化一的教育方法，然而教育学上对于多样化的含义却并非如此简单。如果人们把多样性理解为具有歧视性的或复杂的词语，那么这一词可能就会在社会上被接受为具有消极意义上的单词了。

人们常把现行的学生综合招考制度(高考制度，对于综合能力的考核重于应试能力的制度)制度讽刺为是“暗黑招考”。这就是人们把多样性接受为复杂性的结果。如果按从前以录取分数为标准的视角来看待现行入学制度的话，我们就一定会感受到各种考核制度的复杂之处，从而变得难以理解这样的制度。这种复杂性使人们感到不安，因为人们会因此认为获取考题信息的能力会直接影响考分。

多样性在教育领域固然非常重要，而且是必须的，然而现实性的问题导致了人们对此持有的否定的态度。人们对于目前状况的不满或怀疑，与其说这是教育学上存

在的问题，不如说这是正好反映了社会矛盾的结果。

作为在任教师，我在此想要重新审视21世纪教育学中渐渐深化的多样性，以及我们对其持有的否定性的视线及其造成的反向作用或倒退作用。我也将结合个人的经验来探索今后韩国教育学该如何维系多样性的价值的这一主题。

2002年第七次教育课程的开始

我首次进入教职是在进入世界杯四强的2002年。当时，我们为了进入公立学校，必须通过国家举办的公开竞争的聘用考核。那时网课没有像现在一样全面普及，当时所有准备应试的人都会去鹭梁津学院一条街听教育专业讲座。有几百名的学生为了应试准备都挤在一个鸡笼一般的教室里听讲。那时在这一狭小的空间里蔓延着传统的考试文化，通过教师讲课和学生认真做笔记的方式塑造了一名又一名的未来教师。虽然那里是为选拔21世纪的教师而准备考试的地方，但20世纪的整齐划一性仍然形成了教师聘用文化的主流。

当时IMF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未完全消散，我们刚脱离20世纪也还没有多久。正准备着新总统的选举和世界所

有人的庆典的时候，高中实施了第7次教育课程制度。聘用考试也自然也包括了第7次教育课程的内容，强调了构成主义教育观和自主学习，以及选择型教育课程等内容。这样一来，事实上准备应考的教室氛围和新教育课程的内容是完全不相符的。

万幸的是我通过了考试，并从第二年3月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2001年金大中政府发表的“7·20教育条件改善计划”对我的教学生涯起到了帮助。在众多内容中对我产生最积极影响的一项就是，这个计划规定将每个班级的学生人数控制在35名以下。记得在我上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学校实施的是2部制授课方式。那时教室里有60多名学生挤在一起听讲，而今终于等到了变化。在变化的形势下，大规模的教师得以聘用，而当时的应试生到现在还会偶尔谈起那时的幸运。

而更大的变化却在于第7次教育课程的变化。通过第7次教育课程，高中引进了选择中心教育课程，并在二年级和三年级得以实施。当时像这样的选择课程还被认为是西欧发达国家的专有制度。由于教师们都还笼罩在过去教育理念的阴影下，所以不知道该如何运营选择课程，所以教师们对此提出了反对。将每个班级的人员减

少到35名以下的制度与高中引进的第7次教育课程不无关联。因为随着高中引进选择课程，移动课程将会大幅度增加。

在我讨论有关教育领域的多样性时，之所以提及第7次教育课程的时期，是因为高中课程正是从这个时期正式实施多样性教育的。

以下表格是第七次教育课程总论中摘录并整理出的社会学科的部分。之所以特别以社会课为例，是因为从社会学科的资料中可看出课程种类的急剧增加，这也可以反映出选择性教育课程制度的引进。地理教科中新设了“经济地理”科目，而普通社会学科中将“法律和社会”、历史学科中将“韩国近现代史”设成了新选修科目。

第6次教育课程制度中虽然也有部分第2外语等科目可以选择，但正式引进科目多样化和学生选修制度是从第7次教育课程开始的。因为在此之前有过的选择大部分是学校所做出的，而从那时起则改为学生自己做主的选择科目。

高中社会学科选择中心教育课程

区分	国民共同 基本教科	选择科目	
		一般选择科目	深化选择科目
道德 社会	道德(2),社 会(10),韩国 史(4)	市民伦理(4) , 人类社会和 环境(4)	伦理和思想(4),传统伦理(4), 韩国地理 (8), 世界地理(8), 经济地理(6), 韩国近现代史(8), 世界历史(8), 法与社会 (6), 政治(8), 经济(6), 社会文化(8)

选择性教育课程所带来的变化

随着选择性教育课程的正式引进，高中发生了各种变化。最大的变化出现在班级的分配上。之前高中是在1年级进入2年级时分文科班和理科班。分文理后就和之前一样按分数分班即可。如果有十个班级，第一名就分配到一班，第二名分配到第二班，第十名分配到十班，然后重新按反方向将十一名分配到十班，这种方式就是原来的班级分配方式。

而现在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学生的移动，需要将选修科目相似的学生分配到同一个班级。这样也就无法再按原来以成绩分班的方式了。尽量以选修课为标准分班，如果同一班里仍有不同的选修群，就把两个班或三个班绑在一起移动。这不同于过去上学后只在一个教室听课的方式，学校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

比起这些表面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变化。在学校官僚制社会使用过定量性班主任评价的学级评价会变得有名无实。老一辈应该记得班主任们会尤其重视班级的平均成绩。在无法使用定量评价的教学领域，班级成绩会转为官僚组织的压迫手段。班级成绩最差的班

主任被叫到校长室的这一现象，就是这些文化的产物。

然而，如今班级成绩已经无法成为学校管理者们压迫班主任的手段。出发点不同，就无法比较各个班级的成绩，按选修课分班就使这种机制失去了作用。偶尔也会有认识不到这一新教育课程的管理者想要按分数给班级排序的情况，然而因为没有特定的标准而没能得以实施。由此，校内整齐划一的评价指标就此消除了。

教育课程的变化给大学入学考试也带来了变化。1994年首次引入并实施的大学入学能力考试(高考制度)是随着教育课程的变迁而发生的制度性的变化。不过这一制度基本上维持了以总分发表成绩的方式，只是出题形式有所不同。这一制度仅从成绩计算方式来看，与原来的学历考试制度没有太大区别。340分为满分，这是按各个大学的学科分数线定为总分的方式。这样一来，这一制度就与原来的考试方式十分相似。

在第7次教育课程制度改革后，考试方式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后就无法按原来的方式将全国学生按名次从第一名排列至最后一名。因为每个学生所学的科目不同，所以无法实施整齐划一的考试。选择了某一科目，就不得不将选修课也作为高考的应试科目。

因为在2002年起，从高中一年级开始依次适用了第7次教育课程制度。在学生进入高三，并在2004年考取2005年进入大学的高考时就没有再使用公开成绩的方了，而是以百分位的标准分数或等级来代替了高考分数。从这时起，选修课的有利与否就成为直接影响考生成绩的因素。

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科目，那么每个选修课里就会自然地存在各种考生。这种对于学生的相对评价，从统计上看，可以期待各个科目的考生能力接近于平均水平。这就假设了一种定义，就是选择科学探索中的物理学科的学生与选择生物学科的学生之间是没有能力差距的。

问题是，制度虽以多样性为前提，却因人们追求整齐划一的价值，而使多样性原本追求的价值遭到了破坏，并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不管想要考入哪个大学，只要是期望考入经济学的学生，人们可能都会觉得学生选择社会探求领域中的经济科目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最近连希望考入经济学科的学生也都会因为怕受到等级制的影响，而选择其他科目考试，然后在高考时志愿经济学系。这正反映了制度的多样性没能够体现选择的多样性的这一点。可能人们会认为这是教育制度或考试制度

设计上存在的问题，然而从本质上讲这应该是学生们过分考虑大学录取与否的利害所带来的弊端。

另一方面，学生的问题应对能力引发了新的问题。随着学生平均分数的提高，为了辨别学生实力，出现了许多高难度的问题。而这就让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来提高解决问题能力的学生们很难得到高分。

在实施学历考试制度时期开始，就有很多人主张入学考试应该以题库系统的方式出题。这是为了仅对学历评价做基本测试，而不过于计较分数。而这个主张比较难以推进是因为韩国的制度体系的局限性。韩国是一个比较适合实施全国统一考试的国家。韩国不像美国具有广阔的领土，并且韩国只有一个标准时间，而这些都为实施一个标准化的考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朝鲜时代的科举制度这一传统文化也为人们深入理解标准化的考试提供了基础。

不需要反复地让学生参与题库系统类型的考试，以一次性考试来决定胜负是更有效率的。在高考初期为了给学生多次机会，国家在同一年度实施过两次考试，而没过多久国家就废除了这一制度。因为很难平衡不同时期的考试难易度，而且管理考试上面也存在很多的问题。

事实上，题库系统类型的出题比较难是因为韩国存在可以与世界水平相媲美的私人教育。为考入大学而设立的专门性的私人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题库系统类型题目的难度。题库系统类型的出题对于接受过专门培训的学生来说，根本无法成为准确辨别学生实力的方式。因为在这种机构受过专门培训的学生成绩得以提高，全是适应了这种出题方式，掌握了出题思路而产生的结果。实际上在美国实施的各种资格考试中，有更多的韩国人取得优异的成绩，也可以推测这是韩国人适应题库系统类型考试的结果。

教育监管直选制度所带来的教育行政上的变化

对于教育的多样化和考试问题，暂时放在结尾再重新审视。现在让我们先一起来探讨一下学校的官僚文化和多样性的问题。官僚制度通常被认为是与多样性相背离的组织系统。官僚制可以理解为是适合小品种大量生产时代的组织。从韩国现代史上看，官僚制在1960年代高速增长的时候，为动员全国民迈向目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教育制度和行政方面也是大同小异。以电影《马粥

街残酷史》为代表的整齐划一的教育文化也与这种社会氛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该电影在2004年上映，描述了1970年代高中的样子。这时正好是第7次教育课程制度全面化实施时期。从文化角度上看，电影上映当时正是人们已经摒弃了整齐划一的教育方式并认同现有制度的时期，所以才会出现如此批判20世纪学校文化的电影。

尽管如此，学校的官僚制还是变化得十分缓慢。虽然教育目前更加重视学生的选择，高考也产生了一定变化，但是教职社会结构仍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很难维持教育中所带来的变化。众多原因中，最具影响力的理由应该是升职体系与领导能力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这一点也开始逐渐滑坡。曾经，根据地方自治制度，各广域自治团体也在实施教育自治。虽然各市、道的教育厅要求自行进行教育行政，但是因为中央政府的影响力，以及教育监选举为间接选举制的原因，所以这一点很难产生变化。学校运营委员等人参与的间接选举制不得不受到各个市、道教育厅的官僚制的严重影响，舆论也批判了被政治化的地方教育界派系轮流担任教育监的这一现象。

然而，教育监的直选制对此现象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有一部分人对于教育监提出了否定意见，称这将导致教育从属于政治，然而不可否认教育界内部权利系统的崩溃为教育界的变化带来了非常积极的意义。

从多样性的层面上看，最重要的应该是教育监构成的多样的变化。媒体也在关注各地区出现的有所进步的教育监。如果非政治观点上的进步势力是现实中存在的，那么教育领域也应该存在相同比例的进步势力。教育作为社会变化的基础，有义务实现社会所向往的目标的变化。虽然教育具有独立性，但它是社会的一部分，更是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产物。

2009年5月，在京畿道民主化全国教授协议会主席出身的金尚坤教授当选为教育监。这给教育官僚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因为负责一线的教育行政原本是保守色彩非常强烈的领域，而这一选举正预示了教育界将发生巨大变化。

其实当时的政治形势比较不合拍，因为当时正好是进步党派维系10年的执政后，国家改由保守势力李明博政府执政的时期。1997年首次从执政党转为野党执政时，教育领域上并没有特别地推进进步性质的议题。

虽然金大中执政时期，将全国教职员工会合法化，但当时并未出现类似于对北政策中阳光政策的差别化教育政策。

前面提及的“7·20教育条件改善计划”虽然在当时引发了各种政治争议，但从内容本身来看，其政治立场很难出现差异。因为对于将每个班级的学生减少到35名的这一决定来说，不会有什么政治理念上的对立。争论的焦点充其量也不过是推进方式与速度的快慢，但从教育的本质来看，这些都是次要的。

从某种角度看，之前教育政策的实施是以金泳三政府时期在1995年出台的“5·31教育改革案”为基础的。在此之后，政府也几乎延续了这一方式。全国教职员工会等组织曾指责说这是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案。然而，此后的政府也没有摆脱这种指责，教育的发展趋势也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很难说这些是从教育理念而言的深刻的变化，大部分只不过是对于政策和技术的变化。

然而，进步教育监管的诞生却是一个飞跃性的改革。通过制定学生人权条例等规定，国家全面实施了发型自由化、禁止了体罚，并强制废除了晚自习等变化，由此

学生的生活充分得以实现自由化。10年前在教学上蔓延的难以想象的体罚，现在已不复存在。当时高中生们都是每天早上一早上学，直到晚上十点多才回家。

这种千篇一律的学校文化就在实施教育监直选制后开始走向崩溃。教育的多样化从高考制度及教育课程逐渐开始扩展到学校文化。强制性的晚自习阻碍了学生们多样化的学习经验，而发型的管制阻碍了学生们生活的多样化，而体罚正是强迫执行这些措施的作用机制。这一切变化都来源于教育监直选制，这些变化在之前的选拔官僚型教育监的间接选举制的体系中也是绝对不会出现的现象。

教育监直选制给教育官僚社会也带来了多样化。这就意味着教师晋升有了新的途径，而之前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从校监晋升至校长的过程，需要经过担任几年班主任、几年部长，获得研究分数，再从困难地区的教职经验获得分数后，通过定量和成绩的考核来选拔晋升对象的方式。这是官僚制社会的典型方式之一，这一结构在选拔具有创意性和灵活性的人的层面上具有根本的局限性。

另一种途径是通过教育学监晋升。像聘用考试一样，

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来选拔学监。不同于聘用考试的是，考试制度对于验证高层次上的能力是非常不适合的。在一线选拔负责教育的教师时，可能需要测定一定的知识性，但对于选拔一个有能力规划整体教育和引领学校宗旨的人，考试这种方式可能会更加加重人才聘用的整齐划一的问题。

现在连校长任职都会通过公开招聘，对校监也开始做声誉调查，也会通过面试等方式来进行选拔。这可能对于长期准备通过以往渠道晋升的人来说是一件需要与他人分蛋糕的事，所以也有一些人对此感到不满。然而，新型人才将会列入晋升渠道的这一点，依然是很有意义的事。

从我个人经验来看，深感目前列入晋升的人群都比较倾向于一个方向。因为我认为在某一地位应该是由多种人才在任的，而不应该是由大部分的奉命惟谨的官僚人士所占有的。虽然在某种角度上说，社会也需要官僚制度来稳定其体制，但官僚制度也肯定会带来工作上的老套与僵化。

有些人认为这些变化是破坏教职社会稳定性的行为，所以也出现过激烈的抵抗。这些对抗甚至与政治党派相

结合，引起过很大的对立。保守党派与进步教育监的共存也加剧了这一现象。

目前在教育界引起争议的对校长的内部公开招聘就是这种对立意义上的延长。这是对于没有积累晋分数分的普通教师被任命为校长的系统的反对。韩国教总等保守教育界对这一情况表示强烈反对，并将此命名为“无资格校长”，而支持内部公开招聘制度的人则表示这是对教育官员在多种意义上的补充。

高中的多样化

保守教育界之所以被多样化理论所强力推进，是因为高中多样化政策而造成的。关于小学和中学教育的多样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承认的争议一直存在。如果这一点与理念差异相联系，则会扩大争论并激化对立。李明博执政时期，历任教育科学技术部部长的Lee Juho撰写的《超越平均化走向多样化》一书，其题目颇具意义。题目中体现了平均化与多样化的对立，并正式地公开反对了平均化政策。

经过多番坎坷，韩国的高中平均化政策目前已在很大

程度上被打破了。所以初三学生为选择多样化的学校可谓煞费苦心。不仅有像外国语高中、国际高中、英才高中、科学高中等具有特性化教育课程的高中，还有自律型私立高中(自立高)可供选择。

强烈反对这种多样化的论据是高中是否真的形成了多样化的这一点。之前有一段时间，外国语高中因培养出很多进入医科大学的学生，而成为了批判的对象。因为作为外国语高中，应该符合其具有的特殊性目的，即符合其培养外语人才的目的，但是这样一来就成为区分学校优劣的指标，对于特殊的目的，也就不存在任何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私立高中在教育课程多样化方面就会很难避免受到指责。某高中还被讥讽成医科大学的士官学校。有时这种嘲讽反而会起到宣传效果。因为对于想要考入医科大学的自然系学生，这样的高中就会是一个必经之路。

高中多样化开始的政策之所以遭到强烈抵抗，反而是由于无法保障多样性的社会结构而造成的。外国语高中曾风靡一时，为了跨入外国语高中而需要支出不堪重负的课外辅导费成为社会问题也是出于这种原因。这一问

题的焦点在于学生选择高中不是因为具有外国语才华，而只是基于在高考中有利与否。人们已经意识到进入外国语高中不是出于对外国语的喜爱。这与前面提到的高考中实施选修课体制而产生的副作用一脉相承。在社会结构限制多样性的情况下，以教育的积极作用为前提而开始的多样化措施会导致其陷入整齐划一的陷阱，重蹈恶性循环。

其中有些结果是因为教育本身不能以教育得到评价的机制而造成的。特殊目的高中就由此成为考生获得优异成果的殿堂，这就让教育的目的更偏向于选拔学生，而失去了教育原本的目的。适用一个指标来区分学校的优劣本身是有悖于多样性的。特殊目的高中因为过于集中于虚荣效应(snob effect)和选拔效果而导致未能实现其市场价值，更没有达成教育原本的目的。它们只是把高考成绩当成了自我发展的存在意义。

这种现象在某种层面上讲是毁坏了多样化的目标的。原以培养外国语人才为目标的学校，为达到特殊教育目标而设立的自律型私立学校是有必要存在的，而各种副作用却使这种目的失去了意义。在多样化的层面上新引进的高中体制是自律型国立学校。如果自律型高中只针

对于私立学校，而不存在于国立学校，那么它将成为一种社会上的逆向歧视，所以国立学校也相继引进了这一体制。

而从选拔效果上看是非常成功的。可以以内部公开招聘的形式聘请优秀的校长，并聘用周围的优秀教师。在国立学校也可以通过校长的推荐来聘请优秀的教师，而不以一般的人事系统调任。这就是聘任教师制度。与普通高中相比，自律型国立高中能聘请更多的教师。

这其中也存在正负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优秀的教师人员可能都会集中在自律型国立高中，并且充分享受其虚荣效应所带来的选拔效果。这就造成了教育中失去了质性的竞争，使得包装性的竞争渗入到学校内部而产生副作用。

教育中多样性的价值

韩国教育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入学考试的问题。李明博政府雄心勃勃引进的招生计划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招生负责人通过评价学生的多种能力而决定入学原本是一个很好的宗旨，而它却又遇到了一个新的整齐划

一的压力，呈现了出过热的现象。学生们甚至都会提交一整箱的资料来表现自己的实力。如果这些都是反映学生能力的资料的话也无可厚非，然而并非如此。我还亲眼看到过有个学生在我面前在复印报纸的A4纸上盖上证明与原件一致的印章，以此证明是这自己亲自查找的资料。这可以说是在选拔创意性人才的考试制度环境下，依然以整齐划一的方法拼胜负的方式了。当然这种方法并不能保证可以被录取，但这对于身处荆棘中的学生来说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经历了这些副作用之后，招生负责人选拔制度转为学生综合能力选拔制度。因为以利用优越的家庭条件参加海外志愿活动等来提高综合分数的现象已陷入白热化。这明显加剧了社会上具有家庭优势的学生与并非如此的学生之间的矛盾，成为引发社会不满的导火索。

随着学生综合能力选拔制成为韩国型入学审核制度，教师们的业务量剧增。所以，我也为此感到过不满，而让我得以改观的是在大学里产生的效应。开始的时候看起来是因为有政府的鼓励才引进该制度的，但不知从何时起大学就自主性地扩大实施了该制度。这一制度在大学里已逐渐演变成一个系统，可以让学校以自己的方式

招收适合其个人才能的学生。

我正好在学生综合能力选拔制度扩大时期被调到农渔村地区工作。这个地区相比城市，各种条件都不太方便，然而学生们在高考中却能意外地取得成果。因为学生综合能力选拔制，学生们可以考上比想象中好的大学。这正是学生综合能力选拔制度发挥的积极作用。然而也有一些人批判这一制度是所谓的暗黑制度。其实以成绩为标准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过去的学历考试制度时期以总分排名相比高考等级制或百分位分数是更明确的。

区分优劣的指标越明确，整齐划一的程度就越深。因为有整齐划一的标准本身就意味着把指标单一化。所谓暗黑，也具有复杂之意。确实，现在相比学历考试制度时期更为复杂。就在我上大学时期，与我同一系的学生与我的分数是相差不多的。不管录取线的高低，被录取的学生分数都是在一定分数范围内的。

这种明确的考试制度在当今社会是难以存在的。因为考试不仅分为统考和自考，自考也具有多种考试类型。就像论述题，人们可能会想到即使考生其它科目不行，也可以通过写作考上大学，而对于学生综合能力选拔制

度，很有可能人们就不知道该适用什么样的录取方式才可以了。如果多种复杂性不能被认知为多样化的宗旨，而被扭曲为偏畸与不公正的代名词，那么它对于制度的负面意义就会是极为深刻的。

与此同时，韩国高中教育又在面临一次大的转折，即高中学分制。可以说，这个在第7次教育课程中引入的选择过程制度，是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具有全面化的制度。为此，高中正在扩充教学教室。紧接着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科、科学、国语科等教室。这本是以提高学生的多种知识水平为宗旨的，却如刚引进第7次教育课程时一样，人们对此更感到担忧。

相比第7次教育课程刚刚引进的时期，比较好的一点是因为受到低出生率的影响，班级的人数已减少到了20名左右。2002年当时人们还批判把班级的人数减少至35名的政策是不是太过激了，而现在这都已成为过去。然而副作用也是存在的，那就是这在高考上仍然存在问题。因为政策转为扩大统考体制，而这是与高中学分制存在矛盾的。考试制度还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就实施高中学分制，那么这极有可能会变得有名无实。随着第7次教育课程的全面实施，考试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

在高中学分制的时代该如何促进高考制度，还是个未解的难题。

有部分理工专业的人对于选择性教育体系提出了异议。说是很多大学新生在高中都没有受过最基本的教育，没有打下理工学系学生应具有基础。但这一现象也不完全属实。因为所谓的顶尖大学理工系学生所需要具备的知识，对其他学生来说可能就并不需要。不能把顶尖大学理工系学生需要具备的物理或数学等领域的相关知识强加于其他学生身上，也要求他们必需具有这些知识。每个人需要的是符合自己特性和能力的教育过程，而想要整齐划一地处理所有问题，则肯定会产生其它的副作用。

教育上所说的多样性，其实就是承认具有多样化的学生的这一事实。权威人士当然出身于顶尖大学的比较多，而如果对所有知识的标准都以他们为指标，教育则很容易走向误区。

考上位于首尔的大学意味着要进入二等级以上。所说的二等级是指进所有学生中的前11%，这确实不能算是大的比率。况且如果按顶尖大学来计算，那么就只有前5%才可以进去了。知识本身是带有认知的界限的，而

不能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不同的认知范畴。多样化正是超越了这种认知的界限，让人们可以接受彼此的不同。而教育领域需要的正是这一点。

与所有政策一样，良好的目的本身并不能保证其目的的实现。教育政策上的多样化肯定会面临很多副作用和排斥的声音。但不能因为这些排斥与困难而放弃多样性。不可否认，随着多样性的政策，韩国教育在逐渐产生变化并持续前进。

教育想要实现其义务并非易事。教育不仅是共享的资产，更是作为提高社会地位的手段。教育专家与参与者都有义务有效地处理这一复杂的机制来实现公共利益。我们的社会需要努力理解多样性意义上的复杂性，并为实现高水平的公正性，克服并发展低层次意义上的公正性而奋斗。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large, semi-transparent sphere in the center, transitioning from light blue at the top to yellow at the bottom. Two smaller circles are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corners: a light blue one in the top left and a yellow one in the top right. A horizontal line with a rainbow gradient spans the width of the page, passing behind the central text.

#做到

互利共赢的改革是可以实现的

科学技术领域为何需要更多的女性

Leem So-yeon 淑明女子大学 人文学研究所 研究教授





“29.3%”，“20.0%”，“10.0%”，“6.6%”。

这些数字都与科技领域的女性有关。设想一下每个数字及它们的排列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按顺序排列的这四个数字分别是韩国自然工学系大一女学生所占比率、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人力中女性所占比率、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人力管理者中女性所占比率，以及10亿韩元以上研究课题负责人中女性所占比率的统计数据(2018年数据)。¹

这些数字体现了科学技术领域对于女性的三个重要事实。第一，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人才需要学士学位以上的学历，而29.3这个数字说明以进入科学技术领域为目标的女性都不到全体人数的1/3。第二，在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人力单位积累工作经验时数据由29.3到20，再从20下降到了10，说明进入科技领域的女性很难维持职业生涯，以致最终脱离岗位。仿佛水管起了裂缝后漏出的水流一般，女性人才正在不断流失。第三，负责大规模研究课题的管理级别的研究者中女性只占6.6%，说明作为女性在科技领域发挥能力是极为困难的，这对女性是一种无形的障碍。女性科学家与工程师少之甚少，归根结底是因为大学与企业、国立研究机关等科技领域的结构上蔓延着对女性的歧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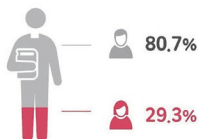
2018年度女性科学技术人力现状

女性科学技术人力的培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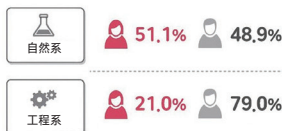


入学

自然工程系入学学生性别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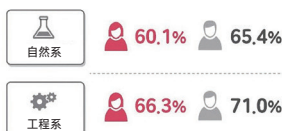


自然工程系学生性别比率



毕业后
就业

自然工程系学生毕业后就业率



女性科学技术人力的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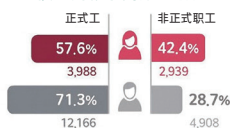


新录用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人力新录用性别比率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人力
按性别新录用形态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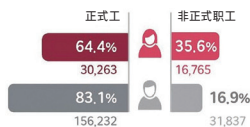


就业现状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人力按性别就业比率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人力
按性别就业形态结构



女性科学技术人力的利用



升职或
任职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人力升职人员性别比率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人力负责人性别比率



课题研究
负责人

课题研究负责人性别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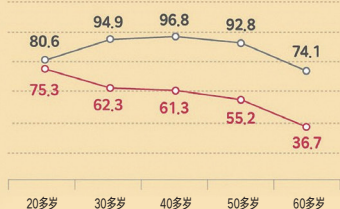
10亿韩元以上课题研究负责人性别比率



自然工程系人员按性别和年龄的经济活动参与比率

单位: %

○ 女性 ○ 男性



对于就职女性的支援政策现状



育儿休假启动率

98.6%



单位所属幼儿园设立比率

67.4%



产假、育儿休假 代替人员运营率

40.2%

来源: <2009-2018按性别科学技术人力现状>, 韩国女性科学技术人力支援中心, 2019。

当然，这些数字完全可以被解释为其它的意思。比如，将其解释为相比男性，这是女性比较缺乏作为科技研究者或管理者的资质与能力而导致的自然结果。因为自己缺乏资质才没有选择大学的理工系学科，所以即使进入了自己所学专业的岗位也不能维持下去，以致中途放弃。可能会很自然地认为因为女性人才本身不多，所以越往上，数据当然会越小。而且认为女性在升职和接受重大课题等方面机会甚少的这一现象，只是因为官方评价而导致的结果而已。当今社会试问有谁会因为是对方是女性而歧视对方？更何况像专利等业绩十分重要的科技领域，更不会因为是女性就不能成为教授或不能领到研究费用。从这一观点上看，前面提到的科技领域中存在的女性歧视之说就应该算是对现实的歪曲了。女性只要自发性地选择理工专业，提高自己能力即可。那么，自此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何需要提高科技研究开发人力岗位的女性比率？又为何需要提出政策或设立机关来培养女性科技人才呢？

以女性为对象的政策以及教育的意义与局限性²

对于针对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少数女性的支援工作，在政策和教育领域得到了积极的讨论和实施。这种支援工作通过韩国女性科学技术人政策，开始于2002年制定的《培养和支援女性科学技术的法律》，并从2004年开始每五年制定一次的《女性科学技术人培养及支援基本计划》(以下简称基本计划)为中心实施。从2019年开始实施第四次基本计划。直到目前为止各个基本计划的目标如下。

- 第一次基本计划(2004-2008): 与女性科学技术人才和谐构造科学技术中心社会
- 第二次基本计划(2009-2013): 构建女性科学技术人引领的创意性科学技术社会
- 第三次基本计划(2014-2018): 通过培养人才来实现科学技术和创造经济
- 第4次基本计划(2019-2023): 构建一个有益于发掘女性科学技术人潜在价值的社会

第三次基本计划中提到的“培养”，是针对女性科学技术人员而言的。这样就可以增加女性科技人数，解

决了性别比例不均衡的问题。像这样有很多项目是为了增加女性科技人员，防止女性脱离岗位而建立的。比如，增加对女学生的指导工作，扩大建设在职女性的单位所属幼儿园以防止女性的工作经历中断，扩大实施针对复岗人员与再就业人员的支援项目等。通过这些努力，2018年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人力单位中女性所占比率，相比2000年的10%，提高两倍至20%。按此速度，是否女性的比率在某一瞬间也可能会超过50%，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和男性人数差不多的女性可以争取到10亿韩元以上的科研费？

实际上很多人认为科技领域中的性别不均衡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地得到解决。会通过比较过去与现在，来预测未来将比现在更好。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然而，这并非会“自然地”实现。我们不能忘记，为了把过去的10%提高到20%，每五年都推出了新的政策，设定了新目标，也进行了新的努力。

问题是，是否像指导女学生、设立新项目来强化能力、扩大建设单位所属幼儿园设施这样的政策就可以充分解决所有问题呢？这并非是想贬低以上政策或认为不需要这些政策，只是如果我们觉得到目前为止，女性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及支援政策在量的增长上取得了成

果，那么，现在是否该是实现质的飞跃的时候呢？

到目前对女性科技人员的的支援项目都以女性为核心。对女性科技人的支援政策的建立一是出于考虑到女性在社会与科技领域上与男性相比具有性别歧视的不利因素，二是考虑到像其它领域一样女性大部分以少数者存在其中。其实这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女性模范。对于这种模范的缺失，人们自然地就归结为是由于女性在科技领域缺少爱好或在能力评价中处于劣势的原因。但是，不管是因为女性在结构体系上受到了性别歧视，还是因为女性自发性地没有选择理工科，都没有理由反对加强对于女性的教育，也没有理由反对支援女性事业，更没有理由不帮助作为少数者而处于困境之中的女性。

然而，这些出于模范缺失而对女性展开的支援项目并非没有问题。Han Gyeonghee等分析了为引导女学生进入工科大学为目的的项目³，并指出，只针对女性的项目因为尤其突出女性群体，所以男同学和女同学都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男同学对此表示这是对男同学的歧视，也抱怨说这是只给女同学特殊待遇，而女同学则表示这种特殊待遇本身就是对女性的歧视，这种待遇就是把女性当作劣等的存在的体现。

理工科的教育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理工科大学的性

别认知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反映少数女学生在数量和文化上的特点，实现大学教育中的性别平等。因为理工科专业更加注重科学抽象性、严格的理论、数学思考方面的价值，所以被认为是缺乏灵活的思维且不懂得关怀他人的非人性意义上的学问。理工系也同时被意识为具有男性特性的专业，因为这一专业相比关系更加重视知识或伦理。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下大部分的理工科教授都会过度保护和照顾女学生，也会降低对女学生的期待。⁴在这样的氛围下，女同学作为一名科学技术学者就会很难对自己的能力产生自信。

到目前实施的认知教育主要关注于理解女同学区别于男同学的特性，并开发符合其特性的教授方法的这一点上。比如，女性比较注重互动，相比自主更倾向于依赖外界的认同，并善于暗示性的交流，注重语境，使用更直观的思维方式，而男性就更加注重结果，善于推销自己，喜欢直接的交流方式，并多以分析和逻辑性的思维方式为主。这种差异是显然存在的，如果无视这些而同等对待女性和男性，则可能造成将女性排除在外的结果。所以，现有性认知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开发并实践一种教学方法，以此承认男女之间存在差异，并照顾作为少数者存在于文化领域上的女学生。

通常我们会认为这样的性认知教育主要可以通过课程的运营和教授对于学生的态度等来缓和男女之间的矛盾，并填补女同学的缺失。比如，禁止歧视性的玩笑或区分男女性别的语句，认识到女同学在面临问题时，可能会过于指责自己或轻视自己的能力，鼓励女同学并给与她们可以充分发挥能力的空间，在看到她们伤心流泪时进行果断的指导等等。

当然，这种方式的性认知教育也取得了一定的教育成果。因为，与其忽视男女之间存在的现实性差异而追求名义上的平等，不如接受现实并改变现有的教育方式。然而，基于男女差别的性认知教学法可能会存在锁定个人的性别特性，而忽视个人的特性与多样化的局限性。如果教育只关注于女学生消极的态度与微小的自信，那么可能就是肯定了女性相比男性就是一个具有缺陷和劣等的存在，这就像理所当然地认为女科学家凭借女性特有的母性和细致的个性可以更好地做科研，把女性视为母性与细致的代言词一样存在问题。

既然如此，是否存在一个非特殊待遇和非特例的方式，可以培养和增加女性科学家呢？是否存在一个可以客观地认同男同学与女同学之间的差异，且不将其差异本质性地归结为性别特性，而以此实现的一个新的性认知教育呢？

如果问题并非在于女性

缺乏女性模范的女性政策或有关男女差异的教育不仅存在成果，其具有的局限性也显然是相当大的。想要把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女性问题归结为“女性”来解决的政策和教育，不仅掀起了对缺乏模范与本质性性别差异的抵抗，还引发了逆向歧视等很多争议。那么该如何看待科技领域中女性的问题呢？如果问题并非在于女性，那么是在哪里？科技领域中的女性问题如果并非在于女性，那么就应该在于“科学技术”。需要纠正与改变的是否并非女性，而是科学技术呢？

在探讨科技领域中女性的问题时，会经常有人说“有实力就可以了，现在谁还会计较男女？”对于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可能对于29.3%，20.0%，10.0%，6.6%，像这样数字持续下降的现象，也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现象。因为他们会觉得这只是以能力评价的结果而已，认为只要提高自身能力，数字肯定会有所改变。然而，科学技术人员是否真的可以只靠能力和实力来得到评价呢？

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表示，科学家的社会存在“共享主义(communism)”、“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公正无私主义

(disinterestedness)”、“制度性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cism)”，这四种规范。⁵ 共享主义是指把科学成果归结为科学家的社会全体，而并非归于个人所有的主义。普遍主义是指科学活动并非与性别、人种、阶级、思想、名声等科学家特有的因素有关，而是指科学活动排除了人格方面的因素且基于客观的科学事实的主义。无私公平主义是指科学研究的执行不可牵涉到特定利益关系或个人私欲的主义。制度性怀疑主义是指在最终被接受为事实之前，必须要严守判断，严格地按标准执行验证的主义。

此后，默顿提出的科学家社会的四项规范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例如，英国科学社会学家迈克尔·穆尔凯(Michael Mulkey)认为，这些规范描述的不是科学活动真实的运作状态，而只是科学家自己创造并信以为然的意识形态。⁶ 不用以学术界的批判举例，想一下我们所听到和所经历过的科技领域，就不难找出对于以上四个规范的反例。科学成果已经以专利成为私有化，科学家的声誉对于科学性的事实评价是具有影响力的。不仅有科学家把研究成果伪造成有利于企业的结论并展开法律上的争论，更常有科学家在没有做实验就以通过同行评审(peer review)来发表论文的情况。默顿的规范虽然在科学家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这些规范实际上在很多情

况下却得不到实现。因此，普遍主义规范中所谓的性别无关于科学活动的评价之说就会显得软弱无力。那么，就从现在开始让我们以科学家社会的普遍主义为中心，一起挖掘并探讨一下科学技术的问题吧。

科学从诞生那一刻起就与普遍性相去甚远。历史上来说，科学就是欧洲白人男性的发明。最初在近代科学之前探索自然的哲学家，即自然哲学家就都是男性。实验在知识生产中非常重要，这是近代科学的最大特点，也是将科学与自然哲学区分开来的核心。如果说自然哲学是以人类的理性来理解自然和万物本质的活动的学科，那么近代科学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起源，就是介入自然并人为地把自然打造为事实的学科。这就是被称为“实验”的方法论。英国政治家兼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以“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这一名言而被大众知晓，而他也正是把实验归结为近代科学新方法论的人物，他也可谓是近代科学的精神支柱。

培根写的文章中有一篇题为《时间的男性诞生(Masculine Birth of Time)》的随笔，这篇随笔因没有被出版而鲜为人知。在该文章中，培根将科学描述为“人类理性与自然的神圣婚姻”，并将实验比喻为“对自然的审问”。自古代以来自然经常会被刻画为女性，而这

些女性大部分是被形象化成超越人类或具有特殊能力的女神。例如，在古埃及神话中，伊西斯(Isis)既是尼罗河，也是支配尼罗河的自然法则。但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自然界成为了科学的实验对象。因为可以通过科学揭开它的本质，所以它还经常被喻为女性，一名羞涩而性感地露出肌肤的女性。17世纪有一篇约翰·赫维留(Johannes Hevelius)写的天文学作品，书中描述了自己跪在女神与前辈天文学家面前，并把自己的天文学发现作为供品献在祭坛上的场景。然而在18世纪的化学相关书籍中的女神则成了祭坛下的女性，她们裸露着上身坐在椅子上，羞涩地用手指指着旁边的化学家的肖像画。一个世纪后天文学家和化学家依然都是男性，然而自然界却从高高在上的女神形象转变为一名期待科学家们揭开自己的面纱而探求真理的女性形象。当然，现在没有科学书籍会把女性描述成自然。19世纪以后，在科学书籍和期刊上，自然彻底地只以物质形式来显现。但不变的事实是，科学家的形象从古至今都是男性。

1966年至1977年间，美国小学生画的5000多幅科学家画作中只有28幅是女科学家。也就是说，全体科学家中有99.4%是男性。进入2000年代后，女性科学家在画作中所占比例才提高至20%左右。有趣的是，在画科学

家时，女同学画女科学家的比率要远高于男同学。而随着孩子们成长，把科学家想象为男性的比率就会逐渐增加。例如，在2016年的一项调查中显示，58%的女孩子的画作都以女科学家为主角。据2018年调查显示，六岁的孩子画女科学家的所占比率为一半左右，而16岁的青少年中该比率只有20%。⁷

难道这种现象只是出于孩子们对历史的无知和想象而已吗？女性科学家的典范玛丽·居里曾在1903年诺贝尔奖候选人中，差一点就因为女性而被排除在外。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在1962年发现了DNA双重螺旋结构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然而当这一重大发现展现给世人之时，是否想过为何人们有一段时间对这位科学家闻所未闻？就在几年前访问过韩国的英国男性诺贝尔奖获得者还说过女性在实验室就只会谈恋爱或哭闹，所以更喜欢与男性一起工作，而遭到众人的批判。过去的惯例与文化通常会把女性排除在历史和科学领域的工作之外，而在这样的惯例与文化中，女学生们是否可以自由地选择理工系学科，在走向社会后又是否可以得到与男性平等的评价与待遇呢？（即使没有怀孕、生育、育儿等问题）

以全国160所高中为对象，对于高考选择专业的高三学生进行过一项调查。⁸ 主要以报考理工系的理科学

生、报考非理工系的理科学生、报考理工系的文科学生这三个群体为对象。以此进行的性别比较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理科学生报考理工系的男女比率相差不多，理科学生报考非理工系的学生中女同学比男同学多了20%左右，而文科学生报考理工系的学生中则男同学比女同学多了20%左右。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提及过统计与女性人才流失的现象，可见这种现象从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更有意义的发现是学生们如此交叉志愿报考的动机在于考上一个更有前途的大学，而并非在于取得更好的科学分数。对于报考非理工系的理科女同学和报考理工系的文科男同学的选择，相比眼前的科学分数，未来的前程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正是更加证明了相比女性，男性更容易在这个领域中发展的事实。

探讨科学技术

但真正的问题却另有所在。现在让我们正式开始谈论有关科学技术的问题。在科技领域女性如果是少数者，男性则会成为领域里的主流。这个问题不仅只存在于韩国科技领域。试想一下到现在几乎都以男性为主导的世界科技领

域，呈现了什么样的面貌呢？不，我们应该说事实上以西方白人男性为主导，并与世界各国男性共同促进的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呢？先不说生态女性主义之理论，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以科学技术塑造的人类历史所面临的危机。从战争和核武器到垃圾和雾霾，再从塑料问题到气候危机，再到新型冠状病毒，这无一不是威胁人类的安全与生存的问题。这些问题事实上既是科学技术的问题，也是科学技术所造成的自然与社会的问题。对于这种科学技术的问题意识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被女权主义者科学学(feminist science studies)多次提及过了。

Sandra G. Harding⁹作为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提出了科学和女性的问题本是科学上的问题，不应以女性问题来看待的这一主张。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女性一直都被排除在科学知识生产之外，女性也更无法体现其作为配角的作用。这不仅是针对女性而言的，具有人种、阶级、文化等差异性群体的立场也都没有被反映在科学知识生产之内。如果说生活不能与认知相分离，我们所认识到的内容对于我们如何生存就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人类思维所受到的特定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以大部分(西方白人异性恋者和非残疾人)男性所构成的科学家社会提出的普遍主义最终就不能称作是普遍

的。要成为坚固的理论，就一定要基于女性和至今被社会所忽略的群体感知到的世界。展开Harding的理论，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科学家社会的多样性越高，科学就会越接近“强客观性strong objectivity”。

同一时期，以发表《赛博格宣言(Cyborg Manifesto)》而闻名的女权主义者科学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J. Haraway)也提出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问题。¹⁰ 哈拉维表示：“科学的客观性是以神的视线为前提的虚构。”除非是神，否则谁都不能客观地体现某一对象的实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知识就都是“情况所形成的知识(situated knowledge)”，因此任何经验都不能拥有特权。客观性只是通过连接状况所形成的部分知识而存在的。综合哈丁和哈拉维理论就是，科学的客观性基于部分认知，即认同它是以隐藏在主流科学背后的男性为核心的理论为基础的。

1980年女权主义者科学学研究者的呼吁到达女性科研岗位的这一刻，经历了20多年的过程。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有关以男性为中心的科学给女性健康造成了实质性危害的一系列事件。1997年至2000年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回收了10种已获批准销售的医药品。因为发现了其致命性的副作用，而其中有8种被判定对

女性的副作用要远远大于男性。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因为在研发这些药品的过程中，主要以雄性动物和男性受试者为对象进行了临床试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在细胞生理学会刊载的论文中，居然有75%都没有标记细胞的性别，而标记性别的论文中男性占20%，而女性仅占5%。在以《自然(Nature)》中发表的论文为对象进行的调查中显示，用于实验的动物中，只有五分之一是雌性动物，对于心血管疾病相关临床试验的受试者中，女性仅占31%。然而，女性由于心血管疾病死亡或持有疾病的比率要远高于男性。这一事件赤裸裸地给人类展现了客观性这一认识论可带来的负面效果。虽然这只是发生在少部分医药品的问题，但是因为一向以男性身体为标准的研究惯例，因为使用雄性动物所做的实验更加有效而毫无顾虑地展开实验，最终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那么，是否现在应该从基本的制度上考虑并思考一下科学技术的客观性呢？

“性别革新(gendered innovation)”正起源于这样的问题意识。200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女权主义者科学史学家隆达·施宾格(Londa Schiebinger)主导了性别革新项目，并提出从研发初期就要执行性别分析、创造新的知识、开发新的技术。施宾格表示，通过消除研发过程中所具有的性

别偏见，可以使研究在科学、医学、工学等领域取得更突出的成就。也许会因为初期费用或需要的时间过长，而使研究看起来没有效率。但考虑到FDA医药品批准后撤回事件等问题出现后处理的社会费用，这种方式反而可能是更能提高效率的一种方式。如果在现有研究领域结合性别分析，就会产生新的视角，并可开发新的研究问题，发掘新的研究领域，对于性别的分析也可以开发研究的创意性。性别革新迅速在美国和欧洲的科学技术学界发挥了其影响力。2011年欧盟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名为“性别革新”的专家集团，2012年美国国立科学财团(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也开始参与了性别革新项目。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性别革新中，到目前正式发表的20多个事例中有关工学的两个事例吧。¹¹ 第一个事例是机械翻译领域。机械翻译在全球化的世界变得越来越重要。目前市场上的翻译器的错译率虽然还很高，但其准确度也确实在日益提高。现有机械翻译系统的错译源于需要非渐进式解决方法的基础技术问题，而这些技术问题之一就与性别有关。像谷歌翻译器等尖端机械翻译器通常会无视人称代名词与原文脉络之间的关系，而将女性错译成“he”或“him”等男性代名词。这不仅是关于性别偏见的问题，也是关于机械翻译器准确性和可

靠性的问题。现有的翻译器不区分原文中提及的人的性别，而是在多个双语文本中寻找与原文最接近的翻译语句来进行翻译。现有的翻译器以使用频率等多种因素，找出一个翻译句子以对应原文的形式来进行翻译。所以网络上的机械翻译使用更多的是男性代名词。因为原有的机械翻译中比较广泛地使用了男性代名词，所以机械翻译的译文中更多地会出现男性代名词。

为了在性别革新项目讨论此问题的解决方案，2012年7月性别革新项目召开了有关此项目的研讨会。但是，即使在原有文本资料中设置了相同的男女代名词的比率，也无法解决该问题。因为翻译器可以不区分性别而任意对应性别与代名词，而使用原文中的人的性别与其它代名词来翻译。因此，需要开发一种可以区分原文中的性别的算法，这对理解性别后的翻译来说是很重要的。通过开发这种算法，可以防止翻译器自动使用男性代名词，也可以提高翻译质量。

性别革新的第二个事例是电子游戏领域。在过去的50年里，电子游戏开发者、程序员及游戏使用者大部分都是男性。虽然最近也有不少女性玩电子游戏，但至今人们多持有一种固定观念，认为电子游戏是比较偏向男性的领域。但是，因为电子游戏具有强烈的故事性，也因

此会对个人的行动、社会价值、性别规范等产生影响，也会同时与游戏使用者产生相互作用，所以对于电子游戏的刻板印象成为了一个值得担忧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游戏设计人员通常使用两种战略来制作针对女性和孩子的游戏。一种是针对所有对象，而不区分男女的游戏。然而，这种游戏大部分自然地成为了为电子游戏市场中的主要消费人群，即为男孩子们而设计的游戏。这种战略需要女孩子们为了使用男性为主的游戏而开发自己的能力。另一种是针对女孩子们开发的游戏。例如，让游戏中出现一位穿着连衣裙的公主，或开发一个以粉色系列为主的游戏。这种战略会更加强化性别的刻板印象和性别本质主义思想，并突出男女性别差异。

性别革新项目中提出的方法排除了以上两种，而使用了第三种战略。就是不以性别规范为前提，开发一个所有性别都可以产生乐趣的游戏。使用这一战略的游戏设计人员通过分析市场上的多种电子游戏，找出了男性、女性以及孩子们都喜欢的游戏类型。有趣的是，相比具有性别偏向的游戏，这种所有人都比较喜爱的游戏在市场上最为广泛地受到了欢迎。由此证明，性别革新下诞生的技术，并没有基于性别偏见或强化此观念，反而成了市场最畅销的技术。

从科技领域解析需要具有更多的女性科技人员的理由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说服那些认为应该特别支持培养女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以及那些想知道为什么在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过程中会根据个别男女的喜好和能力而出现性别失衡这一问题的人。首先，这两种观点的共同点是，在科学技术领域，女性比男性处于劣等地位。当然，对于女性缺失模式，前者认为是结构性不平等的结果，所以应该通过政策和教育加以改善，而后者则认为虽然是性别比例不均衡的问题，但不需要人为干预。尤其对于持有后者想法的人，需要说明为何缺少女性科学家和工程师就会成为问题。从这一点上看，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显得尤为重要。

可以确定的是，大部分的科学家与工程师都是男性的这一点，间接会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产生负面影响。性别革新项目让科学家与工程师摆脱以男性为中心的惯例，有意识地考虑生物学与社会学上的性的差异。那么，性别革新是否意为科学家与工程师无所谓是男性还是女性？是的，这一项目就是在这一点上摆脱了男女差异的本质主义的前提。但同时，性别革新对身为主体和

对象却长期被排除在科学技术之外的女性来说，可能更具吸引力。

正如前期研究显示，男生对科学技术本身感兴趣，而女生们在科学技术领域更加比较关心的是在领域里发挥自己作用，并做与人相关的工作。¹² 实际上，在科技领域提出对于客观性的疑问，并促使其改善的人物恰好大部分都是女性。包括哈丁、哈拉维以及席宾格在内，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科学技术提出问题，并考虑对此的对策的大部分的学者都是女性。2015年发现人脸识别人工智能能否正确识别到自己脸的事实后，开始研究人工智能的性别及人种偏见的研究者也是黑人女性。难道这是因为认知和生活是不可分离的吗？在像性别革新一样性别认知能力成为研究方法论中必要因素的项目，可以预测到女性科学家和工程师可能会表现出更加出色的能力。如果像性别革新一样的对策性研究开发项目得以日常化，女性科学技术人员的竞争力和革新的源泉就不会再是沟通能力或感性，而是女性本身在生活中所具有的性别认知能力。当科学技术领域不仅具有有色人种女性、非西方国家女性、患有残疾的女性、出身于劳动者阶级的女性，还具有处于男女性别范畴内的多样性的时候，才可谓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

性别革新的最终目的是追求科学技术多样性。相比只以西方白人与非患有残疾的男性为中心而发展的情况来说，科学技术只有在包容非西方有色人种及残疾女性的时候，才会更具普遍性以及较高的市场性。有能力把科学技术革新到这个方向的，正是具有多样性差异的人类。多样性是革新的源泉。如此具有多样性差异的女性对这样的科学技术是不可能不感兴趣的。科学技术研发中，反映的多样性差异越多，就会有越多的女生跻身于科学技术领域，也会出现越多的女性科学家和工程师，更会有越多的女性研究者被认可为具有突出的能力，并成长为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导者。

科学技术领域中对女性的看法，其实就是对科技多样性的观点，也是对革新的论题。如果期待有更多的女性活跃在科技领域，从现在开始就要改革科学技术，而不是改变女性！有更多的女性科技人员在没有偏见与歧视的条件下可以充分发挥能力，才是科学技术革新迈向多样性的最坚实的第一步。

- 1 <2009-2018 性别基础科学技术人力现状>, 韩国女性科学技术人力支援中心, 2019. https://www.wiset.or.kr/contents/information01.jsp?sc_type=3&sc_tab=2
- 2 这里介绍的性认知教学方法的内容是作者作为合著者参与的首尔女子大学女性工学人才培养事业团《性认知性工学教育教学用指南》(2018)中摘录并修改的一部分内容。
- 3 Han Kyunghee, Park Junhong, Kang Hojung, 《工学与性别: 如何适用于工学教育?—女学生工学教育先导大学(WIE) 事业分析和运营经验为中心》,《工学教育研究》, 13(1), 38-51, 2010.
- 4 Min Moosook, Lee Junghee. 《工学领域专业女性的教育和职业经验分析》,《教育社会学研究》, 15(2), 65-93, 2005.
- 5 Merton, R. K.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 6 Mulkay, M. J. "Norms and ideology in science".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5(4- 5), 637-656. 1976.
- 7 Terada, Y. "50 years of children drawing scientists". *Edutopia* .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dutopia.org/article/50-years-children-drawing-scientists>
- 8 Ha Minsoo-Shin Sein-Lee Junki, 《对于选择与高中学科不同专业的高三学生探索学习动机的特性》,《韩国科学教育学会志》, 36(2), 317-324, 2016.
- 9 Harding, S. 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 10 Haraway, D..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4(3), 575-599. 1988.
- 11 对两个事例的说明参考了"性别革新网站"
<http://genderedinnovations.stanford.edu>
- 12 Sible, J. C., Wilhelm, D. E. & Lederman, M. "Teaching cell and molecular biology for gender equity". *CBE-Life Sciences Education*, 5(3), 227-238. 2006.

为何缺乏多样性?

Yoon Seok-won TESTWORKS 企业代表人





2000年代初在美国结束职业生活和学业后，我以软件工程师的身份进入韩国大企业。当我接触到韩国的IT生态界时，我发现了韩国与美国不同的特殊现象。

第一是女性比率相对较低。就以业务人员来讲，女性软件工程师在部门的比率都不到10%，更不用说女性工程师出身的高管了。如果私下里向男性管理人员询问不喜欢与女性工程师一起工作的理由，他们可能会说：“女性工作起来很不方便”，“女性会因为育儿等家事，无法集中于公司生活，辞职的可能性也很高”等等。

实际上，女性参与软件领域的比率明显低于男性。2015年统计¹显示，国内女性的大学升学率为74.6%，比男生的67.3%高出了7.4%，女性就业率也达到49.9%，但取得国内软件相关专业学位的女性比重仅占18.8%。毕业后，因为职业转换、生育等多种原因，从事于软件行业的女性比重进一步下降至12.5%。²这与美国的22.9%、英国的19.1%等其他国家的软件领域女性从事比率相比也是较低的。这一数字如实地反映了我国STEM领域中的性别多样性水平。另外，工作经历中断的韩国女性的学历大部分都是大学学士学位以上(首尔市

工作经历中断的女性中，学士学位占75.3%以上)。³ 当她们为了再就业而到自治团体运营的相关机构咨询时，机构通常会建议她们转换到与原来经历无关的职业，如一般业务员、疗养保护师、厨师、幼儿教师、社会福利师等。之前从事于专业领域的高学历女性在工作经历中断后若想要再就业，就会非常不容易。⁴

第二，隐形的障碍与歧视不只存在于女性。虽然国家规定了义务雇佣残疾人的制度，但是在STEM领域的公司几乎很难找到他们的身影。具有国内代表性的ICT企业三星电子，在2017年本应义务雇佣2800名残疾人，但因只雇佣了1500余人而不得不缴纳429亿韩元的雇佣负担金额，并连续5年获得了残疾人雇用不活跃的第一位的污名。⁵ 而在残疾人雇佣义务理应作出表率的STEM领域政府所属研究所，2017年的残疾人雇佣率也只达到1.65%，都不到义务录用的3.2%的一半水平。⁶

长期以来，我在国内外大企业的软件行业工作时，以中间管理者的身份试图解决STEM领域的多样性问题，然而在引导组织变化方面显然存在局限性。首先，大企业的实务负责人除非可以预估成果，否则绝对不会为多样性做出新的挑战。与管理层宣布将雇用1%的残疾人

作为软件测试人员和开发人员的SAP的事例⁷不同的是，如果没有管理层的支持，若中间管理者在公司里想要自行促进多样性的多种试验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为了实现STEM领域中的多样性，毅然离开了高年薪的大企业，决定创立社会性企业。

我抱着一种信念，2015年创立了TESTWORKS公司。我想如果有潜力的多样性的群体(工作经历中断的女性、残疾人等周边化群体)在STEM领域里找到合适的岗位，并通过接受适当的职业教育和社会适应训练的话，他们就可以成长为具有高水平的从业者。在了解到社会经济问题可以通过企业来解决后，为了在STEM领域实现多样性，并成功引领社会企业，我考虑了许多的方案。

实现多样性的可持续社会企业：实施方案

国内约有2300多家社会性企业，而大概有4.5万多名劳动者在社会性企业工作。其中约占60%的2万8000多名是残疾人、高龄者、低收入阶层等雇佣劳动部制定为弱势群体的人。⁸ 社会性企业培养法作为社会性企业的维系支柱，从社会补助的角度上，一开始就具有着促进弱

弱势群体就业的强烈意图。但是，由于聘用和运用弱势群体的过程非常复杂，而且需要支出很多的时间和费用，因此相当多的社会性企业在人力资源上无法具备竞争优势，甚至不得不担心自己的生存。雇佣弱势群体的企业往往因劳动生产率低下而不能降低成本，导致无法推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为了克服这种社会性企业的局限性，我把TESTWORKS的雇佣对象定义为“虽具有潜力但没有机会的人”，而不是“弱势群体”。这样以来，我就可以更加关注他们的优点，而不会束缚在他们所具有的局限性里。另外，为了成长为STEM领域的可持续社会企业，我制定了一些实施方案，即开发以优点为基础的职务能力并提供职业教育，适用示范项目并确保高质量的客服、构建重视成长的组织文化等，并将这些方案加以实践。

实施方案一、开发以优点为基础的职务能力并提供职业教育

软件测试人员	在STEM领域，软件领域通过分析要求事项、设计、体现(coding)、验证(testing)等过程推出产品。同时，软件规模越大，就越需要专门负责各种业务的工程师。像微软等大部分的跨国企
--------	--

业的软件开发相关职业群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为开发新的软件产品，分析要求事项并管理和规划项目的软件管理员PM(Project Manager)、按要求事项设计并展现软件的软件开发员SDE(Software Development Engineer)、检测开发的软件是否按客户要求展现的软件测试员STE(Software Test Engineer)等。TESTWORKS判断其中的软件测试员是最适合作为工作经历中断的女性和残疾人的岗位。

软件测试大部分会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地展开，这是需要反复执行和分析用户立场系统的客观性的验证过程。因此，软件测试员需要具备逻辑思维，并在整体和结构上理解产品中的要求事项。还需要具备共情能力和创造力，对产品持有好奇心，并从客户的立场上找出产品的缺陷。另外还需要有沟通能力，直到完全修正错误为止，软件测试员都要与软件管理员形成良好的沟通关系。我认为工作经历中断的女性因为具有沟通经历，所以会更加具备以使用者为中心的思考能力。她们也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可以更好地完成测试工作。

人工智能
数据标签

关于残疾人和软件领域岗位的适合性，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丹麦社会企业家

Specialisterne的成功事例。Specialisten在对于具有优越的智力、观察力、集中力，并喜欢重复性工作的自闭症残疾人实施教育后，成功地把这些人群连接到了SAP软件测试领域岗位。Testworks也关注自闭症残疾人的优点，并与外国A公司一起为自闭症残疾人就业提供了软件测试员培训教育。但是因为企业机密问题，软件测试员需要与实际的开发者在同一个空间里工作，所以在国内以残疾人为对象开发的软件测试岗位是有局限性的。所以为了开发自闭残疾人的优点并一起成长，我们寻找了其它的就业岗位，即人工智能数据标签(data labeler)。

人工智能数据标签是指将多种形态的数据转换或加工成人工智能可以学习的数据形态。当人们看到汽车照片，会很容易认识到照片里的事物就是汽车。但是电脑却认识不到这就是有关汽车的照片，所以需要人为地做工作，即在照片上输入汽车的位置和大小，并在这个大小的位置里标上“汽车”，让电脑可以认识到这就是汽车。像这样的一系列过程就是数据标签。数据标签的难易度比较低，并重复性的工作比较多，所以还通常把这个工作描述为“贴AI眼球”。然而，因为人工智能学习的是经过加工的数据，所以正确的数据标签和高质量的数据组(data set)在提高人工智能学习效率和功能方面是

极其重要的。

数据标签业务以准确、平直为特性，且需要较多的重复性工作，这正适合自闭残疾人，可以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所以，我们在2016年首次在国内开发了针对自闭残疾人的数据标签业务。

在为工作经历中断的女性和自闭残疾人发掘合适的岗位的同时，还需要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教育。大部分的工作经历中断的女性为四十岁以上，且工作经历中断期间长达10年以上。况且有些人还是第一次接触到软件领域，所以需要以基本的理论教育为开始。对于相同的内容不仅要实习，还要做三次以上的重复训练(软件测试培训需要200多小时的时间，其中实习占60%以上)。通过这样的反复教育，对于原来难以理解的内容也会自然而然地学以致用。

自闭残疾人则需要通过更长时间的实习，来养成对业务的规律性习惯。除了理论教育，根据学习者的进步速度，大概需要三到六个月的实习期间。通过严守上下班时间，遵守作息時間，以及业务成果的均质性，来测定教育成果。尤其对于自闭残疾人来说，生活习惯会严重影响业务成果，所以也需要与残疾人的父母确认他们的睡眠、饮食，及运动习惯规律与否。

实施方案二、示范项目及高质量的客服

比开发合适的岗位和教育更加难以实现的是，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客户，并以此稳固他们的工作岗位。因为我在大企业作为工程师工作时没有做过营业类工作，所以帮助这些弱势群体在非基于社保的实际业务领域确保自己的客户，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此期间，一次软件测试相关的研讨会上我有幸遇到外企H公司的部长，并交谈了相关问题。他表示，在管理项目时最令人头疼的就是熟练员工的离职。因为大部分的外包公司测试人员工作不到一两年就离开，所以会使得管理项目难以延续。所以我为部长介绍了针对工作经历中断的女性的相关教育，强调了到她们作为准备再就业的人群，不仅具有着坚定的意志，并且因为勤勉尽责并渴望再就业，所以就业后很可能会长期地工作的这一点。交谈后，我从H公司获得了三个月的示范项目机会，其中有三名工作经历中断的女性参与了此项目。三个月后，她们的业务理解能力、勤勉性、责任心等得到了很高的评价。随后，我公司与H公司正式签订协议，并建立了以工作经历中断女性组成的测试部门。

人工智能数据标签在通过两周左右的短期示范项目与

客户签订协议后，在实施项目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客户中有一位S公司的代表人，他对于我公司的社会价值有着很深的共鸣，也因此签订了数据标签外包合同。我们以自闭残疾人为主实施了项目。然而，两个月后我们得到了客户公司的软件管理员的差评，也由此遇到了解除协议的危机。原因是项目启动后，我们盲目相信示范项目中自闭残疾人的表现而没再做另外的检测就将数据处理结果直接交付给了客户。因为数据标签业务结果质量不均匀，所以客户PM的检测工作加重，最终走到了谈论解除合同的地步。

通过接触这些客户的不满意，我们了解到相比追求社会价值，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和改善质量才是最重要的。这个事件后，我公司建立了特别工作组，在把最终的完成项目传达给客户之前，做一个整体的检验工作，并建立对策以改善质量。首先，为了与客户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在公司内部设置了PM，以对应客户PM。通过管理残疾员工的每日业务成果，自我审查，以及公司内部评价等，改善初期完成的标签数据质量，并在给客户传达数据之前，由管理者对质量做最终的验证。另外，因为自闭症残疾人的工作成果与有规律的生活管理密切

相关，所以将工作经历中断的女性安排与数据标签组的管理者一起执行业务，帮助他们管理生活。这样可以有效结合工作经历中断女性具有的优秀的沟通能力和自闭症残疾人具有的准确性与高度的集中力。这样一来，工作经历中断女性与自闭症残疾人所具有的优点可以在业务体系里得到统一，并起到增效作用，从而提高业务生产力。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数据质量，还可以提高客户的满意度。结果，原来对质量抱有怀疑态度的S公司转变成为了长期的客户公司，并至今还在维持合作关系。

实施方案三、构建重视成长的组织文化

随着公司的成长和职员的多样化，最重要的是给职员们奠定一个基础，明确理解在TESTWORKS工作的意义和理由，理解公司的核心价值，并为此不断地实践。正如TESTWORKS公司口号一样“职员、顾客、社会一起成长(Growing with Employees, Customers&Society)”，个人的成长发展为顾客的成长，顾客的成长发展为公司的成长，以此实现公司所追求的社会价值，并为职员提供一个良好的组织环境，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为此，我们明文规定了公司的使命、设立目的和行动纲领，并开始与职员们共享公司的核心价值。

我们公司的使命是什么？

- 给与具有充分潜力却受挫的人们一个自我证明的机会，为自己感到自豪并感受成长的喜悦。
- 我们是技术基础社会性企业，旨在不断地测试自己和不断地证明自己。

我们公司是以什么目的成立的？

- 我们公司是提供公平的机会而建立的。我们相信工作岗位不是为了生计而存在的机制(即经济补偿不作为唯一的补偿机制)，而是作为机会，让人们可以证明自己，有品格地生活，不断成长并实现自我。由此，公司希望通过以下五个机会的良性循环，建设一个没有歧视的公正的社会。

- 1) 发现: 发现适合自己能力的专业工作的机会
- 2) 准备: 培养实践能力的教育机会
- 3) 经验: 有偿经济活动机会
- 4) 成长: 社会、业务上的成长机会
- 5) 扩张: 积极向上、舍己为人的机会

我们公司的行动纲领是什么？

- 协力: 我们将建立一个优秀的团队，把缺点升华为力量，充分发挥各自所长，以创造协同效应。
- 影响力: 我们将为我们的员工以及客户公司创造实质性和定量的影响力(社会价值)，并努力塑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 变化: 为了变化和发展，我们将不回避任何困难与挑战。
- 成长: 我们成长是为了给更多的人提供更多公平的机会。

为了构建一个组织文化，共享公司的核心价值，并重视公司成长，有必要鼓励职员的个人成长。为此，除了在会议上单纯地传达这样的信息，我们还提出了具体的方法。例如，在周期性的职业开发研讨会上制定各自的职业发展蓝图，给出时间对自己的成长做思考，并鼓励职员与管理人员协议具体的方法，在计划一年业务的时期设定业务目标，并建立实施计划，以致实现个人的职业前景。

同时，对不断努力提高自己，并取得成果的职员，给与积极的奖励。不按职龄或职位，而按业务成果和成长速度，加以奖励。必要时将成绩优秀的职员晋升为管理者，使得他们以相比其他公司相同职龄的员工可以拥有更多的权限。

实践多样性的积极效果

在创业后的两年，我们创造了多样性为基础的就业岗位。为了验证创业初期的理念，我们对实施方案加以实践，证明了此方案具有以下三个效果。第一，以示范项目的成功为基础，与客户建立了初期的信赖关系。

之前提到的软件测试领域的H公司和人工智能数据标签领域的S公司，在首次签约后一年内扩大了项目规模，并转为签订长期协议。第二，扩大了弱势群体的就业岗位。2017年我们雇佣了五名工作经历中断的女性、三名残障人、一名听力残疾人。这与2016年相比，弱势群体的就业人数增加了2倍以上。另外，我们又雇佣了六名(包括2名女工程师)和一名专业人士，以提高人力结构的多样性。第三，通过职员的长期工作确保了业务熟练度。在3个月的实习期间，除辞职者以外，弱势群体的岗位维持率占90%以上。随着工龄增加，业务熟练度得到提高，生产效率及品质也随之得到改善，最终实现了价格竞争力和客户满足。

一个社会性企业，虽然以技术为基础，并以追求社会价值和解决多样性问题为目标，但是因为企业特有的本质，实现经济上的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了使社会性企业能够持续发展，需要确保市场竞争力，并通过营业活动不断创造销售额。只有实现企业的外在增长，才能提高其社会价值。从这个角度上，TESTWORKS被认为是同时实现了社会价值和经济增长的代表性的社会企业。TESTWORKS的销售额在2016年为2.5亿韩

元、2017年为6.1亿韩元、2018年为13亿韩元、2019年为45亿韩元，每年都持续增长了两倍以上，而客户公司也在2020年增加至80多个。其中，人工智能数据标签领域约80%以上的顾客通过项目续约转换为长期顾客，确保了稳定的销售额。

随着TESTWORKS成为STEM领域的社会性企业，证明了追求多样性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不过从很久以前，企业为了加强竞争力而追求多样性的战略已成为企业的必须品。因为多样性直接关系到革新与获得成果与否。为了革新，需要勇气和创新力，对于新的问题不断提问，并寻找答案。缺乏多样性的团体每次反复提出相同问题的可能性很高，然而多样性丰富的团体，就会从不同的观点和视角提出新的问题并寻找答案。而且，追求多样性的企业可以聘用更多的有能力的职员。实际上，在全世界跨国企业云集的硅谷，就很容易看到不同人种的工程师。苹果、谷歌、微软等企业也为提高多样性而正在实施与此有关的招聘项目。这意味着确保多样性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竞争力。麦肯锡的报告显示，追求性别多样性的公司(gender-diverse compan)比没有追求性别多样性的公司的成绩高出了约15%以上，而追求种族多样性的

公司(ethnically-diverse company)比没有追求种族多样性的公司成绩高出了约35%以上。⁹

通过多样性寻求答案

对于工作经历中断的女性、残疾人、弱势群体等用语，可能会让人们视其为受惠者，并给他们贴上“相对卑劣”的标签。这种标签可能会让人们无意识地产生对这一群体的消极看法或偏见，并把他们认作是不同于自己的群体，随之划分他们到福利受惠者的特殊集体中。我们之所以要关注“多样性”，是因为它不是作为“错误的”或“不可实现”的存在，而是具有特别优势与才能的存在。一些研究自闭症的学者认为自闭症是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sity)的一个范畴。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把自闭症看作“大脑出故障的人”，而是看作“对于事物分析具有特殊分析能力的人”。¹⁰

如果与残障人士一起工作，就会发现他们对事物相比对人更加感兴趣。如果假设前面具有两个剧场，一个剧场表现的是人，另一个则是事物，那么可能大部分人的关心会集中在人与事物中间。一般对人更感兴趣的人比

较具有亲和力，并具有较高的共情能力。而对于事物更感兴趣的人，则表现出对事物的集中力，对事物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与系统化能力。据Thomas Armstrong的说法，共情是不可预测的，而且准确性比较低。然而，体系则可以被预测和控制。而自闭残疾人正是处在事物和体系领域中最极端的位置。自闭残疾人对于特殊的对象表现出的突出的兴趣，可能会让他们可以毫无错误地背诵地铁站名称，又或者让他们具有特殊的能力，可以迅速计算特定的年月日与星期，或使他们具有卓越的背诵能力，又或者使他们表现出不寻常的数学天赋。

像这样对事物表现得特别关心的人，人们通常会以“缺乏共情能力和社会性，具有与我们不同的常识体系”来形容，并划清界限，称之为自闭残疾人。然而，对于特别对人感兴趣，并明显缺乏体系化能力的人，我们就从不会称之为过度共情残疾人，或“他闭”残疾人。感觉我们有必要重新做一下反思，对于自闭残疾人的定义，我们是否把“不同”之含义认知成了“错误”的代言词呢？

我们要不断为“具有潜力，但没有机会的人”提供新的机会，并帮助其经济上的独立，且有必要进一步转换

对于“不同”的思考体系。所以，追求多样性不能只出于个人的善行与道德，而要扩展至企业和政府以及社会领域。追求多样性应成为必须和当然要实现的使命，而不仅仅是成为一种选择。

注

- 1 《从2016年统计上看女性的生活》，统计厅，2016年
- 2 《为培养女性SW人才的政策动向》，软件政策研究所，2016. https://spri.kr/posts/view/21288?code=industry_trend
- 3 《首尔市30至40多岁经历中断女性的现状》 首尔研究院、infographics, no. 262, 2018年6月8日. <https://www.si.re.kr/node/59621>
- 4 《对于高学历而有工作经历女性的特殊支援迫切》、《女性新闻》，2018年 9月11日. <http://www.womennews.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44485>
- 5 《与其雇佣残疾人，不如用“429亿韩元”来弥补：三星电子》，《insight》，2018年 10月 14日. <https://biz.insight.co.kr/news/182077>
- 6 《科学技术领域演出，为创造残疾人就业岗位树立方案而做的企划研究》(政策研究 2018-06)，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会，2018.
- 7 “SAP introduces program to hire autistic people”. *The Korea Times*. 2015. 04. 28.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tech/2020/02/133_177941.html
- 8 《从统计上看2019年社会经济现状》、《lifein》，2019年12月30日. <http://www.lifein.news/news/articleView.html?idxno=5645>
- 9 “Why diversity matters”. McKinsey & Company. 2015. 01.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organization/our-insights/why-diversity-matters>
- 10 托马斯·阿姆斯特朗，Kang Soonyi 翻译，《不是症状而是独特：为父母和教师的神经多样性指南(The power of neurodiversity)》，新春 2019.

结尾

搬石移山

Yoon Tae-Woong 高丽大学 电气电子工学部 教授





这是在我进入工科大学时发生的事情。大概在四十年前，我曾因为几乎见不到女同学而感到校园里的气氛格外异常。在800多名的大一新生中，女生却只有5名，而我所在的系里连一名女生都没有。直到我读完本科和硕士课程，六年里从没有在专业教室或实验室里和女学生一起听过课或做过实验。虽说理工科本来就是男同学比较多，但如此少的女生，我还是第一次见，甚至感到有些不正常。

15年后，大概在20世纪末，我再次以教授身份进入了工科大学。80来名教授中没有一名女教授。几年后，有一名女教授上任，有很长时间这位教授一直是这个工科大学里唯一的女教授。我再一次感觉到异常。校园里的女同学相比我上学时期，的确有明显的增加。然而，在这样一个只有男教授的学校里，让我不禁联想到女生们会抱着怎样的想法去梦想未来呢？

这样看来还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几乎没有在校园里看到过坐着轮椅的人。另外，到了博士生的年龄，也应该有怀孕的女学生，但除了非残疾男性之外，几乎看不到其他人。这难道不奇怪吗？

厌恶与歧视

2021年5月，国家人权委员会通过手机进行了有关厌恶性表达的认识的调查。¹ 据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者中有70.3%的人在最近1年内曾在网络(62.0%)或实际生活(53.2%)中经历过厌恶性表达。这比2019年的结果64.2%增加了6.1%。在线下，厌恶性表达的对象依次为，老人(69.2%)、特定地区出身的人(68.9%)、女性(67.4%)、女权主义者(64.8%)，而网络上女性(80.4%)、特定地区出身的人(76.9%)、女权主义者(76.8%)、老人(72.5%)。与2019年相比，对于各对象的厌恶性表达的比率都有所上升。在实际生活和网络上分别有67.2%和79.3%的人对于厌恶性表达的严重性具有一定认识，而59.5%的人认为新型冠状病毒以后韩国社会的厌恶和歧视有所增加。有见解表示，厌恶性表达会深化社会矛盾(90.2%)，会引导走向犯罪(87.7%)，会压制(少数者的)表达自由(79.5%)，也会巩固歧视现象(79.2%)。有45.8%的人表示曾使用过厌恶性表达。另外，有46.8%的人认为政治人士的厌恶性表达比过去有所增加，而46.6%的人认为正是他们扩大和助长了厌恶性表达。45.5%的人认为媒体比过去更多地使用厌恶

性表达，而49.6%的人认为媒体起到了扩大和助长厌恶性表达的作用。

该如何解释厌恶情绪如此蔓延的现象？厌恶性表达针对的是受歧视的少数群体。² 类似于性少数者、残疾人、移民者等等。女性从整体上看，虽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左右，但也属于少数群体。这是因为在公共空间中如何被隐形的这一点是比数字更为重要的问题。国家人权委员会此次调查也明确体现出了社会上对女性的厌恶程度非常严重。厌恶性表达会给少数群体的个人或集体带来严重的精神痛苦，威胁其安全，并会进一步强化现有的歧视结构。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事情。在《媒体上的性少数者》中，Park Ji Hoon教授表示，《禁止歧视法》可以对少数群体的偏见和厌恶建立一个制度上的安全网。我对此深有同感。

善良的歧视主义

虽然目前情况如此严重，但是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形成一种文化，禁止对于某一群体的厌恶表达。当然，这必须要建立在众人的努力之上。不表达厌恶的情感，不

代表心里不具有厌恶与歧视。但是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和只在脑海里抱有想法是截然不同的事情。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自己光明磊落，应该说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这类人算是具有善良意志的人。然而，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的人类往往存在多面性。各种特性可能有所重叠，不同情况中的某种特性也可能会表现得更为突出。就像黑人变性者，通过少数者性的交叉可能会有重叠，或像白人女性一样，从性别的角度上看属于少数群体，然而，从人种的角度上就属于多数群体。所以我们不可能在所有情况都是公平公正的，这似乎更接近于不符合现实的理想主义。但是我们也不可以放弃。正义与公平分明存在力量与价值。只有追求这样的理想，才能面对自己的极限。然而，在不能认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之时，往往会出现问题。

据说在公布自己很激进之后，相比没有公布时，人会表现得不那么激进。⁵ 有研究表明，在要求填写评价书时，越是要求评价人标记自己会排除对于人种和性别的偏见，那么评价人就越会偏向于特定的种族或性别来进行评估。宣言仿佛就成了通行证，可以让宣布的人不按宣言行动。如果具有善意的人们不能认知到自己

正在歧视他人是个问题，那么确信自己不会歧视的思想更容易转向歧视的行为。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不例外。Kim Jihye教授把这种人通常定义为“善良的歧视主义者”。⁴ 只有接受自己可能是一名歧视主义者，而不是确信自己肯定不会对他人歧视，才不会成为善良的歧视主义者。当人们把对自己的确信转化为合理的怀疑，才会做到真正的自我反省。

我们有必要记住，善意不会总是带来好的结果。意想不到的结果不会是例外的。就像打着平等的旗号，树立一种战略思想，即不使用像肤色或人种的词汇(color-blind/race-neutral policy)，也可能会更加导致结构性的不平等，甚至恶化这种现象。也就是说，想要消除人种歧视的战略可能会反而转化为优待白人的政策，或成为维系既有权利结构的手段。⁵ 若只想一味地以善意来正当化自己的行动，可能会永远无法摆脱善良的歧视主义之框架。(这并不是说盲选政策最终都会以失败告终，而是可能按程序和时期会成为有效处理歧视问题的过渡性战略。就像纽约交响乐团虽然直到1960年代都没有过女性演奏家，但是到1970年代就增加至10%。这得益于盲选。据说现在女性演奏者的比率已经超过了45%)。⁶

多样性的力量

不能以不同为由而歧视，这不能作为推论的对象。这就像数学公式一样，是一个不言自明，理所当然的真理。歧视是不好的行为，所以不歧视他人是一个不坏的行为。但是，如果超越形式逻辑，不仅可以推测出这并不坏，还可以推测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处于同样环境中的人们不会再受到歧视所带来的痛苦。高丽大学多样性委员会对于这种逻辑做了进一步的延申，并想要证明通过不同的人的共同努力肯定会带来美好的变化这一事实。这需要我们更多地学习。

2021年8月，BBC就多样性报道了美国纳斯达克对上市公司的新规定。⁷ 今后上市公司要让一名以上的女性和一名以上的过少代表少数者(Under Represented Minority或LGBTQ+)参与理事会。而且还要公开多样性相关统计资料。BBC在同一篇报道中还提到英国金融行为监督厅(FCA,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的计划。即理事会的40%以上需要由女性组成，而且至少要包括1名以上的非白人少数者。(这里的女性包括自认为是女性的人。)美国纳斯达克和英国FCA为何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多样性对于提高

企业竞争力是必需具备的核心要素。当然，获得企业好评、得民心也很重要。组织结构越是多样化，成员对多样性的接受度就越高，对他人或群体的刻板印象也就会越少，信息交换也会变得越开放。这会使得不同的观点和问题的解决方式更有创意性地融合在一起，使组织的创意性以及对变化的适应能力从而得到提高。当然，多样性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并不代表多样性的威力就可以得以自行发挥。组织文化需要有效管理。《财富(Fortune)》中评选出的成功引领创意团队的500强企业领导访谈录中也有人士声称组织的多样性是成功的主要原因。他们表示，具有不同特性的职员聚集在一起成为组织创意性的核心基础，会直接将组织引向成功之路。⁸

多样性对组织成果做出贡献的事例不仅存在于海外企业。在学术杂志上也报道过很多以国内企业和机关为对象的研究结果。可以展现多样性威力的事例数不胜数，例如，对多样性和组织公正性的认识有助于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多样性的接受度越高，则矛盾就越小，从而组织投入度就越高；成员们越是积极地认识彼此的差异，就越有可能取得高的成就等。

学习和研究也属于社会活动。从这一观点上看，一个

人看书和学习，也可看作是与作者在沟通。所谓扩散性思考或创造性思考是指理解可能发生冲突的多种观点，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新的观点或问题解决方案。如果这样来定义创意性，那么这必将与多样性的论点相连接。实际上，有研究结果表明，多样性的接受度越高，忘却学习(unlearning)和协同学习能力就越强，创意性也就越高。像在科学技术领域一样，女性的参与度相对比较低的领域中，性别多样性存在得越多，创造出的成果也会更好。⁹ 若想要战胜有关新药对女性的副作用更多以及人工智能相比黑人，对白人的认知度更好等现象，就需要让更多的女性和少数群体参与到科学技术活动中去。Leem Soyeon教授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何需要更多的女性》中传达的信息也是这个内容。科学技术领域中具有更多的女性，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科学技术。

无论是企业、政府组织、大学，还是研究所，扩大多样性，并建立和管理包容性的文化已成为组织经营的核心战略。

现在所处的位置

高丽大学多样性委员会委员长Kim Chaiyoun所撰写的前言以彩虹故事为开始。彩虹是多样性的象征。差异是

力量的源泉，而不该是歧视的原因。这样的多样性汇聚成一个泛着彩虹光芒的共同体，它就是我们处于各自的位置上瞭望的灯塔。确定了该去的位置，就需要选择去的路径。这将根据我们所处的位置的不同而不同。

“29.3%”，“20.0%”，“10.0%”，“6.6%”。这是《科学技术领域为何需要更多的女性》中提到的数字，分别是指国内理工科新生、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人力、研究开发人力管理者、执行10亿韩元以上课题的研究负责人中女性的所占比率。即使不加以说明，这些数字也已经告诉了我们很多的事实。现在该是轮到我們审视我们的身边和现在的时候。

高丽大学多样性委员会从2019年6月到10月收集了30多个部门的人员构成与制度、政策相关资料。从9月2日起两周期间，以所有成员为对象进行了“2019高丽大学多样性意识调查”。调查结果切实显示了高丽大学的现状是向哪里倾斜的。¹⁰

高丽大学女生的比率是本科生45.7%，研究生41.8%。而工科大学和理科大学的女生比率分别为21.3%和30.1%。由此可见，各专业存在相当大的偏差。理工科也并非都相似。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中就有50.2%的女生。性

别按男性、女性和其他性别来提问时有0.7%的学生被归类为其他。为了掌握性少数者的具体相关信息，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残疾学生的比率为本科生0.7%，研究生0.1%。经济弱势群体的比重很低，而特殊目的高中的毕业生的比重却很高。

女教授则有多少？答案是16.2%。也就是说，女学生与女教授的比例为0.35。就算教授们的学生时期，女生比率比现在低，0.35这个数字也依然看起来少之又少。回想一下Lee Bora教授在《创造尊重多样性的教学场景》中提及的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和作用模式的重要性。我校的教务委员中女性教授的比率都不到5%。女性职员有42.4%，部长级以上职员有17%。(可作为参考的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MIT的女教授比率分别为53%、56%、55%、40%。)

教授们虽然认为学校的多样性水平比较低，但是对于自己的多样性意识却表现出较高的评价。这种认识虽然可作为扩大学校多样性的动力，但也可能会成为善良的歧视主义。当然也有两种重叠的情况。对于性别歧视程度等的包容性和平衡性，女性的评价则更为消极。如果以外界人的眼光来评价高丽大学，就可以将其概括

为“一个具备能力与公正，然而缺少未来指向性，并需要提高多样性价值的大学”。

高丽大学多样性委员会以2019年报告书上的现状资料为基础，制定了中长期战略，并将其收录在了2020年的报告书中。¹¹

临界比率

再说一说数字相关问题。据说如果某人属于共享特定属性的集体(例如女性或黑人)，并且其比率低于特定值，那么他们极有可能被看作一个集体的代表(token)，而不是被看作个人。而通常把这个处于境界的值称为临界比率(critical mass)。想象一下只有一名女性理事的理事会(虽然实际上没有女性理事的公司更多)。如果理事有十名，那么女性比例为百分之十。这种程度可以说是在临界比率以下。也就是说，一旦这个理事会中的唯一女性做出某种发言，男性们则很容易把其接受为女性代表的言论，而不是代表像自己一样的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理事会感到了压力。从而可能会极力想要表现出自己并非代表女性，又或者会以能力主义的名义反对女性亲和性政

策。虽然不知道最近是否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不变的是仍然token的压力。这就是所谓的tokenism问题。

临界比例是多少？有说20%的，也有说是35%的。不管是20%，还是35%，只要超过这一境界，个人就可以摆脱代表集体的束缚，而自由地活动了。据说，这样一来对群体(错误的)刻板印象也会减少。¹²这可以说是多样性可以正式发挥力量的转折点。这就是至少需要20%以上的临界比例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高丽大学女教授比率达16.2%，这没有达到临界数字。工科大学为4%。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积极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然而通常被称为优待少数人的政策，就会成为容易引起误解的表达方式。因为有很多人以能力主义的名义反对。就是说“在选教授的时候，如果不以研究与讲课能力为指标，而只因为女性而优待是不对的。”这其实是种无意义的攻击。如之前探讨过的内容，应采取积极措施是因为要扩大多样性会强化组织力量，也是因为歧视是错误的行为。采取积极的措施来聘请女教员，顾名思义就是为了引导出更多针对女性的支援。高丽大学理工系从2014年电气电子工学系开始，曾三次试图聘请女教员。遗憾的是，电气电子工学系最

终没能聘请到女教授。但是在教授会议上，就女教授聘请公告达成协议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宝贵的经验。

到目前为止，有两名教授通过理工科女教授聘请制度上任，但在2019年以后，这一制度再也没有实施过。因为高丽大学内外就只允许女性应聘是否是正确的积极措施的这一问题引起了争议。就是说，有部分人虽然同意有必要采取积极措施，但他们认为只允许女性有资格应聘的方式是存在问题的。当然我们可以尊重这样的看法。我们也觉得现在正是该进行具有生产性的讨论的时候。因为不管什么样的解决方式，按情况和时机来说，这种方式可能会是一个恰当的方式，而又可能不是。只是一些指责可能太过于激烈而已。这就像出了故障的钟表一样，我们实在无法认同。达不到临界比率的情况就像是一个严重倾斜的运动场。若要使其平衡，就需要朝反方向用力。这就是积极的措施。希望能够日后我们能够分析并预测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并为此摸索多方向的积极措施。

愚公移山

虽然我们需要根据时机做出相应的选择，但基本上来

说，我们需要把视线移向远处。虽然有很多多样性效果的相关资料，但事实上在我们周围却并不多见。对于前面提到的纳斯达克规定的多样性相关新规定，据了解满足此规定的上市公司都不到25%。高丽大学多样性委员会虽然一直很努力，但高丽大学朝向多样性似乎还需要走很长的路。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具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据高丽大学2021年6月进行的多样性调查结果显示，现在女性教授比率已达17.2%。这与2019年的16.2%相比提高了1%，而这1%正是高丽大学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所搬运的石头数量。

我们非常渴望听到生动地讲述在众多生活领域中体现多样性力量的具体的故事。我们希望人们在自己站立的位置、在自己所在的岗位、在与众人共同生活的空间里能够认知到多样性在我们的生活有多么重要。即使差异演变为歧视的根据，整齐划一性代替多样性而成为支配现实的方式也并不在意。这就是高丽大学多样性委员会为何制作名为《Diversitas》的小册子的原因。

《Diversitas》创刊于2020年，每月刊载两篇文章。直到2021年12月期刊，共有38名编者参与此刊。如此多的文章，除了具有多样性，几乎没有其它的共同点，可

见把这些文章编纂成一本书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东亚出版社编辑部对此提出了几种可行方案，而其中之一就是现在这本书。我作为编辑委员，向包括11名作者在内的38名编者深表感谢。

对了，听说愚公最终成功地搬移了整座山。

注

- 1 <在线厌恶表达认识调查>(11-1620000-000840-01), 国家人权委员会, 2021.
- 2 Hong Sungsoo, 《当语言成为刀刃: 表达厌恶的定义与问题》Across, 2018.
- 3 A. J. Stewart and V. Valin. An Inclusive Academy: Achieving Diversity and Excellence. MIT. 2018.
- 4 Kim Jihye, 《善良的歧视主义者》, 窗雨, 2019
- 5 D. G. Smith. Diversity's Promise for Higher Education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nd ed.. 2015.
- 6 Caroline Criado Perez, Hwang Gahan翻译, 《看不见的女人们: 偏向的数据如何抹去世界的一半》, 熊津知识库, 2020.
- 7 Daniel Thomas. "US stock exchange sets diversity rules for listed companies". BBC. 2021. 8.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58123730>
- 8 Egan, T. M.. "Crea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team diversity: Team leader perspectives". Advances in Developing Human Resources. 2005.
- 9 Mathias Wullum Nielsen et al.. "Gender diversity leads to better science". PNAS, vol. 114, no. 8. 2017.
- 10 <高丽大学多样性报告书2019>. <https://diversity.korea.ac.kr/diversity/research/report.do?mode=view&articleNo=266665>
- 11 <高丽大学多样性报告书2020>. <https://diversity.korea.ac.kr/diversity/research/report.do?mode=view&articleNo=266669>
- 12 与注释5相同.

Min
Ji-yeong

广播PD，出生并成长在全南灵岩，在首尔学习，现居住于釜山，为釜山的跨国居民制作英语广播。是一个既有趣又喜欢做有意义的事情的人。

Hur
Tae-kyun

高丽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毕业于高丽大学心理学系，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了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是社会判断的合理性、错觉和错误、韩国人的心理特性、休闲心理学等。著有《偶然成为韩国人》(2015年)、《偶尔清醒》(2012年)等书。

Shin
Haerin

高丽大学传媒系教授。获得首尔大学英文系学士学位、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美、韩、日)博士学位，在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担任英文系、东亚学、媒体学助理教授。撰写了关于后人文主义、技术和人种讨论、机械学习的创造性等论文，正在编纂有关人工智能伦理学的书。

Park
Ji Hoon

高丽大学传媒系教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以交流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影像展现为中心，进行了对于媒体生产者、文本、接受者等广泛性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纪录片、多文化、人种、性别及性等。

Lee
Dae-hyun

历任韩国日报记者、文化部长、评论员，并历任电影振兴委员、韩国电影评论家协会理事等职。媒体学博士，国民大学媒体信息系兼职教授和文章内容实验室“CQV”的企业代表。著有《你不是言论》(2020年)、《小说中的电影、电影中的小说》(2016年)、《17岁，通过电影瞭望世界》(2010年)、《用电影沟通,像电影一样写作》(2012年,合著)等书。

Shin Ji-young	高丽大学国语国文系教授。研究领域从语言声音, 涉及语言反映的社会、语言的意识形态、语言体现的权力问题等。最近正在研究性别、年龄等社会变数对语言的多种影响关系, 并努力通过著述和广播, 将研究结果扩散到市民社会。这些功劳得到认可, 并在2020年获得国家颁发的总统表彰, 播音员协会颁发的长期模范奖。
Yu Jiwon	文字文化研究所所长, 文字排版研究者。在首尔大学攻读视觉设计专业, 作为德国国际学术交流处(DAAD)的艺术奖学金获得者, 在德国莱比锡图形书籍艺术大学学习了印刷技术。在民音社担任设计师, 在Sandol Communication担任研究者, 2013年担任国际印刷技术国际美术展策展人, 历任弘益大学设计系视觉设计专业兼职教授。著作有《文字风景》(2019), 与物理学家 Kim Sangwook 教授合著的《牛顿的画室》(2020)。
Lee Bo-ra	高丽大学教育系教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获得了人类发育和家庭学博士学位。工作与学习兼顾, 并关注人们如何如何规划自己的发展之路, 由此研究和探索前途发展相关问题。
Jeon Dae-won	城南女子高中教师。毕业于庆熙大学社会学系, 在圣公会大学修完社会系博士课程。20年来在高中教授过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 著作有《鲭鱼词典》(2012年)、《我眼中的世界经济》(2010年)、《诉求我的权利》(2008年)等。

Leem
So-yeon

淑明女子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研究教授。毕业于首尔大学自然科学部，在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以博物馆学获得硕士学位，在首尔大学科学史及科学哲学合作过程中以科学技术学获得博士学位。著作有《在科学技术的时代以机械人生活》(2014年)、《21世纪思想的最前线》(2020年,合著)、《后人道主义和文明的转换》(2017年,合著)等。对科学技术、性别及多样性、人类提高技术、新唯物论女权主义等感兴趣，并对此进行研究和授课，在《韩民族新闻》上连载了《女性，与科学相遇》。

Yoon
Seok-won

TESTWORKS 社企代表。高丽大学媒体系毕业后，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并在三星电子及微软等国内外跨国企业担任过软件工程师。为解决多样性问题，离开三星电子，并在2015年创立人工智能数据专门企业TESTWORKS，目前职工人数多达120名。

Yoon
Tae-Woong

高丽大学电气电子工学系教授。在牛津大学以控制理论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教室和研究室主要谈论数学思维和逻辑沟通相关问题。他曾担任ESC(梦想变化的科学技术人网络)首任代表，并撰写《紧张才是正常的》(2018年)。

不同与和谐

共存的社会多样性

©高丽大学多样性委员会, 2021年Printed in Seoul, Korea

首版第一版排版日期 2021年11月1日

首版第1版出版日期 2021年11月5日

企划 高丽大学多样性委员会 Kim Suhan、Kim Shingon、Kim Hyeonjoon、Yoon Tae-Woong
作者 MinJi-yeong、HurTae-kyun、ShinHaerin、ParkJiHoon、LeeDae-hyun、ShinJi-young、
Yu Jiwon、Lee Bo-ra、Jeon Dae-won、Leem So-yeon、Yoon Seok-won、Yoon Tae-Woong

中文翻译校对 许诺

编者 Han Seongbong

编辑 Ha Myeongseong、Shin Jongwoo、Choi Changmun、Lee Jongseok、Cho Yeonju、
Lee Donghyeon、Kim Hakjae、Shin Soyeon

内容制作 Ahn Sangjun

设计 Jeong Myeonghee

营销 Park Shinyong、Oh Juhyeong、Kang Eunhye、Park Minji

经营支援 Guk Jiyeon、Kang Jiseon

出版 东图书出版东亚

登记 1998年3月5日 第1998-000243号

地址 首尔市中区退溪路30街15-8 [笔洞1街26] 2楼

脸书 www.facebook.com/dongasiabooks

电子邮件 dongasiabook@naver.com

博客 blog.naver.com/dongasiabook

Instagram www.instagram.com/dongasiabook

电话 02) 757-9724, 5

传真 02) 757-9726

制作者

责任编辑 Shin Jongwoo

再校对 An Sangjun

设计 Kim Changgeum

社会多样性与我们的生活有多接近？

一种克服偏见的心态 # 一个不让任何人落后的故事

一种处于歧视边缘的语言 # 追求多元化的教育 # 全民创新

